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川渝大轰炸

——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　都·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献给在川渝大轰炸中死难的同胞

引　言

历史是一条躁动的河

历史，不是一张静止的旧照片。历史，它是一条躁动不息的长河。奔涌的浪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翻腾出昔日沉淀的旧事，让历史和现实相纠缠，不断地影响、干扰着现实甚至未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渝大轰炸 / 谢世廉主编.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81104-131-6

Ⅰ. 川… Ⅱ. 谢… Ⅲ. ①日本－侵华－史料－重庆市②日本－侵华－史料－成都市 Ⅳ.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537 号

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

主编 **谢世廉**

责任编辑	任 煜 朱丙军
责任校对	陈雪霖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编	610031
网址	http: //press.swjtu.edu.cn
电子邮箱	cbsxx@swjtu.edu.cn
印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印张	8.25
字数	193 千字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1104-131-6/K·004
定价	14.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序

“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刘大年先生语)。应该说，战争的性质一开始就是十分清楚的。对日本而言，是侵略和压迫中国、侵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华民族尊严的非正义战争；对中国而言，是生死关头为民族的存亡继绝、为恢复国家和领土主权、为民族尊严而被迫用民族解放战争奋起自卫的正义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日本侵略者用侵占他国领土的残暴行动记载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用巨大的流血牺牲记载下来的。“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李白《北风行》)，这是民族恨与民族耻的历史，是不能忘怀的。战争的正义一方与非正义一方，泾渭分明，本是不容混淆的，“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苏轼《邪正论》)，日本侵略中国这段血淋淋的历史，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对这个问题，日本的有识之士和主流派学者也都是这么看、这么写的。他们与中国学者和其他被害国学者有一致的认识和文化认同。最近，他们与中、韩学者一道联合编纂和出版了《东亚三国近现代史》，以科学、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历史，这是“知耻近乎勇”，是值得钦佩的。战争的性质这个本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完全是因为日本右翼势力极力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翻案引起的。战后六十年来，他们始终未曾停止过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翻案活动。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深刻的反省，道歉姿态反复无常，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想方设法、多端托词、多次违宪参拜靖国神社，在新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一再屈从于右翼势力。而日本右翼势力，抱住军国主义的“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不放，一再歪曲战争性质。他们极力否认中国抗日战争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否认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慰安妇制度，否定对和平居民的大轰炸和屠杀无辜者的罪行，为大战犯翻案，为侵略者翻案。这些翻案活动时起时伏，不断变换花样和变本加厉，尤以每逢“十周年纪念”前后加剧。这些翻案活动的实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为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历史主流制造历史的障碍，制造历史的逆向事端。应该说，这是影响日本与被侵略的诸邻国的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动荡不安的根源。敢不敢直面历史、正视历史的真相而给予勇敢的反省，而不是讳疾忌医，这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对日本政府的严峻考验。问题的关键是不以侵略为耻，这是讳疾忌医的行为。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真正洗去耻辱的行动是懂得耻辱并且给予深刻的反省，这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被害国人民下跪忏悔的行动产生共鸣和给予敬佩的因由。

《川渝大轰炸》一书开篇即从战争性质的分析入手，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行为加以揭橥，对川渝大轰炸的性质和历史加以冷静实证的剖析，这从逻辑起点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在研究方法上，著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用冷静的分析，对多层面的各种实证材料作多角度的透视，使川渝大轰炸屠杀和平居民的侵略性、野蛮性和毫无人性的性质昭然若揭，这是值得称道的。

革命的义愤不能代替冷静的科学。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一书通过艰辛的社会调查和亲历亲访拿出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承受的巨大苦难，展示了侵华日军反人类的野蛮暴行。铁证如山，不容诡辩！迫使日本右翼势力不得不直面战争罪行，这是科学与实证的胜利。《川渝大轰炸》一书用的正是这种科学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川渝大轰炸是日本侵略行径的血腥性和非正义性的大暴露，当然会引起民族义愤。但问题在于：当这一切成为历史，历史的印痕又在城市的发展中被有意无意地抹去，抹去的城市记忆的碎片又

在不断风化的时候，仅凭义愤和激情就不够了。揭示历史的真相，冷静地科学地分析与实证，使历史的遗忘者走出“历史的失忆症”，才是保存历史信息、传承永不忘记的历史记忆从而理性地审视历史的有效方法。今天的年轻读者很难想像当年日本侵华空军如何对我们无防御的和平城市、无武装的和平百姓任意地肆无忌惮地施行轰炸的情景。把我们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的优美城市炸成一个一个瓦砾场，把我们多少酷爱和平的同胞炸得血肉横飞、肢体异地，其野蛮罪行令人发指。日军的侵略手段花样百出，除了在战区对无辜老百姓任意屠杀之外，对非战区的和平人民也是狂轰滥炸，使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多少财产化为灰烬！日军空袭中国广及 16 个省，其中战区有粤、豫、赣、桂、浙、闽、皖、湘、鄂、滇 10 省，后方有川、康、陕、甘、青、黔 6 省。侵华日军利用中国空军的弱小和防空手段的落后，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为所欲为。日本侵略者空袭造成的灾难同其他野蛮侵略手段一样罄竹难书、令人切齿。但切齿的义愤和激情不能代替历史。与日本右翼势力作斗争，与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作斗争，需要举出实证，需要客观的科学历史著作，需要“A Thing”（有东西）去打“A Thing”（有东西），而不是“No Thing”（无东西）去打“A Thing”（有东西），本书写作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对于大轰炸前后 7 年间川渝 70 余县遭受轰炸的范围、敌机架次、投弹枚数、死伤人数、建筑物损毁数、财产损失数等，均尽可能地搜集了详尽的史料，多方比较鉴别。信者传信，疑者存疑，使当年日寇对川渝地区进行长达 7 年灭绝人性的大轰炸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凸现于世人面前，任何谎言和诡辩都无法抹去。这种实事必求其是、立论必求其证的科学态度是严谨的历史学者应有的素养。本书以最近发现于成都的日本侵华绝密军事地图作证，从天皇“直接攻击市民”的敕令到狂暴军部施行“政略轰炸”的狂暴计划，层层剖析了日本侵略者对川渝的大轰炸是早有预谋、早有纲领的，是企图

以炸迫降，迫使大后方屈服的威胁性战略的一部分。同时，又分析了当时国内抗战力量一方势弱力小、防御手段原始落后、组织涣散却能同仇敌忾的状况。从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论证出日寇极端残忍的“扫地式”空袭无所不用其极的必然性，同时也就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愈益加强我们的团结和抗战力量，愈益促使日本侵略者走向崩溃和灭亡的深渊。“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王充《论衡·薄葬篇》)，客观实证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本书广事搜采，汇集了各种实事、实人、实证，展示了历史演进的真实逻辑，这不但没有湮没激情，字里行间反而浸透激情，民族义愤常遣笔端，起到了为爱国主义教育奠定科学基础的作用，这应该成为我们为青年一代提供有实效的爱国主义教材的指导思想。马克思讲过，政治教育的效用只有深入到社会实际生活的深处才能取得。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事实正可成为今天青年一代生活方式、心理方式以及文化认同方式以爱国主义为灵魂的教育和境界升华的思想养料。科学和激情相结合为爱国主义教育落实到社会实际生活的深处提供有用的思想资料，我认为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另外，本书在理论探讨上以见解和论断的新颖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增添了险被迷茫掩去的一页。根据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提出的大轰炸下的重庆是“先于广岛的广岛”，进一步指出成都即是“先于长崎的长崎”。这个论断，应该是课题组对还原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真相的各种史料的抢救和鉴别，是经过认真耙梳和理论提升的研究过程而得出的结论。从现在学术界研究状况看，关于川渝大轰炸问题，史料虽然不少，但较分散；论文也有不少，但研究层次不够，缺乏完整系统的全景性史料的汇聚和研究。而这项工作早应该起步，至少在大轰炸的当时，亲历其景的人就已有这样的愿望，而今天的人更需要看到这样全局性的实录和全景式的图像。四川著名文史学家钟树梁先生在亲历成都“六一一”、“七

二七”轰炸惨案的当时，曾写出《〈哀六一一〉四十韵》和《〈哀七二七〉六十韵》。对“六一一”大轰炸，他描绘当时的惨景：“始惊盐市口，火海浩无极。皮房顺城街，焦柱支颓壁。生者肢骸残，死者尸狼藉。哭声动天地，火势正岌业。敌寇为刀俎，吾民为鱼鳖！父仇不共天，国仇安可没！国势必当振，国人日眦裂！书吾所亲历，成诗贡史册。炎黄子子孙，勿忘‘六一一’。”对“七二七”大轰炸，他表述当时的愤慨，“时维‘七二七’，重罹旷世灾，重被大屠杀。锦里半斤墟，锦水为之赤。屋庐成焦灰，残废相枕藉。惨景呈阡陌，万家哭呜咽。中国本光昌，近世被凌轹。倭寇侵吾土，更欲吾国灭。后方被狂炸，城市多破裂。城裂心尤坚，灭敌方朝食。血债必血还，安容逃罪责。伟哉我中华，岂向仇敌屈。誓当雪国耻，寸土必完璧。”上述诗句既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尸骨如山、血泊如海的空袭惨景，同时又显示了誓雪国耻、灭敌朝食的气概、勇气和毅力的担当，何等地惊天地泣鬼神！更重要的是表达希望有人来做“长史书尺帛”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来，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做了不少，但有关四川、重庆地区遭受大轰炸的全面情况，却一直缺乏专著，甚至在城市建设中，连当年弹洞城壁都没能留下一丝痕迹。幸好还偶有当年日寇空军留下的燃烧弹和毒气弹被发现，引起人们的好奇，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引起有关学者探索研究的兴趣。日寇在川渝的大轰炸和中国奋起的空中抵抗，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应该忘记的一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有科学的论断，有能传之后世的准确判断。本书把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和川渝长达 7 年的大轰炸，做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比较，从新的视角，提出了成渝是“先于广岛的广岛”和“先于长崎的长崎”的比喻，我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是能起警世作用的判断。

还有，本书不单是汇集了有关川渝大轰炸的史料，而且它还全方位地展示了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作用及其贡献，展现

了四川儿女面对强敌、敢于牺牲、无所畏惧、敢于把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化进中华民族无限的生命里去的民族精神。

从历史上看，巴蜀的地理位置有一个战略特点，即巴蜀历来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秦国统一六国，是因为先灭巴蜀，以天府之国的兵甲、财赋作为根据，浮江伐楚，才统一了中国。楚汉相争，刘邦依托巴蜀和汉中为根据地，取得战争的胜利，进而统一中国。安史之乱中，中原残破之际，唐王朝主要靠剑南和西川的财力作为复兴统一、战胜分裂的支柱，因为当时益州的财赋收入已占中央收入的大半，远远超过了东南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再一次发挥了民族复兴基地的作用。这样的历史底蕴和战略地位，是川人能够把个人的有限生命与民族无限的生命相结合，勇敢地把民族复兴的使命担负起来的信念基础。

1943 年的《开罗宣言》首次正式建立了英、美、中“三国协同作战”的合作框架。而宣言中所要求的三国对日在华军力和日本本土实施联合空中还击的基地就在四川。这样，四川又为建设联合空中打击侵略者的国际性基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中国人，也是四川人的荣耀。它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夕阳西下的形象一变而为绝地奋起、民族惨烈抵抗、英勇奉献的新形象。树立这样的民族新形象，是包括了四川人的精神在内的，是包括了在川渝大轰炸中四川人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和坚忍精神在内的。这正是我们今天值得传承和弘扬的民族精神。凭借川渝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的历史优势，在川渝大轰炸这样一个血腥残酷的历史舞台上，以四川人的精神，展演四川人坚忍不屈的英雄史诗。本书以清新形象的笔触对此做了全景式的描绘，我认为这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

国魂，也就是民族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亡国，可以是军事手段，归根到底，是亡其文化，消解其民族精神。日本侵

略者不仅使用了摧残肉体的军事侵略手段，更使用了摧残精神的文化侵略手段。裕仁天皇胞弟三笠宫泽仁在 1944 年所著的《棉铁集》和《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中都反复强调日本征服中国民心、“收取人心”的重要性。文化的侵略与文化的反侵略，抗战文化与军国主义文化、汉奸文化之间的斗争，从来都是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最核心的方面。今天我们同日本右翼势力的争论，其实是这个斗争的延续，只不过是在新的文化竞争态势之下，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的竞争，是两种文化力量的对立和竞争。在当今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多种文化力量之间的融合、交流、冲突和竞争的格局中，我们应该多了解、研究和继承前人坚持民族文化和抗战文化，反抗军国主义文化和汉奸文化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形势下，坚持本土文化的立场，坚持文化的反全球化，尤其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强势文化所推行的单一的全球化。这其中，反对昔日的军国主义文化的复活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全球使命的角度看，《川渝大轰炸》一书在批驳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种种谬论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谢世廉和宋平、陈新华、魏风琴等学友及课题组成员写作了一本好书，并让我作为第一读者，有机会直抒胸臆，说这番话，应该致以谢忱。

是为序。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谭继和

2005 年 6 月

目　　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军侵华秘密军事地图惊现蓉城……3
“先于广岛的广岛”……4
灭绝人性的“战略轰炸”……10
天皇敕令：“直接攻击市民”……12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15

战时川渝的空防力量

刘湘“空军”：扔石头的飞机……19
中国空军状况……20
迟迟不来的外国援助……22
四川、重庆的防空机关……24
“消极防空”的主要手段：灯笼和汽笛……27
预行警报……28
空袭警报……29
紧急警报……30
解除警报……30

毁灭性的重庆大轰炸

日本陆军航空队率先施暴……36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陪都……40
震惊世界的“五三”大轰炸……44

以炸迫降……44
日军配备的杀人武器……46
市民仰观弹雨从天降……48
“到处都是血水，就像刚下了一场血雨”……50
更为惨烈的“五四”空袭……54
大火焚烧山城……54
纳粹旗也保护不了德国人……59
“101号作战”的国际背景……60
空中截击：维系无数生命的电波……63
日机驾驶员报告：几乎每天都有百吨炸弹落下……65
美国大使的目击：空袭目标皆非军事设施……70
顽强抵抗引来“零式”机参战……71
狂轰滥炸中，也有一个美国人“受益”……74
震惊世界的“大隧道惨案”……75
“大隧道”的由来……76
防空洞的等级之分……79
大惨案实况概述……81
幸存者描绘的“人间地狱”……85
究竟死了多少人……89
“战（政）略轰炸”终以失败收场……95
炸弹重现日军投掷细菌弹铁证……99
“疲劳轰炸”备忘录……100

血与火煎熬下的成都

绵里藏针的城市……106
“跑警报”开始了……107
蓉城上空的顽强抵抗……108
一只爱国的狗……109

“轰炸之王”奥田之死……111
“黄鸡婆”勇歼“轰炸之王”……111
碧血长空保蓉城……113
“轰炸之王”葬身处……117
惨烈的“6·11大轰炸”……122
战火塑造民族魂……124
刘开渠和他的抗日雕塑……125
王铭章铜像在轰炸中诞生……126
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29
成都的厄运又起……130
“101号作战”蓉城也是重点……131
“10·27”日机追着人群扫射……135
1941年“7·27”大轰炸……137
波浪式的轮番攻击……138
张明锦的一段沉重回忆……142
顷刻之间家破人亡……142
兵荒马乱中的截指手术……145
对年轻朋友说几句话……148
苏良秀家的悲惨遭遇……149
一家9口仅余4人……150
她和弟弟终身残疾……150
发誓索赔警示后人毋忘国耻……151
凶残的轰炸还在继续……151

日寇在四川各地的暴行

日机袭川的战略企图……156
日寇侵略四川的“秘密计划”……157
轰炸四川的具体步骤和战术……160

日寇轰炸主要采取的战术……163
日机撒下的传单……166
四川各地被炸实录……168
川东地区……168
川南地区……181
川中地区……190
川西地区……193
川北地区……195
日机轰炸了四川多少县市……199

大后方人民的反抗与贡献

“国耻的五月将变成复仇的五月！”……203
复仇女神从成都起飞……205
《开罗宣言》，战局实现转折……206
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206
从成都到日本——攻击开始……210
“一切都在疯狂燃烧！”……211
真正的“大后方”……214
兵源、税源、大粮仓……214
征兵情况……215
应征出工……216
纳粮……217
税收……218
发展生产……218
发展文教事业……219

大事记……222
后　记……229

日军侵华秘密军事地图惊现蓉城

2003 年 5 月 27 日上午，一幅图纸展现在笔者的办公桌案头。这是一张古旧泛黄但保管较好、线条清晰的地图。图的上方标明“中江”两个大字，图的右上角标有“军事秘密”、“支那派遣军测量班”等字样。原来，这是几天前在成都公交公司 15069 号公共汽车上拾到的某位乘客的遗失物品。考虑到该地图可能意义非同一般，成都公交公司有关负责人在当地新闻媒体记者的陪同下，把地图送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办公室，请求鉴定。

笔者仔细观察了地图，特别是图上的各种标记。可以初步判定，这是侵华日军根据 1912 年的四川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图式所绘制的一张秘密军事地图。此图由“支那派遣军测量班”于昭和十六年（1934 年）制版、昭和十七年（1935 年）九月复制。该地图以中江县为中心，包括金堂、三台、德阳等几个县，它也是当时四川省西北部一套九张的地图之一。图上细密地标绘了当地道路、山川、村落、河流、东西南北接壤地、山体海拔标高和标示高低地势的等高线。这份绝密军事地图，正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狼子野心的又一铁证。按地图标示，中江等地区后来成了日军飞机轰炸的目标。铁的事实再次证明，侵犯中国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年，日本政府就把黑手伸到了中国内地偏僻的县城和乡村，派“支那派遣军测量班”深入四川内地绘制了精密的军事地图，为以后飞机对四川各地狂轰滥炸做好了军事准备。

辽海出版社曾于 2000 年出版了一本《20 世纪初日本间谍的

镜头：窥伺中国》，书中披露了由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人员岛崎役治拍摄于 1924—1932 年的不少照片。岛崎役治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记者。新华社在介绍该书时指出，“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并进而制定详尽的侵华政策，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曾派出间谍人员对中国境内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扫描。其拍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都是罕见的。”

绘制军事地图，当然是比拍摄照片更露骨的侵略准备了。此前，全国各地也发现过一些类似的军事地图，见诸公开报道的不少，如四川的温江以及陕西、河南、黑龙江、湖北、江西、湖南、浙江等省的许多市、地及县。

“先于广岛的广岛”

历史自有其规律，不容篡改；坚持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

让我们从“广岛之难”说起。

广岛，日本本州广岛县的首府，地处太田川三角洲，南临濑户内海广岛湾，修建于 16 世纪，曾是一座依山临海、水车小屋静，在和平年代颇有一番渔歌唱晚的田园景色的小城堡。1868 年“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帝国军人政府领土扩张、称霸世界的野心膨胀，“世外桃源”广岛逐渐成为日本东部地区性的军事中心，主要生产钢铁、橡胶、化工品、船舶和运输机械。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空军在这里投下了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原子弹，使不大出名的广岛，一夜之间突然扬名于全世界。这枚相当于二万吨梯恩梯黄色炸药的“超级炸弹”在广岛市区上空约 600 米的高度爆炸，全城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当场死亡约 8

万人。在极大能量的光辐射、冲击波袭击下，很多活生生的人甚至被蒸发、被汽化了，只在一片残垣断壁上留下一点湿渍。这还不是悲剧的全部，在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几年中，由于放射性尘埃污染和中毒，总伤亡人数超过了 20 万。

至此以后，广岛即以遭受战争巨大创伤而成为世界著名城市被载入史册。提到“广岛”这个地名，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战争——原子弹、死亡和恐怖。日本人战后为了刻意让广岛以这种形象昭彰于世，在市内建立了历史博物馆，用各种图片和实物向全世界的游客展示原子弹给它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原子弹爆炸后幸存建筑的遗迹被辟为纪念地，每年都要接受世界各地涌来的善良的人们的凭吊。市内和平纪念公园里，还专门为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修建了纪念馆和纪念碑，每年的 8 月，广岛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和反战活动。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今日的广岛已经成为“全世界禁止原子武器和平运动”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已经成为人类苦难的象征，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成为以自己的苦难唤醒人类良知、疾呼世界和平的“救世主”。

在硝烟不散、战争和恐怖活动阴霾仍然不断威胁人类的今天，世界确实需要像“广岛之难”这样一种警示。

可是，理智的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广岛之难”究竟何以发生？

追根寻源，我们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个在“战争史”上似乎早已被遗忘的城市，它们在二战中遭受来自空中的毁灭性打击，由于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其对民众的伤害丝毫不亚于广岛以及另一个也受到原子弹攻击的日本城市长崎。这两座城市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四川的重庆和成都。把巨大的灾难强加给这两座中国文明古城的，正是日本侵略军。

从 1938 年 2 月到 1944 年 12 月，日本空军对四川各地，特别是重庆和成都进行了长达 6 年多的残酷的“战（政）略大轰炸”，

袭击目标主要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6 年中日本轰炸机向这两座城市投下了不计其数的高爆弹、燃烧弹，炸死炸伤市民数以十万计，毁灭的民房、工厂、学校、医院和文化设施数不胜数。仅一次“大隧道惨案”，就有数千无辜的重庆市民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导致的防空洞中窒息而惨死。与此同时，四川各地共有 70 余县、市遭到了日机不分军事和非军事目标的所谓“无区别”空袭，给数千万四川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遗憾的是，惨遭“大轰炸”的成渝两地至今没有留下一份正式、系统的记录。在重庆，大轰炸受难者纪念馆目前正在筹建之中；在成都，当年遍布府南河畔、盐市口、东大街闹市区、人民公园和北、东较场内的大小弹坑，早已被填平，走遍全市也找不到任何刻意保留下来的日机肆虐、大火焚城的遗迹和记载。当年“大轰炸”的幸存者，如果向今天成渝两地的年轻人谈起这两座城市曾经被日本飞机炸得千疮百孔，尤其是重庆几乎被日本空军“从地图上抹去”，他们会惊奇地瞪大眼睛，认为这是不可想像的。

原子弹给广岛、长崎带来的灾难的确是巨大的，然而作为一个文明理智，或者至少人格健全的民族，不会也不应该因自己的“受难”，便心安理得地一笔勾销强加给别人的苦难和罪恶，更不应该忽视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在那些蓄意想要抹掉战争罪行的日本右翼人士的潜意识里，“广岛情结”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性灾难，以及为什么日本最终会落得如此的惨败。

中国的重庆、成都与广岛、长崎远隔千山万水，两地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时间也相隔数年。只是由于使用了极大威力的武器一次性杀戮了大量生命，引起了人类的巨大恐慌，广岛似乎便有了成为“人类苦难纪念碑”的充分理由，同时也似乎间接地变成了日本右翼人士可以用来否认自己战争罪行的借口。但是我们看不出，在一小时内毁灭一座城市和在这之前用数年时间对另外两座

城市进行残酷的慢性空中绞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如果一定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可以说，一个是“前因”，另一个是“后果”；一个是“快刀子杀人”，另一个是“慢刀子杀人”。二者本质上都是杀人，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先用“慢刀子杀人”比后用“快刀子杀人”更血腥、更冷酷、更残忍！事实上，如果人们一提到“广岛”就会联想到原子弹爆炸，那么对中国和亚洲民众而言，一提起“日本”，人们立刻联想到的就是“残暴”、“屠杀”、“毫无人性”这些概念。因此，可以说重庆就是“先于广岛的广岛”，成都就是“先于长崎的长崎”。

尽管如此，我们也绝不认为重庆、成都以及四川其他数十个县、市遭受了日本飞机毁灭性的空中大屠杀，广岛、长崎的无辜民众就应该接受同样的对待。不过，历史是无情的，战争也自有它残酷的逻辑。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日本侵略者首先将死亡和恐怖强加给成渝两地以及中国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而后才会有全世界第一次（但愿也是最后一次）遭受核攻击的广岛、长崎。当年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塞德·怀特早在大批日机空袭重庆、成都时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正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引起日美关系恶化、直接导致美国参加对日作战并最终战胜日本一样，“日机对成渝两地持久的大轰炸是日中关系中的另一个‘珍珠港’”。日本侵略军不顾人类准则疯狂滥杀中国无辜民众的暴行，给当时的美国政府、国会和美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怀特在叙述 1939 年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时写道：“这场大屠杀至关重要之处，是敌人施行暴力的目的。重庆这座古城中没有一个军事目标，尽管如此，日军还是选择了重庆作为将它化为灰烬的对象……”他指出，“后来，当我军向日军发起攻击时，我也没有感到良心上有什么不安……重庆大轰炸是无区别地施行暴力，它对我的政治观点产生了直接的、根本的影响。”

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在当时遍及每一个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人。后来驾驶 B-29 巨型轰炸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保罗·齐皮兹上校，就是其中的一个。战后一些反战组织成员与和平主义者在采访他时，惊讶地发现上校对自己一按电钮便亲手毁灭一座城市的行为竟然没有一丝负疚感。齐皮兹和他的同伴一直坚持认为，正是因为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才迫使日本最后无条件投降，避免了更多的生命的牺牲。另一些著名的美国人，如“飞虎队”司令官陈纳德将军和战时美国陆军航空兵最高指挥官阿诺德将军等，则更为坦率地承认“广岛之难”就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和偷袭珍珠港的军事报复，以血还血、以暴制暴是天经地义的。面对日本人在二战中犯下的各种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基督也会发怒”，轰炸东京、轰炸广岛何罪之有？他们这种强烈的“无罪意识”至今仍是“反核战”的伦理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事实上，真正需要悔罪的不是别人而是日本人自己。当年曾驾机轰炸重庆的“零式”飞机驾驶员松井战后住在东京，他在对前去采访他的中国青年学者方军表示了悔罪意识后，沉痛地总结道：“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件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各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1942 年我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隆隆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一起报复我们呢？我们日本国有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说到底，不管是刻意进行“无区别”的滥杀还是对此进行正义的惩罚，任何军事行动总难免伤及无辜。战争总是人类最愚蠢的行为，大规模地屠杀生命无论如何也与人类理性相悖，健康的国际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永远杜绝战争，尤其是足以毁灭整个

人类的核战争。要达到这个崇高目的，则必须首先找出战争发生的原因，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尤其是那些历史上侵略成性、恶名昭著的军国主义国家，更应该正视历史、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内省自己的心灵，规范自己的行为，拿出理性来遵守人类社会共同的准则，从根本上消灭战争和杀戮的肇因，才能真正避免类似广岛、长崎那样的灾难。

好在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日本也不乏真正的有识之士，他们在严肃探讨战祸根源、总结历史经验时，非常清楚地了解“施暴”与“受难”的前因后果。日本历史学家、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就明确地将遭受日军惨烈轰炸的重庆称为“先于广岛的广岛”：“重庆遭到了两个夏季的轰炸，日军飞行员曾报告说，‘重庆市区已被炸平’……应该说，重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更早、更久、更多次数地成了战略轰炸的目标。就这个意义而言，重庆大轰炸先于东京空袭之前就已经成了无区别轰炸城市的先例，只是没有使用核弹头，是‘先于广岛的广岛’的攻击意向的发现。”

日本飞机对重庆长达 6 年的大轰炸造成约 26 000 人死伤，比起后来的英美联军对德国汉堡、德累斯顿和日本东京的大轰炸，尤其是美国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攻击，这个伤亡数字是较小的。换句话说，如果单纯从伤亡人数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亚各战场不少战役造成的人员死伤都超过了“川渝大轰炸”。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对重庆和成都的大轰炸不是“战争”，而是纯粹的“屠杀”。日军对 1938 年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首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计划、有预谋地对一个不设防的大城市和无数无辜平民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大轰炸，它甚至比纳粹德国对伦敦的恐怖空袭还早了整整两年。

日军针对重庆和成都平民的恐怖空袭，在实施之前明确以军事法律条文的形式颁布，然后精心策划和布置，最后由其国家元

首裕仁天皇直接下令执行。这个过程中排除了一切“偶然因素”，是不折不扣的“故意”，并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都作为一种不择手段达到战争目的的“战略”。它的恶劣性质并不只在于造成了多少人死伤，更在于极其粗暴地率先破坏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准则，从而将战争这种“政治的延续”变成一场对平民的毫无理性的杀戮。

灭绝人性的“战略轰炸”

能够把重庆、成都和广岛、长崎联系起来的，正是“战略轰炸”这个战争新思维。“战略轰炸”也称“无区别轰炸”、“政略轰炸”、“政略攻击”，主要相对于“战术轰炸”或“精确轰炸”而言。“区别”这个概念，在有关战争的国际公约和《战争法》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即出于人道主义和人类理性的考虑，交战双方首先要区别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区别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别的目的在于严格限制攻击的范围和规模，从而使作为“政治的延续”的战争不至于伤及无辜和过分残酷。“战术轰炸”即是一种“有区别轰炸”，一般把攻击的目标严格限定在敌方军事设施范围内，诸如军队集结地、防守阵地以及相关的指挥机关、运输和通讯部门以及后勤保障线等方面，轰炸的目的在于使敌方失去军事抵抗能力而不是屠杀。除了实施过程中因气候和具体操作等偶然因素造成的误炸、误伤外，绝不有意识、有计划、有预谋地攻击无辜平民和他们的生活设施。体现出“战争是军人之间的事，与平民无关”的理性思想。

“战略轰炸”（“政略轰炸”）与“战术轰炸”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明确地把敌国军事目标和普通民众不加区别地均作为打击对

象，甚至把平民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赤裸裸地宣称“敌国的士气和民心就是军事目标”，因而可以采取一切极端手段进行打击，以虐杀无数平民的生命来造成极大的恐怖效应，从而摧毁敌国军民的士气，使其社会组织彻底崩溃，最后迫使其投降。这种新的战争思想，是随着飞机的发明、完善并很快用于战争而萌芽于 20 世纪初，并由英、法、德、意等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初步尝试过，只是由于当时航空技术尤其是作战飞机以及相应的战略战术尚处于初创阶段，各国在实施中规模很小，刻意攻击平民的意识也较模糊，至少不敢公然宣称以平民和非军事目标为打击对象，因此，“战略轰炸”远未形成威慑力量。

尽管如此，它暴露出来的残酷野蛮和反人道的倾向已十分令人担忧，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有关国家共同签署的巴黎和约、日内瓦公约对这种过分的战争行为做了种种限制。1928 年，全世界 63 个国家在巴黎签署的“战争法”虽然允许交战国的一方使用一切军事力量来制服对方，但同时严格禁止使用过分的暴力，明文规定可以进行攻击的目标只限于敌方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包括防御工事、营房、军需库、战舰、战斗机和军械厂等，有标志的医院、医疗船、医疗机构和教育、文化、宗教财产则不应该受到攻击。作为文明战争最重要的原则，“战争法”还对战争中的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即军人与平民做出了严格区分。与平民不同，军人必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1）他们是在司令官的控制之下；

（2）他们的衣着表明他们是军人；

（3）他们公开地携带武器；

（4）他们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

在战争中只有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员可称为军事（战斗）人员，从而可以被敌国武装力量攻击，否则即是非法攻击，应该受到审判和处罚。

日内瓦公约确定的“战争罪”，包括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灭绝种族罪、违反调整战争行为的法规和惯例的罪行，等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些国际公法由于在实际战争中一再被违反、被践踏，仿佛一纸空文，没有任何约束作用。事实并非如此，在二战后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中，清算“轴心国”的战争罪行，永远解除其国家武装并责令做出巨额赔偿依据的就是这些国际法。审判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罪犯，将其罪大恶极者送上绞刑架，凭借的便是日内瓦公约有关“战争罪行”的法律武器。日本也是当时签约国之一，但是侵略扩张的野心使他们完全不顾这些人类的共同准则，就在签约数年之后即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在战争中严重违反这些国际法，无区别地攻击平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

天皇敕令：“直接攻击市民”

侵华战争一开始，日本军部就正式将“战略轰炸”作为征服中国的一个法宝，称之为“政略轰炸”或“政略攻击”加以执行。日军参谋本部首先把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中国重要大城市作为“政略要地”，然后开始周密策划所谓的“政略轰炸”，丝毫不掩饰其“以炸迫降”的战略目的。日本“防卫学会”编撰的《国防用语辞典》将“政略轰炸”解释为：“为摧毁敌人进行战争的基础，瓦解其作战能力和抗战意志，通常选定敌国的重要目标（城市、重要工业、军事、交通、通信等设施、军队集结地）直接进行的航空作战。”这个定义虽然未直接把平民列为目标，也没有炸弹、恐怖、杀戮等字眼，但把“城市”列在其“航空作战”重要

目标的第一位，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显然，“城市”包括了一切非军事目标，中国的平民和他们的住房等生活设施统统成了日本“航空作战”的打击对象，“政略攻击”的目标在这里用白纸黑字写得再清楚不过了。

日本在 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已经拥有了实施这种恐怖轰炸的手段。当时的日本是仅次于德国、苏联的世界第三军事大国，它的军舰、战斗机的数量甚至多于美国，某些型号的武器在质量、性能方面比尚未进行战争动员的美国同类武器要高得多。日本入侵中国后，推行的战略是“速战速决”，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军方就扬言“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然而事与愿违，面对强敌入侵，中国绝不言降。全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心打一场持久战，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漫长的战线拉开了，中国的首都从失陷的南京迁往武汉，日本侵略者满以为可以在这里一举彻底击溃中国军队，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然而在这里他们面对的却是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空前的大团结和更加英勇顽强的抵抗，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此时达到最高潮，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共产党将长江局设在武汉，大批共产党人包括董必武、周恩来、郭沫若等领导人直接参加了国民政府并担任要职，在“誓死保卫大武汉”的口号鼓舞下，数十万军民展开了悲壮的武汉保卫战。

日军虽然很快攻克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再次破产，国民政府并没有投降，而是撤退到重庆建立了“陪都”，继续领导全国民众抗战到底。日本军部眼看无法用常规的地面军事推进迫使同仇敌忾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就范，于是迅速改变策略，在加速地面推进的同时，决定动用陆、海军中的航空力量，将战场从地面扩大到中国城市上空，实施“战略轰炸”。日本军部提出了从这个时期开始，以轰炸机为主体的“政略攻击”思想，即航空兵力不仅以协同地面部队作战为目的轰炸战场上的敌方军

事力量，也不限于在地面军队作战区域内调动，而且用作发挥对敌方各大城市进行袭击的新威力，也称为“要地攻击”。

这个战略战术上的重大决策，详细写进了日本军方制定并颁布的《航空部队使用法》，这就意味着日军的进攻从此不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对所有中国人不分军人还是平民，一律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在这个以法令形式颁布的文件中，日本侵略军人撕下了一切伪装，赤裸裸地明确了作战目标。请看它的第 103 款是如何规定的：“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的要地之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

这项丧失了基本理性的作战指令，并非像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仅仅出于少数日本军人的变态疯狂，而是正式得到了日本最高统治者裕仁天皇的首肯。就在军方颁布了《航空部队使用法》之后不久，天皇即敕命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依此实施，并要其“坚忍不拔，妥善处理，协同陆军击败上海方面之敌，进而长驱直入敌要地，击毁敌机、摧毁敌诸阵营，或压制支那沿海，切断敌交通，扬皇军之威于中外……”其中所谓“摧毁诸敌阵营”，即指“无区别”轰炸中国城市尤其是战时首都重庆。1938 年秋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后，拒绝了日方的一切“和平谈判”建议，继续领导全国民众坚持抗战，这使得裕仁天皇更为恼怒。根据日本“二战史”专家前田哲男的记载，1938 年 12 月 2 日，这个后来躲过东京大审判的日本头号战争罪犯，通过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侵华日本陆、海军传达了“大陆令第 241 号”天皇敕令，亲自下令开始实施战略轰炸，并正式将“战略轰炸”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形成作战规范文字：“大本营企求确保占领地域，并促进其安定，以牢固的长期围攻态势，争取压制、消灭残存的抗日势力……特命以中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为主，指挥中部中国及北部中国航空进攻作战，特别是在压制、扰乱敌战略及政

略中枢的同时，争取消灭敌航空兵力，为此须同海军密切协作。”

日本是 1922 年日内瓦关于空战的《海军条约》的签字国，该条约第 22 条规定：“禁止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的私有财产，禁止以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然而出于“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动机，日本天皇和日本军方把一切国际法和人类准则都抛到了脑后，毫不掩饰地以法律条款和国家元首“敕命”的形式，命令其航空部队“直接空袭市民”，“压制和扰乱敌战略和政略中枢”更是明指“轰炸重庆、成都”，完全进入了一种丧心病狂的状态。

重庆、成都和四川其他数十个城市的毁灭性灾难，就此开始。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日本军国主义从来就是不讲“规则”的。就像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一样，在当年的东京审判中，面对日本空军在中国进行无区别轰炸证据确凿的罪行，日本政府仍不承认。据日本人自己编撰的《远东军事法庭中国事变证言记录集》记载，它顽固地认为当时的攻击“只限于军事目标，不是不设防城市，没有把城市本身作为目标”；“即使可以说是军事目标，当攻击造成有重大损害之嫌时，或难以确认目标时，出于人道上的考虑，尽量控制攻击”；它甚至具体提到，“海军航空队迄今没有攻击过城市本身，对重庆、成都以及其他城市都是如此。”据前田哲男所说，这种以政府的名义做出的正式见解，“是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对重庆轰炸仍保持的态度”。

日本牢牢记住了战争带给自己的灾难，而对自己强加给别国

的巨大的战争伤害，对自己整个国家犯下的战争罪行，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干脆矢口否认，甚至加以美化。在他们不厌其烦一次次进行修订的教科书中，把赤裸裸的侵略扩张美化成“进入”别国；当年日军在南京一次性屠杀 30 万中国人的暴行，尽管事实确凿、铁证如山，他们仍千方百计抵赖；尤为甚者，双手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被正义的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侵略军头目，直到今天还被当作他们的民族英雄，供奉其亡灵的“靖国神社”每年都要受到他们政要人物的祭奠。今天高耸于日本广岛城中的“原爆纪念碑”和“原爆受难者纪念馆”似乎也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更不能让人随意抹掉。为了人类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杀戮，我们必须记住已经发生过的残酷战争和惨绝人寰的杀戮。

参考资料

① 美国《时代》周刊当年驻重庆记者塞德·怀特：《历史的探求》。

② 方军：《我所认识的鬼子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③ 前田哲男：《战略轰炸的思想》。

刘湘“空军”：扔石头的飞机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是不容许地方军阀购置飞机组建空军的，就连当年陆海空军一应俱全的东北军，自从张学良“易帜”之后，空军也拨归了中央政府统辖。然而只有刘湘是一个例外。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四川军阀刘湘就曾经有过自己的“空军”。作为将大本营设在重庆的“四川王”，刘湘这个名字在山城可谓家喻户晓。他拥兵自重，扼守长江出口要道，长期担任四川省主席，虽然名为国民党陆军上将，但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方军阀，一直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明争暗斗，想方设法扩充军备，力保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坐镇重庆，把住夔门，雄踞长江上游，管辖重庆、万县两个港口。当时欧美列强的军舰和货船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可以在重庆、万县港自由进出，不管装载任何物资，中国政府都不能过问、检查，这就为刘湘组建空军提供了条件和方便。他拥有的二十多架飞机，大多是向西欧各国买来的旧货，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外早已停飞报废。除向法国购买的四架波德氏飞机是从越南直飞重庆外，其余的都是将购买的整机拆卸装箱，由外国轮船运到重庆，再重新进行装配。刘湘的空军组建起来后，号称有二十多架飞机，其实能够起飞的只有摩斯、波德氏各四架，苏制伏尔卡两架，以格、瓦格各一架，其余都是只能作摆设的破烂，徒有虚名。

关于刘湘的“空军”，在老四川人中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例如，为了训练出自己的飞行员，刘湘高薪聘请了一批外籍飞行

员作教官。然而第一次在重庆广阳坝开空军成立大会，德籍（一说是英籍）飞行员作飞行表演时就把炸弹（其实是迫击炮弹）扔在现场观摩的教导团队伍里，死伤几个士兵，教导团教育长江友三的腿也被炸掉一条。刘湘觉得大扫面子，震怒之下命人将聘请的外国飞行员当场五花大绑起来，要按军法处置，但后来慑于列强的压力，又不得不将其释放。当时在青岛的中国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处长蒋逵是四川巴县人，早年留学欧洲，兼学空军、海军。回国以后，他当过北洋政府的南苑航空学校教育长，于是刘湘重金聘请蒋逵回川，当了他的飞行教官兼 21 军航空司令。

虽然经历了一连串的周折，刘湘的“空军”总算建立起来了，甚至被派到成都去参加与刘文辉进行的军阀混战。但这些老掉牙的飞机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河里的鹅卵石——原来飞机上根本没有挂弹架，飞行员一手操作飞机、一手往下扔迫击炮弹又太危险，于是只好用麻袋装上鹅卵石吊在机翼上，袋口系上活扣，需要攻击敌人时，一拉绳子，袋口解开，石头就落了下去……

这样的“空军”在实战中的作用可想而知。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部 30 万众出川抗日，最后病死在汉口，他的“空军”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他的“航空司令”蒋逵，在抗战爆发后则担任了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副司令。

中国空军状况

要谈四川特别是重庆的空中防务，不能不提到中国的空军。中国真正的空军部队是在抗日战争前夕才建立起来的。当时中国拥有购自美、英、法、意等国的各种类型军用飞机 346 架。但列

入正式编制的只有 296 架。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在 1937 年 7 月 11 日的“军事机关长官汇报会”上报告说，“可使用于第一线之飞机仅约 200 架”，但实际上真正的主力飞机只有 166 架。

日本当时拥有在亚洲首屈一指的航空兵力和飞机生产能力。1936 年日本军用飞机已有 1 500 架，1937 年军用飞机年产量达到 600 架。不过日本当时既要准备“北进”对付苏联，又要计划“南下”与美、英开战，能够用于侵华战争的飞机只有大约 800 架。即便如此，日本对中国仍具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因此，在抗日战争初期它很快就掌握了中国东部的制空权，日机在江南、华中上空横冲直闯，对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狂轰滥炸，使中国军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的损失。仅抗日战争初期，即 1937 年 7 月 7 日起到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汉失守止，据当时的中国救济总会统计，中国城市被炸 316 次，炸死 22 968 人，炸伤 37 222 人，财产损失数以亿计。

中国空军建立后，许多飞机早已毁坏，但未在簿册上注销。当时全国各地抗日热潮高涨，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就是无数民众自愿捐钱用于购买飞机以加强自己的空军。然而只有内幕人士才知道，在很多所谓的“献机大会”上，展出的都是同一架飞机，只不过改漆了一下机名用以虚报其数。此外，中国空军原拥有的美制霍克式飞机已陈旧不堪，新组装的意大利菲亚特式飞机质量又非常差，有的初次试飞就掉了下来，被飞行员称为“空中活棺材”。

然而就凭这弱小的力量，中国空军展开了悲壮的上海、南京保卫战，日本海军驻扎在上海吴淞口外海面上的旗舰“出云号”，就是被这种老式双翼飞机击沉的。之后尽管一直是敌强我弱，但中国空军仍与日本空中强盗进行了殊死搏斗。1938 年 8 月 14 日下午，日本著名的木更津航空队跨海前来轰炸杭州笕桥机场，妄

图以突袭摧毁驻杭中国空军力量。那天，驻杭州的中国空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四大队奉命正移防笕桥，当大队长高志航飞抵浙江长兴上空时，接电获悉敌机正前来袭杭。他刚飞到杭州上空，即发现 14 架敌机正准备轰炸笕桥中央航校，高志航立即率机追上。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高志航击毙敌长机上的射击手和驾驶员后，又击中敌机油箱，使敌机坠落于半山金门槛一带。第四大队在短短的 30 分钟激战中，一次就打落了 6 架敌机。为了纪念这次空战大捷，这一天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国空军节”。

迟迟不来的外国援助

南京沦陷后，武汉一度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的重要空军基地。以当时苏联援助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装备的中国空军主力配置在武汉、孝感等机场。当时的苏联航空志愿队也到达武汉地区，其兵力包括 2 个轰炸机中队和 4 个战斗机中队。在武汉保卫战中，苏联飞行员直接驾机迎击日机，互有胜负。武汉失守后，这批空军力量撤到重庆，构成了保卫重庆领空的基本防线。1937—1939 年期间，苏联向中国供应了总数大约为 1 000 架的飞机，2 000 名志愿飞行员，500 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包括防空用的高射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成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基本来源，直到 1939 年欧洲战争开始才逐步减少，但一直持续到 1941 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时才中止。

而此时的美、英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大国，则对日本采取姑息的政策。“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尽管触犯了英、美的在华利益，但它们的主要注意力却放在应付纳粹德国

咄咄逼人的欧洲事务上，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野心，只打算采取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的手段加以遏制。同时为了避免激怒日本导致军事冲突，美、英两国一直未对中国的抗战提供过有效的军事援助，直到抗日战争进行了将近一年半之后即 1939 年，因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美、英两国才向中国分别提供了 2 500 万美元和 50 万英镑（合 200 万美元）两笔为数不大的贷款，还特别禁止中国人使用这些钱来购买武器和其他的战争物资。中国早已被连年内乱、统治阶层争权夺利、贪赃枉法搞得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几近崩溃。在强敌的残酷打击下，只能听凭列强首先根据各自的利益来决定对华政策，然后在列强对华政策的平衡下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无论如何，贫弱多病、受尽欺凌的中国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大国游戏”之中。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对华援助从 1940 年开始逐步增长，但却丝毫没有增强中国自己的空中力量。1940 年 5 月 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的空军会议上有一个统计，情况令人极其悲观。参加这次会议的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唐纵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国每月不能经常保持二百架飞机，如何能与敌人相抗衡。现时飞行员多于飞机约三倍，即使飞行员都有飞机，其数亦属有限。高射炮二百二十二门，照射灯三十八座，用于全国各地，如何能保卫天空？此在欧洲，不过供一城之用。抗战至今，曾击落敌机五百五十四架，敌机来袭六千余次。我国被炸死五万余人，平均每百弹死四十三人，伤五十五人。我国飞行员死伤七百五十余人，死二百八十二人中战死者七十三人，伤四百七十一人中战伤者六十八人。二年来共补充战斗飞机一千零五十四架，俄国机为六百七十二架，可见其数之小也（报废飞机共为三千九百六十架）。”

以上统计数字在当时属于最高层的绝密军事情报，国民政府从未对外公布。当时重庆已经被日机狂轰滥炸两年多了，中国空

军仍然只有这样的实力，力量之弱可见一斑。直到战争进行了四年半以后，英、美两国的援助总额才与苏联所提供的大致相等。1941 年后期，美国按照新出台的租借法案条款，开始向中国发送军械和其他军用物资。一支在陈纳德将军指挥下以“飞虎队”命名的美国航空志愿队到达重庆，一方面指挥、训练中国空军；另一方面也直接参加空中保卫战。这支部队骁勇善战，在日后保卫供应中国战争物资的印—缅“生命线”的战斗中，让穷凶极恶的日本空军吃尽了苦头。

然而保卫中国的领空尤其是城市无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说到底还得靠自己。

四川、重庆的防空机关

抗战时期，四川的防空机构分为“军防”（积极防空）和“民防”（消极防空）两大类。

积极防空主要由军警力量组成，承担组织战机和地面炮火阻止敌机入侵，侦听敌机通讯以预先发出警报等积极、主动的防空任务，其职能部门是防空司令部。

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前身是 1937 年 1 月在成都成立的省府保安处防空科，下设军防股、民防股、情报股三个办事机构。鉴于“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和沦陷区老百姓无不吃尽日本飞机空袭的苦头，四川各地开始加强防空工作，于 1937 年 9 月组建防空指挥部，由省主席刘湘任总指挥，省府保安处处长王陵基、成都市警备司令严啸虎、警察局局长周荃叔分任副司令，次年 5 月 1 日又改为“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由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兼任司

令，负责掌管省会成都和全川的一切防空事务。

重庆防空司令部成立于 1937 年 9 月 1 日。重庆防空机构相对独立于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市警备司令李根固兼防空司令部司令，市长李宏锟兼副司令，主要承担对空监视任务，范围除重庆市外还包括周围的两三个县、市。该部内设四科一所，分别掌管所谓积极防空、消极防空、防空情报、总务和发布空袭警报等事务，所属防空情报所负责侦听敌机电讯、搜集有关防空情报。

这四科一所在成立初期，基本上由有关的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电报局、电话局、电力公司、市政府及所属各局等单位派人兼任，只配备个别专职人员。1939 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才下令改组重庆防空机构，派其心腹——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司令（年底又由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取代），将科升级为处，扩大组织并配备专职人员以示重视；同时又调派正规军 3 个补充团的兵力由防空司令部指挥，还成立了一个直属防护大队。

消极防空即民众防空组织，主要是防护团执行帮助居民躲避空袭和灾后救助等较为被动的防空任务。根据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1936 年初的训令和它颁布的《各省乡县防护团组织规程》，成都和重庆都在当年成立了防护团，全省各县的防护团则是在以后各地遭受日机轰炸后才相继成立的。

重庆市防护团团长由当时的重庆市长李宏锟兼任，警备司令李根固和警察局局长王资军分任副团长，以下分设警报、警备、交通管制、避难管制、灯火管制、消防、防毒、救护、工备、配给等 10 个大队；同时按市区行政区域划分，设立重庆上城、下城、新市区、江北、南岸等 6 个防护区团，由警察分局局长兼任区团长，各街区保甲长兼任副区团长，分团以下对应各大队的职能又设 10 个班种，每班人数大约十人。成都防护团成员以军警和

受训壮丁为主，民众为辅，且多由专业人员组成，如消防队员、技术工人和医疗人员等，能力很强；重庆防护团则完全不同，成员主要由街道居民、商店店员甚至无业游民组成，成立时邀请曾派往南京中央防空学校人民防空研究班受过训的专业防空人员担任训练工作。“七七事变”后，重庆市防护团积极进行机构的建立和团员培训工作，然而由于其成员素质不高，往往不能尽职，如后来发生的“大隧道惨案”即体现出这种弊端。但总的说来，在日机长达六年多的全川大轰炸中，四川各地的防护团在挽救市民生命财产、减轻损害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是在 1939 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惨案发生后，因死伤居民众多，医疗机构无力对所有伤者实施救护，由防空司令部报请中央赈济委员会同意，专门设立的机构。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兼主任，下设各职能组，主要负责人都由赈委会派人兼任，同时市防空司令部、市府各局及有关单位也派人分担一些工作。

重庆市空袭服务总队大约是在 1938 年年初成立的，当时日机对重庆空袭越来越频繁，常常很久不能解除警报，市民在防空洞内避难，长时间不能出来，饮食、换气、如厕等都发生问题，于是由国民党社会部长谷正纲自告奋勇出面组织了这个机构。谷自兼总队长，规模搞得很大，队员遍及全市，但基本上都是“防护队员”兼任，在日机空袭时为市民提供一些茶水、饮食、医药卫生等方面的服务，发生伤亡积极进行救治，还承担炸后统计损失情况等工作。这个机构完全独立行动，不受其他防空机关的指挥与领导。

以上这些防空单位，虽然在对付日机空袭、解救民众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不少。主要是机构重叠、互相掣肘，缺乏统一指挥，因而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是一些大小官员有贪污受贿的劣迹，如修建防空设施时贪污

经费、冒领善款等，这些也给重庆的防空工作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危害。

“消极防空”的主要手段：灯笼和汽笛

1938 年 5 月，国民党大本营迁到重庆之前，这座城市几乎处于无空防的状态，国民党仅有的空军第一路司令部所辖的几十架飞机，驻防在重庆市四周的飞机场上，每遇敌机空袭时，都争先恐后起飞避战。苏联援华航空自愿队倒有为数不少的战机驻扎在重庆，然而由于当时日、苏表面上还是“友好国家”，这些战机不是每次都能轻易调动的。为了保存实力，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往往在日机飞来的途中，就先行升空避开敌机往返经过的航线，躲在死角上空，等待敌机轰炸重庆离开后，才飞回机场降落。由于资料不全，当时重庆的地面高射炮防空力量的具体情况不详。据当事者回忆，每次敌机来袭时高射炮虽然一齐开火，但总是零零落落的，达不到敌机的高度就先开花，只能阻止敌机的低飞或偶尔击伤几架，无法拒敌于重庆领空之外。

至于防空设备，则更为简陋。抗战初期全市几乎没有一处防空洞，后来因轰炸蒙受惨重损失后，当局这才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工作。重庆是山城，开凿岩洞极为方便，具有修筑防空洞的有利条件。政府机关和官僚显贵的大公馆筑有一批较坚固的防空设备。拨付下来为普通居民修筑防空洞的经费本来就很少，又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一伙贪污中饱。刘峙曾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性，在司令部下设立了名目繁多的机构，如通讯队、担架营、防护大队、工程大队、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等部门。实际上这些新设

的机构，多数由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借用，是一套人马两个机构。

鉴于防空武装力量非常落后，保卫重庆就只能寄希望于“消极防空”了，即尽可能在敌机来袭之前发出警报，使市民得以及时躲避，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获取准确的空袭情报，但由于当时技术手段落后，重庆防空当局没有负责防空情报的机构和必备的设施，空袭情报方面基本处于盲目状态，除了航空委员会空军情报总部派驻在武汉的情报分台及汉渝沿线有有线电话可通的地面瞭望所偶然报来一些敌情外，无其他可靠的情报来源。直到 1940 年之后，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干预下才陆续建立了较正规的电子侦讯机构，日机从武汉基地一起飞就开始监听其电子通讯，从而获得重要的空袭情报。根据这些电讯侦查得到的信息，重庆市防空当局向市民发出以下四种防空警报。

预行警报

山城重庆的市区、郊区都有很多高坡，在外界各处都能看得到的高坡上竖立一根长木杆，发布警报时，不仅由工厂、轮船鸣响汽笛，高坡上的长木杆亦随之悬挂某种灯笼以指示是何种警报。重庆防空司令部所属的电讯工作队在侦译到武汉基地敌机起飞的情报后，立即通知驻渝空军和防空部门，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当即派出卡车，从工作队驻地徐家坡将人和机器接到大坪朱家花园岩下重庆防空司令部情报所的大岩洞内合署办公。情报所同时还会收到总台驻武汉的地下情报站发来的敌机起飞的电报，于是立即通知重庆防空司令部悬挂三角形的绿色灯笼。一般发布预行警报，不鸣放汽笛，只悬挂三角形绿灯笼。老百姓看到它，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做好饭填饱肚子，准备好必需而又便于携带的衣物和重要东西，一旦发出空袭警报，才从容不迫地扶老携幼走向防空洞。

这种预行警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实行过，是二战期间中国军民的独创，主要是在建立电讯工作队、掌握了敌机活动的情报后，才能得以实施。这种预行警报一般都在上午八时左右发布，即悬挂三角形绿灯笼，居民们看见后便相互转告以早做思想准备。如果当天天气晴朗，敌机多半是会来重庆投弹的。

空袭警报

预行警报发布后约 1 小时，敌轰炸机编队即从武汉起飞，它们沿途不断与基地之间互相呼叫和通报，主要是向基地报告本编队飞抵的位置以及该地区的气象情况等。电讯工作队侦译人员此时牢牢控制着敌机群与基地之间往来的全部电讯，当获知敌机群各编队已经飞抵宜昌上空，继续向西飞行时，立即通知驻渝空军和防空部门，向重庆全市人民发出空袭警报。此时天空中立即有飞机出现，这不是敌机，而是国民党驻扎在重庆地区各机场的空军飞机正在起飞，为的是怕停放在机场有被敌机炸毁的危险。是否迎战日机，则要根据敌机抵达重庆上空后敌我力量的对比形势等来决定。此时防空司令部下令鸣放一长声、一短声的汽笛，连续鸣放 3 分钟，同时将各高地的木杆上的三角形绿灯笼摘下，换上一只大红灯笼，如果是夜晚，还须在灯笼内点上蜡烛，同时关闭周围的灯火，以便人们很远就能看到。重庆老百姓得知空袭警报后也不慌张，他们凭经验可判断敌机已出袭，但离重庆尚远，估计还有 1 小时左右的时间敌机方能来到。此时马路上也并无慌乱奔跑的现象，市民很有秩序地走入防空洞内躲避。对敌机大编队的轰炸，重庆市民能及时走进防空洞内暂避，有赖于电讯工作能够准确地侦译敌空军的电讯情报。

紧急警报

空袭警报发出后，工作队继续严密监听敌机的行踪，当侦悉轰炸机编队到达涪陵县上空，并继续向重庆飞行时，即通知空军和防空部门，由防空司令部下令发布紧急警报，即连续不断地鸣放短促的汽笛 3 分钟，高地的木杆悬挂上两个红灯笼球，表明敌机即将飞临市区上空。紧急警报发出后，最初几分钟尚准许行人快步躲进防空洞内，5 分钟后全市除值勤人员外，不准任何车辆和行人再在街上走动。

但有时发布紧急警报也会出错。比如，在 1939 年 5 月 3、4 日这两天，日机对重庆突然进行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使重庆市区房屋因被炸而倒塌、焚毁的占半数以上，市民伤亡惨重，令人惨不忍睹，有的全家老小全被炸死……曾经担任过抗战时期重庆电讯防空工作的邱沈钧、丁绪曾二位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国民党既无空军迎击敌机，又无密集高射炮火的轰击，加上防空部门的贪污无能，常常造成陪都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1939 年 5 月，日本集中优势空军对中国战时的陪都重庆进行野蛮的轰炸，当时，重庆虽有防空司令部，并设置有情报传递哨、对空联络哨、警报球台和通讯队等负责防空情报的机构，可是，对敌机来袭并未觉察，以致造成'五三'、'五四'的空前大惨案，烧去了市区大部分房屋，死伤不计其数……"

解除警报

在整个紧急警报期间，电讯工作队严密监侦着在重庆市上空的敌机领队机电台与武汉基地电台之间的全部通讯。窜入市区上空的敌机编队，每次少则 9 架、多则 27 架或 36 架，排成一字队

形，各批轰炸机沿着不同的方向，交叉进行投弹，投弹后沿原来路线返航。当敌机飞越涪陵上空，领队机遂向基地发报称："通过涪陵上空"，此时电讯工作队已从侦译的电讯中，足以判明敌已分批在市区投弹完毕，正向武汉返航途中。为了及时恢复重庆的正常状态，由防空司令部下令发布"解除警报"。即汽笛一次长鸣三分钟，并在各高坡地竖立的木杆上悬挂一只绿色灯笼球。群众得知解除警报发布后，遂依次走出防空洞，扶老携幼返回住所。此时人们走在街上，仍听得到天空有飞机的嗡嗡声，有些人还会怀疑是敌重又凌空，或"解除警报"有错。只有长期在重庆居住的人们才弄得清这嗡嗡声乃是国民党空军避战的飞机正盘旋在市区上空准备飞返基地。

保卫大后方四川特别是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力量和手段，大致就是这些了。在日本轰炸机大规模的残酷空袭中，我们看到它是多么力不从心。

参考资料

① 费正清博士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② 唐纵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

③ 邱沈钧、丁绪曾二位先生回忆录《抗战时期重庆的电讯防空工作》，《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日寇对中国战略大后方四川的大规模空袭中，重庆首当其冲。自 1939 年 2 月 18 日日机轰炸重庆广阳坝机场开始，到 1944 年 12 月 29 日日机轰炸梁平结束，在对四川全省近 7 年的狂轰滥炸中，受害最烈、损失最惨重的也是重庆。

山城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41 年的战国时代。张仪奉秦惠王之命，千里迢迢从中原沿长江溯流而上，来到这江中半岛筑城，建立了巴国国都。它在隋朝时称渝洲，到了宋代以后，才叫做重庆府。重庆虽然位于水路要冲之地，扼守着西南地区通往武汉、上海的黄金水道出口，但由于位置偏远，历史上并非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在国民政府将重庆作为首都之前，它是一个十分封闭、经济落后的内地城市，有一些简易的军事设施。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预料到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将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于是制定了一个把沿海工业企业内迁武汉、重庆的庞大计划，并于 1937 年 8 月开始着手实施。内迁的主体包括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枪炮制造厂，特别是南京、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等。在日军炮火的逼迫下，中国的民用工业也尽可能地被列入内迁计划。当年 8 月淞沪抗战打响以后，国民政府拨出了一定款项给国家资源委员会，用以帮助私人工厂从上海转移出来。在隆隆炮声中，上海共有 146 家工厂、重达 15 000 吨的机器设备连同 25 000 多工人沿长江西进到达武汉。然而立足未稳，战火又迅速烧到了武汉。于是，由各地转移到武汉的企业再度开始向内地迁徙，一部分工厂横越洞庭湖，用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往西安和宝鸡；而各地疏散到武汉的约 170 家工厂和湖北原有的 150 家工厂，共约 20 万吨机器设备和各类原材料资产，则继续溯长江而上，完全靠数百名汗流浃背的纤夫拖曳着沉重的木船，移往四川地区。据统计，在半年时间里，来自华北的纺织、纤维工厂，来自上海、太原、济南、南京

的兵工厂、飞机修配厂，约三分之一安排在重庆及其近郊并迅速恢复开工，构成了战时中国的支柱性产业。

随着工厂的内迁，几百万难民涌入四川，政府机关、各军事单位、金融机构和大批学校、文教卫生及文艺团体也先后迁到重庆，古老山城的宁静、祥和被战乱所打破，到处一片混乱。毫无战争准备的重庆市民，并不知道自己的城市突然之间成为国家的首都、抗战的中心，从而引起万众瞩目到底是祸还是福？

实施“战（政）略轰炸”的日本航空作战部队，很快用炸弹、燃烧弹回答了这个问题。

日本陆军航空队率先施暴

1937 年年底，当中国政府以工业内迁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时，日本军部拟定了轰炸四川的计划，尤其是当重庆市被确定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日本军部更是欲毁灭之而后快。日军以盘踞在华中地区的所谓“中部中国作战部队”为主力，由其驻华北和华中地区的空军部队共同执行。华北地区的日本空军力量，主要是陆军航空队，通常以山西运城机场为基地，配备的战机多系执行战术空袭任务的轻型轰炸机和驱逐机，承担战略空袭任务能力有限，加上距离四川的航程较远，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入川空袭的次数不多，规模一般也比较小。1938 年 2 月 18 日对重庆广阳坝机场的轰炸，就是日本陆航队实施的。这次轰炸只属于试探性的，除了机场部分设施被炸外，造成的损失较小，当时的重庆防空部门甚至未留下任何正式的官方记录。这年年中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军陆航队将其主力调到武汉，开始准备对中国战时首

都有预谋的战略大轰炸。

被占领的武汉三镇成了日军攻击重庆和后来空袭整个四川的战略空军基地。日军将长江边的原万国赛马场、华商赛马场修建成了宽大的军用机场，赛马场的观众台改建成了司令部和兵营，并在周围建立了飞机修理厂、弹药库及其他后勤保障设施，用于联络的秘密代号为“W”。W 基地的日本空军司令官是琢原联二，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是德川好敏、远藤三郎，海军方面是“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井上成美和分别任海军和第一联合航空部队司令官的山口多闻和大西泷治郎。初期这里驻扎了日本海军第二飞行队、第二联合飞行队和陆军航空兵团隶属的第一、第三飞行团，共有 200 余架轰炸机和驱逐机，后来海军的大批高性能飞机及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也陆续到达。1939 年起至 1941 年止，对重庆、成都和四川各地连续进行三年“疲劳轰炸”的“第 100 号作战”、“第 101 号作战”和“第 102 号作战”指令，都是从 W 基地司令部发出的。

经过 1938 年年初的试探性轰炸后，日军发现其飞行员在飞行、投弹技术上都存在较大问题，于是陆航队第一飞行团少将团长寺仓正三接到直属上级航空兵团司令部司令官江桥英次郎的命令，要他用 5 周时间“速成”飞行员的培训和用 7 周时间完成远距离航空歼击战的攻击训练。寺仓正三勉强完成上述任务时，已经是气候恶劣的 10 月。

虽然重庆有名的“雾季”已经开始，恶劣的气候不利于远距离空中作战，但鉴于蒋介石政府刚刚迁到重庆不久，W 基地司令部还是迫不及待地向日本陆军航空作战队下达了攻击的命令。1938 年 10 月 4 日早晨，9 架编队轰炸机群从基地起飞，沿长江向西飞行数小时后，到达重庆上空。它们第一个目标仍是市郊的广阳坝军用机场，日机投弹 30 余枚，使 7 月份才扩建竣工的广阳坝机场顿时遭到全部破坏，长长的跑道弹坑累累，死伤者 13 人，

被毁房屋数间。而后，3 架日机又窜入重庆新市区，在繁华的商业、居民区牛角沱一带投弹 6 枚，落在毫无准备的人群中。当时市内没有防空洞，老百姓无处藏躲，炸弹落地爆炸后，街道上顿时血肉横飞，死伤 23 人，毁房数间。牛角沱附近的嘉陵江边亦落下 1 枚炸弹，炸毁木船 3 艘，炸死船夫 3 人，受伤 2 人。

1938 年 12 月初“天皇敕令”下达后，经过一系列紧张准备，日军武汉大本营于 12 月 26 日再次从 W 基地派出陆军航空队第 60、第 98 飞行战斗队，对重庆进行了试探性的轰炸。日机起飞前就明确制定了轰炸目标：炸毁位于重庆市中心闹市区的中央公园督军公署、重庆市公安局、巴县县政府所属地区；重庆市郊的军用机场仅被列为“辅助目标”。日军刻意攻击平民的意向，由此可见一斑。这次攻击的时间预定在午后 1 时左右，指挥官明确下令各轰炸机都要使用 100 公斤以上的重磅炸弹。

26 日下午 13 时 35 分，从武汉基地起飞的日军陆航队 22 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沿长江经 4 个小时飞行后，到达了重庆上空。然而一片浓重的云海遮住了飞行员的视线，惯于目测投弹的第 60 陆航队驾驶员失去了目标，无法进行轰炸，只好带着炸弹返航。20 分钟后，第 98 飞行战斗队 22 架伊式重型轰炸机又飞到重庆上空，他们仍然遇到了厚厚的云层阻挡，无法确定目标。在盘旋一阵后，日机好不容易才从云隙上捕捉到一块好像是市区的目标，在勉强判定是重庆市东侧地区后，靠目测进行了轰炸，但是毫无结果。根据后来的分析，炸弹可能都投到深山沟里去了，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12 天后，即 1939 年 1 月 7 日，日机卷土重来，这次使用了 31 架重型轰炸机编队，炸弹也换成了 250 公斤级的重型炸弹。此时的重庆正处于“雾季”，城市上空云遮雾障，能见度很低，日机飞行员以重庆东南方向海拔 2 200 米的金佛山顶为基准校正目标，从四千多米的高空对重庆市区进行了轰炸。日机回去报告战况时

称，由于偏离目标太远，投弹点分散，这次轰炸的效果也不明显。然而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的正式官方记录，19 架日机共投下 74 颗炸弹，炸死 206 人，炸伤 353 人，炸坏房屋 140 余幢，市区主要街道均起大火。

紧接着，日机 3 个轰炸机编队共 30 架重型轰炸机又于 1 月 10 日连续对重庆市区进行了轰炸，目标仍是繁华闹市街区。由于大雾弥漫并遭到中国军队地面高射炮火的反击，大部分炸弹投到了长江中。重庆防空部门的记录是：日机投弹量达 4 500 公斤，其中有 2 枚燃烧弹，炸毁长江边上的船只 20 余艘，江边的主要街道起火 10 余处，房屋被毁 3 幢。据不完全统计，炸死炸伤平民 60 余人，江边码头遭到严重毁坏。

在这次空袭中，日机发现有 4 架中国空军的飞机起飞，他们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生空战，中国飞机避开日机，盘旋一阵后不知去向。后来才得到情报，中国飞机升空并不是为了迎战，而是为了保存实力。

其实中国人也知道，保存实力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使用它，否则“保存”得再好也毫无意义。于是在 1939 年 1 月 15 日，当 29 架日机对重庆再次空袭时，中国空军终于出动了 12 架战斗机迎战，地面高射炮火也协同对空中日机猛烈射击。根据日本军方自己的战况记录，这次空战中不少日机被多次击中，但无一架坠落，它们都按预定计划将炸弹投向了目标。驻重庆的英国路透社第一次以外国观察家的名义报道了空袭造成的损害：这次轰炸共计 34 人被炸死，55 人受伤。在此之前，驻重庆的多家外国新闻机构尤其是西方各大国的外交人士对日机的空袭一直保持着沉默。

根据日方的统计，日军陆航队这四次空袭，共投下 521 颗 100 公斤级炸弹，22 颗 250 公斤级炸弹，发射机枪子弹 2 692 发，虽然给重庆造成了一些损害，但总的说来未达到预期战果。然而正是通过这几次试探性轰炸，日军获得不少重要的情报，他们发

现中国空军装备低劣，缺乏斗志；重庆防空体系极不完备，建筑物多为木、竹结构，使用燃烧弹攻击极易引起大火。总之，他们得出的印象是，中国西南的这座重镇、现在的抗战首都几乎不堪一击。

这些情报给日军大本营以很大的鼓舞，根据天皇在“政略轰炸”中关于陆军“须同海军密切协作”的手令，日本军部迅速调集华中地区的空军主力“海军航空作战队”，以武汉为基地，配备了大量重型轰炸机、远程侦察机和护航驱逐机，协同陆航队着手准备对重庆进行毁灭性的攻击。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陪都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中世纪城市对现代工业化世界第一次残忍打击后的反应：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这是当日机投下的炸弹突然在重庆市民头上开花时，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并身兼国民政府情报顾问的塞德·怀特在现场写下的目击报道。此时的重庆，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迁来的还有大批外交使团和外国机构，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也云集这里。这座一年之中几乎一半时间云遮雾罩的山城给这些外国人留下的印象是复杂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阿梅斯用浪漫情调的笔触写下了重庆给她的美好印象：“中国的新首都重庆，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景色优美，宛如一座火花国（可能指重庆夜景。引者注），这远远抵消了气候上的不足。满山梯田、到处竹林，一片棕榈、柑橘，使人想起亚热带地方。这个富饶的盆地平原（？原文如此），松树弯曲茂盛，神秘的群山环抱，悬崖峭壁耸立，任何初来四川的人，都会

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创造出如此富于幻想的图画。”

用远离现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眼光，看到的当然是这幅田园牧歌式的美丽图画。直到今天来中国偏僻地区旅游的欧美人士，也喜欢用这种诗情画意的笔调来描绘中国给他们的感受。然而换一个角度，以现代工业化世界的标准尤其是用战时的眼光来看，1939年的重庆确实还只是处于中世纪。战争期间，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过重庆，他在战后回忆重庆给他的第一印象时写道：“这是一群灰色的、沾满污泥的肮里肮脏的水泥建筑物和一些穷人住的窝棚，最好的地方是一个热闹的集市。日本人愿意什么时候轰炸，就来轰炸一番。”

海明威和夫人玛莎是1941年3月25日开始到中国内地去的。他们从香港乘飞机向北飞了一个半小时，飞过重重山峦和日本人的战线抵达南宁。他们向南走了7天，海明威在日记中写道，所过之处，中国的情况“不忍目睹，设身处地，不寒而栗。”在广州前线的第12路集团军所在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枪炮只隔3英里对峙着，虽然没有宣布，却处于休战状态。玛莎认为当地卫生条件之差，简直难以忍受：“池塘里根本没有水，只有腐烂的垃圾和污泥，猪在粪堆烂泥中乱拱，苍蝇成群，所有的村庄里都有一股中国特有的粪便气味，浓烈的人粪味！”她对一个朋友说：“中国的情况糟透了，已经完全人穷财尽，民心沮丧，令人触目惊心；那里的四亿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到处都是肮脏和疾病，不忍目睹。”

两天之后，海明威乘飞机到了西北方向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在他们的印象中，这座城市建在陡峭的江岸上，俯临向着河床上的一个临时机场。他们在一个朋友家破旧的房子里住了两个星期，这期间，蒋介石和他那位在韦尔斯利学院念过书的夫人宋美龄请他们吃过一顿午饭。海明威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感，这位委员长给这位已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的印象是：他“瘦削，背

部挺直，穿一套朴素的灰色军服，一尘不染，看上去像个木乃伊”。席间蒋介石谈到中国共产党人，海明威夫妇得到的印象是，他害怕共产党甚于害怕日本人。

然而这“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海明威夫妇在重庆逗留的时间虽然很短暂，居然有机会得以一见。经过美国外交官的安排，他们在重庆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最高代表周恩来。海明威认为，与周恩来的秘密会见，是他们“中国内地之行的高潮”。他回国后对朋友说，“周恩来是约里·伊文思的朋友，他有条不紊奉命进行地下活动，经常处于危险之中”。玛莎则称周恩来为“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唯一真正的好人”，海明威也深有同感。回国后在华盛顿报告他们中国之行情况时，海明威夫妇毫不怀疑地预言，“战后共产党将在中国取得政权”。这个印象，大概就是通过与周恩来的会见得来的。

玛莎留在重庆的时候，海明威乘飞机飞到成都，访问了一所由德国人开办的军事学院，还去看了 10 万工人正在修筑的一个飞机场。他回到重庆后，便和玛莎一起飞到西南的昆明，后来辗转到了仰光。海明威在逆境中总是表现很好。在中国的这次“极其恐怖的旅行”中，玛莎不断抱怨叫苦，但海明威始终坚忍不拔。她要忍受在中国看到的各种噩梦般的事实，而他除了要忍受中国的生活之外，还要忍受她的诉苦和埋怨。玛莎自己承认，“海明威把中国人看成人民，而我却把他们看成被蹂躏的、虽然勇敢然而已注定要灭亡的一群人。”

当时中国的情况真是要多糟有多糟，在重庆的欧美人士，几乎没人相信中国能战胜日本，赢得这场战争。海明威为《太平洋邮报》写了七篇平淡的报道，只是审慎地提出日本可能会对美国作战，他认为这也许是中国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唯一希望。他的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写道：“战时的中国给海明威留下一个使他厌恶的印象，他总喜欢拿福克纳的《一个寓言》比喻‘重

庆的大粪 ’”。的确，海明威对于这次艰苦疲劳而又不愉快的中国之行感到失望，其中重庆留给他的印象特别不好。

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当时是作为一位中国军人的妻子在一片混乱中撤退到这个城市来的。她在回忆录中，也直言不讳地写下了她对重庆一片混乱状况的厌恶：“重庆是个走马灯似的、变化多端的城市，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巨大怪物，是个不现实的奇怪产物，是个岩石上只有一英寸尘土，连树都不长的坏地方。街道脏乱，加之气候恶劣难忍，酷暑严冬，浓雾迷茫。虽然这是一座肮脏、有老鼠、贫穷、荒乱、悲惨的城市，但喧闹沸腾，百万居民愚昧的呐喊，令人心跳……”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战时曾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重庆，所见所闻使他心情沉重，他在自传中回忆当年的情况时写道：“一到重庆，我就强烈地感受到，此地为人类居住，真是不幸，因为没有平地，人们出门就得像山羊一样爬坡。在这长江和嘉陵江汇合的半岛上，只有山边上几条新修的街道可供汽车行驶。一切东西都似乎罩着四分之一英寸的厚土……”

费正清来重庆的工作，名义上是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中国的出版物，私下的另一项任务是替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收集日本的出版物，尤其是有关日本军事方面的资料，拍成微缩胶卷送回战略情报局。作为一个负有某种军事使命的情报官员，又时时面临着日机的恐怖轰炸，费博士特别留意了重庆的机场设施，结果也是令他非常失望的：“重庆的三个飞机场对于飞行员来说，都是不同的挑战。首先，建在长江中间沙洲上的广阳坝机场，跑道只能在冬季低水位时使用，飞机从这里起飞时，驾驶员必须当心江面横跨着的一条电缆，飞机只能从电缆下面或上面飞过。第二个是九龙坡机场，跑道的一端是小山坡，另一端是长江江岸，飞机起飞后，还未看清任何标记，便已飞行在江面上了。第三个是规模最大的白市驿机场，位于一条山沟的峡谷间。盘旋于云层中的

飞机往往要下降到低于山峰的高度，才能看清跑道。曾有一架四引擎 C-54 飞机，因看不清跑道，着陆时偏离跑道中轴线 20 英尺，只好侧滑着倾斜地着陆。在晴朗无云的日子，日本人就会前来轰炸，那些衣衫褴褛的重庆市民只能躲到防空洞里。令人费解的是，重庆老百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抱着必胜的信心……”

费正清显然比阿梅斯、海明威和韩素音都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然而，这种“必胜的信心”却并不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之上的。在即将来临的毁灭性大轰炸中，重庆的防务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震惊世界的“五三”大轰炸

以 1939 年 9 月德国突然袭击波兰以及英、法对德宣战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了战幕。在此之前，中国作为打响这场全球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的国家，已经孤军奋战了整整两年。

以炸迫降

这两年时间内，虽然以苏联为首在东欧组成了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英、美两国以反对德、日扩张为目的的全球同盟也正在萌芽中，但它们出于各自的利益，对日本几乎占领大半个中国的事实，采取一种熟视无睹的态度；只有苏联在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并通过佐尔格间谍网确切知道日本无力对苏

联发动进攻，有了一点虚幻的安全感，在亚洲对日态度渐趋强硬，除继续暗中给予中国一定的军事援助，还在满蒙边境上不断派出小股武装骚扰日军，总算使孤立无助的中国看到一点希望。而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则实行一种非常暧昧的“绥靖政策”，它的核心是优先考虑安抚野心勃勃的德、意、日三国，企图在做出一些让步后把这三个所谓发达国家重新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不是与苏联、中国合作共同抗击德、意、日咄咄逼人的攻势，从而保持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英、法以牺牲捷克而换取了慕尼黑《和平协定》，美国则欢呼这个可耻的协定是“帮助重建国际主义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最好的说明。这种局势使日本侵略者大受鼓舞，它们肆无忌惮地攻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城市，并开始暗中准备向英、美在亚洲的利益发出挑战。直到这时，精明的英国人才不禁忧心忡忡起来。1938 年 5 月，武汉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曾与首相张伯伦共同策划了慕尼黑绥靖政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勋爵公开发表评论说：“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家打一场战争，它也附带地为我们在远东打一场战争，因为如果日本打赢了，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必将丧失殆尽。”

不过，日本在中国“打赢”看来还遥遥无期，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正在收到效果。日军虽然占领了大片中国国土，但抵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后，出现了日本人最不愿看到的“不战不和”的局面，这场消耗巨大的“持久战”每坚持一天，日本取胜的希望就会减少一分。于是狂暴的日本军部决定采取“以炸迫降”的战略，期望彻底毁灭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来迅速结束这场战争。1939 年 5 月 2 日，天皇再次下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自今日起实施空中作战”的指示，“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接令后的第二天，即命陆、海军联合航空队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大规模战略轰炸，震惊世界的重庆“五三”和随之而来的“五四”大惨案就此开始。

日军配备的杀人武器

经过初期的试探性轰炸后，日军 W 基地已经完全了解了重庆不堪一击的防空体系，并牢牢掌握了制空权。指挥这两次对重庆大轰炸的，是日本海军的大西泷治郎。他在担任海军航空本部教育部部长三年半后，调到中国战区任战地部队指挥官，此时还是大校。他在汉口 W 基地指挥部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先后统辖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部队的航空兵力，指挥对四川省各地，特别是对重庆、成都的战略轰炸，自己也屡次乘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打头阵。这期间，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在“101 号作战”上，即用航空兵力“无区别”地毁灭城市，可以说在全世界首创恐怖轰炸的先例。早在 1937 年，这个大西泷治郎在国会向财界议员作讲演时，所讲的“战略轰炸三原则”中，就提出了“攻击敌军事、政治、经济中枢机构”，“挫败敌国民的作战意志（对人民使用杀伤性武器）”，之后又制定出详细的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日本实施“战略轰炸”（后来又把“无区别”的毁灭性轰炸称为“政略轰炸”）是早有预谋、精心策划的。

日本陆军航空兵对重庆进行的四次不成功轰炸，终于使早就想在对华战争中插一手的日本海军有了机会。1939 年 5 月 3 日这天，受命轰炸重庆的正是武汉 W 基地待战的日本海军航空队第一空袭部队，由第 13 航空队和第 14 航空队所属的 45 架中型攻击机（即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组成的空袭部队，指挥官是第二联合航空部队司令琢原二联。琢原是科班出身的飞行员，曾在航空母舰上和航空总部服役并得到升迁，他和手下一帮人都是日本海军内部的核心人物。他对海军航空兵从武汉对重庆进行第一次战略轰炸，早就踌躇满志，而且心中充满了对首次轰炸“失败”的陆军航空队的蔑视。他早就跃跃欲试想要大开杀戒了。

重庆和武汉相距约 780 公里，中型攻击机逆长江而上飞抵重庆

要 4 个小时，飞回要 3 个小时。这次海军攻击，同三个月前陆军攻击不同，遇上了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增田、八江两人驾驶着长机带领攻击机队，出发后 2 小时就通过了长江三峡的峡谷地带上空。通过涪陵后，距离重庆只剩下 70 公里，从前面指挥官的座机里发出了“警戒”的信号。机内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侦察员把注意力集中在航空地图上，站在机内用望远镜开始左右观察。报务员从发报机上把手移向了 20 毫米口径的机关枪，检查了弹仓。中型攻击机队由于没有战斗机护卫，所以特意在飞机后部左右各配有 7.7 毫米机关枪。虽然如此，但要和灵巧的战斗机进行空中格斗，并非易事，于是他们只得保持着编队，互相严密配合，封住死角，一进入轰炸航向由于难以作回避，只好强行突破防空火力网。

飞机下部的炸弹仓里，装满了 25 号陆用炸弹，每枚炸弹重 25 公斤，6 号陆用炸弹重 60 公斤。98 式 25 号炸弹属 250 公斤级高爆弹，装药 96.5 公斤，爆炸时约有 10 000 块弹片呈 15～25 度扇面向四周迸发，可以将 45 米范围内的所有生物杀死。200 公斤炸弹的杀伤力，可在重庆地区坚硬的岩石地面上炸出直径 8 米、深 1.5 米的大坑。7 号、6 号燃烧弹命中目标时，因冲击引燃发火装置，铝热点火剂迅速引燃弹体中的铝热剂，接着引燃 17.8 公斤的镁合金，大火猛烈燃烧起来，施放出白色火花，十分恐怖。

除此之外，日本轰炸机还配有 98 式 7 号、6 号炸弹，以及通常称为“6 号炸弹”的燃烧弹。它和德国空军于 1938 年在西班牙格尔尼卡使用的镁合金燃烧弹一样，从构造上看，在这种镁合金的弹体内，装填的铝热剂配有发火装置和尾翼，重量约 20 公斤，靠落地时的冲力引燃发火装置，由铝热点火剂引起弹体内铝热剂（氧化铁加铝粉）猛烈燃烧，释放出两三千度的高温，燃烧时间达 10～15 分钟。由于白热化的燃烧，难以灭火，即使切断了氧气，也会继续燃烧一会儿，具有烧穿 20 厘米厚水泥房顶的威力。

侵华日军航空部队还配有另一种油脂燃烧弹，弹体内装填约10公斤轻质汽油和石蜡混合制成的固体汽油燃烧剂，是一种新型燃烧弹，一旦点火，就会燃烧起约5米高的火焰和黑烟，片刻之后，融化的固体油就会将像要舔去一层地皮似的火焰四处扩展开来，这一特点使它具有作为新式武器的性能。与靠冲击波和弹片杀伤的炸弹不同，燃烧弹的火焰产生的杀伤力有自然扩大的特性，和瞬间性自限性的炸弹相比，熊熊的火焰使燃烧区域迅速扩大并长时间持久燃烧，这样便造成同等数量的火药无法达到的巨大破坏和恐怖效果。

市民仰观弹雨从天降

1939年5月3日下午1时17分，日机侵入重庆。刚进入轰炸航线的一刹那，在5 000米高空等待战机的中国空军约30架战斗机一齐开火迎战。苏制伊尔-15、伊尔-16战斗机出现了，这种双翼伊尔飞机配有20毫米机关枪，它的战斗性能优越，日机驾驶员曾在浙赣前线吃过它的苦头，不敢忽视。据当时在地面观战的人们回忆和记者的报道，中国飞机从前上方冲下来，旋即和中型攻击机队交叉而过，接着调转机头，从轰炸机队的上方再次进行攻击，枪弹集中射向位于机队后部左翼的第14航空队3中队。日寇中型攻击机队拼命反击，可是一旦进入轰炸航线，从打开瞄准器到投弹的20秒钟内，不能改变航向，这对轰炸机来说，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2号、3号机顿时被击中发动机，在空中化成一团火球坠落下去。日机单纵队的编队很快挤成一团，然而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飞到目标上空，中型机攻击队一齐打开炸弹仓，每架飞机装载的720公斤炸弹，全部向市区扔了下去。

这一天的轰炸是在天气晴朗的空中进行，地面上居然有许多

重庆居民不顾轰炸的恐怖好奇地观看空战，既不躲也不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天空。在同胞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中国空军激发出了极大的斗志，非常英勇地跟日机格斗，他们虽然取得了击落敌机两架的战果，但无论飞机的数量、性能还是飞行员的技术等诸方面都不能与日机匹敌，抵抗能力非常有限，最终未能阻止日机的入侵和屠杀。

炸弹还在空中坠落的时候，地面上不少人仍然瞪大好奇的眼睛，想看看那一枚枚黑乎乎的东西掉下来到底会是怎样的结果。21 岁的防护团员曾治维戴着红底黄字的防护团员臂章第一次参加了救护工作，眼前的恐怖和一片混乱把他吓坏了。他平时只是一家食品店的店员，由于训练很少，他对如何进行救护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防空洞极少，即使想帮助居民躲避，也无处可去。不少好奇的人无视死亡近在咫尺，硬要观看炸弹如何从天而降，中央公园一带聚集着许多观看轰炸的市民，他们绝不会料到，此地正是日机重点轰炸的地区！从未亲身经历过空袭的四川本地人，根本不相信日机的炸弹会瞄准他们，他们认为战争只是军队之间的事，即使殃及良民也不至于故意把炸弹扔到无辜的老百姓头上来。

然而炸弹就这样落了下来。巨响、爆炸、然后是血肉横飞。重庆基本上是一个用竹、木、纸搭建起来尚处于中世纪时代的城市，确实不堪一击。随着隆隆巨响和阵阵惨叫，重庆市民才感到这不是游戏，死亡就在眼前。曾治维恪尽职守，与防护团的伙伴一起尽可能引导群众就近避难，防空洞实在挤不下了，就带他们到树下或墙边躲避。然而炸弹不停地落地爆炸、不断有人倒在血泊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在一片混乱中又有更多的人被炸死炸伤。曾治维终于放弃了努力，自己也不得不逃入罗汉寺内，躲在罗汉塑像的石壁凹处瑟瑟发抖。不久，熊熊大火淹没了罗汉寺所在的街区，曾治维只得再次逃出。作为幸存者，事后他向调查人

员详细描述了当时极为恐怖的场面。

“到处都是血水，就像刚下了一场血雨”

爆炸的余波还在震动着，重庆顿时又变成了一片火海。近年出版的《日寇暴行录》一书对当时情况的记载是：“5 月 3 日中午 13 时许，日机 4 批共 46 架舰载轰炸机和中型攻击机，以密集队形空袭重庆，沿长江北岸俯冲，侵入市区。敌机投掷燃烧弹和爆炸弹 150 余枚，大梁子、苍坪街、左营街、都邮街、商业场、神仙口、朝天门、望龙门、太平门、储奇门、花牌坊等处被炸，市区内 27 条主要街道有 19 条被炸，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大火弥漫，浓烟滚滚，燃烧不止，1 000 余幢房屋化为废墟，居民死伤近 1 000 人……”

其中所提到的伤亡人数等，除了死亡人数外，其他数据与当时重庆防空司令部《民国 28 年四川各地空袭损害统计表》的记载大致吻合。该统计表的记录是：“敌机投弹 166 颗，死亡 673 人，伤 350 人，损失房屋 1 086 幢。”

在这天的大轰炸中，设在机房街 10 号的八路军办事处也未能幸免。此时周恩来正在桂林，留在办事处的有董必武、博古、钱之光等人。空袭刚开始，即有一颗 250 公斤级的炸弹落在钱之光的办公室外，幸好没有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曾家岩 50 号的“周公馆”也幸免于难，但苍平街的《新华日报》印刷厂、编辑部和营业部则被炸毁，一片狼藉。董必武等人在向周恩来发出急电报告情况的同时，准备迅速转移。当天夜里，在董必武的指挥下，八路军办事处机关迅速转移到郊区红岩村 13 号。在全城一片炸后的大火、浓烟中，第一批人员携带着物资向远离市中区的红岩村出发了，留在院内的那颗炸弹，仍然没有清除。如果这颗炸弹

正常引爆，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离《新华日报》不远的督邮街上，著名的“生活书店”也被燃烧弹击中，大火包围了书店的总监理局和仓库，纸灰漫天飞舞。邹韬奋先生带领员工苦战烈火，竭尽全力从仓库中抢救物资。大火最后彻底烧毁了总监理局和仓库，他不得不另觅地方转移。同时，邹韬奋先生顾不得自己的损失，冒着还在熊熊燃烧的大火，组织了“生活服务队”，为抢救其他受害者进行救护工作。

家住正阳街的郑素清是个33岁的家庭妇女，有一个女儿，丈夫失业在家，靠她替人洗衣服维持生活。28岁的邹华清在邹容路一个姓张的上海人家里当女佣人，因缠了足，最怕快跑，平时爱穿草鞋。当炸弹落地爆炸时，巨大的恐惧使她俩跑到了一起，她们一个劲地往中央公园跑，以为那里有浓密的树荫，可以躲藏。可是万万没想到，那里竟是轰炸中心。郑素清跑到中央公园里一看，里面已经挤满了避难的人。市中区本来就缺少平坦的地方，而这里又是商业区内的唯一公园，因此附近的人们都奔向这里来了。

中央公园名为公园，其实只是一块长约100米、宽约20～30米的狭窄地方，人们身子挨着身子挤在一起。郑素清在孙中山像的台座下找到了一块能挤下两个人的地方，以为这就安全了。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抓着树枝，刚刚蹲下，头上就响起了爆炸声，几乎把身体都震得跳了起来。短暂的眩晕过去，抬头一看，孙中山塑像的头已经没有了。她第一次离弹落点这么近，吓得浑身发抖。往周围一看，发现树上七零八落地挂着被炸飞的人腿和胳膊，到处一片凄惨的哭喊声，没死的人在血泊中抽搐着身子，旁边乱七八糟躺着一地尸体。郑素清惊恐万状，几乎呆了。等她恢复了知觉后，才感觉到手隐隐作痛，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右手的食指已经没有了……

当代中国的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肖建亨1938年随家人从苏州

避难到重庆，当时只有 8 岁。警报响起后，他和姐姐一起躲进了小学的地下防空洞，他好奇地往外看，只见市区已成一片火海。耳边仍然是轰隆轰隆的炸弹爆炸声，大地在脚下抖动。不断逃进防空洞的人带来消息说，他家所在的两路口也燃起来了。一听到这个消息，肖建亨和姐姐就想到还在那里的母亲，姐弟俩不禁抱头痛哭。1986 年，56 岁的肖先生为了写自传而故地重游，当年的惨状至今历历在目。他深有感触地认为，1939 年 5 月 3 日重庆人民经受的灾难远远超过了广岛原子弹爆炸，他说："广岛原子弹爆炸只有一次，而对重庆的轰炸，却持续了好多年，这是心理上的拷打，比日本人遭受的苦难多得多……"

现为成都市民的何深远先生，也是当年"五三"大轰炸的幸存者。他在 1930 年 7 岁时跟随姨妈从成都东门大桥坐木船经乐山、下泸州、沿长江而下到了重庆。后来，读了几年书的何深远进了位于七星岗的新民报社排字车间当学徒，他的少年时光平静单纯，直到 1939 年 5 月 3 日那一天，那场惨无人道的大轰炸，给他心灵上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5 月 3 日那天中午，我背着一兜衣服从储奇门下到江边洗，刚洗了几件，突然听到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于事先并没有听到空袭警报，在那一刻谁都不相信日本人的飞机真的飞临内陆城市重庆上空。我当时吓坏了，赶紧躲在河滩上的大石头底下，只伸出头来。我看日本人的飞机飞到两路口上空又倒了回来，分成两队，一队轰炸储奇门那里的蒋介石行营，一队轰炸七星岗通远门那里的自来水厂。日机不断扔下炸弹，又扔下燃烧弹，我亲眼看见人的手、脚被炸飞至半空中，血肉飞溅。轰炸结束后，我逃回家中，又跟着姨妈去看了轰炸现场。储奇门那里的一条巷子，两头都被堵死了，中间全是尸体，我至今还记得巷子边的水沟里还躺着一个婴儿的小尸体。第二天下午，日本人又接着轰炸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到处都是大火，我和一位邻居、也在新民报当学徒的曾凡清跑到报社，想把铺盖等物拿

回家，走到七星岗下面一条巷子，只见地上到处是血水，就像刚下了一场血雨。当时那一带只有南纪门没有被炸，无数人拖儿带女往那里跑，我姨妈也背着仅有的一点值钱物品，跑到南纪门的李子坝一片树林里躲了一天，后来因为没有吃的喝的，我们不得不返回金鱼塘街家中。回去的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一截截被炸去手、脚、头颅、仍在冒烟的躯干！街上唯一有生气的是几只窜来窜去的耗子。”

成都的《华西都市报》十分关注当年“重庆大轰炸”这段历史。他们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些如今已所剩无几的幸存者，请他们作为历史见证人，留下当年亲历这场惨祸的回忆。该报于 1998 年 4 月 26 日发表的何深远先生采访记中说，50 年过去了，老人从未忘记过那悲惨的一幕。以后他回到成都工作，如今正安享晚年。但一谈起当年的情景，老人仍是感慨万千。老人对往事记忆犹新，至今仍记得抗战期间发生的大事。他记得日本投降的日子，记得投降仪式上的双方以至一些细节，记得抗战胜利那天《新民报》发的《号外》。对一个亲历重庆“五三”大轰炸的高龄老人而言，这一段历史决不仅是学生们课本上的一段文字，它是老人心灵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烈经历！

在重庆市区顷刻变成一片火海之时，武汉日军基地第二联合空军司令部便得到了“获得重大战果”的报告。中部中国部队（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战斗简报第 513 号，对这天的战果做了如下叙述：“第一空袭部队趁天气良好，用 45 架中型攻击机（24 架 FG-14、21 架 FG-13）组成的飞行队，对敌首都重庆，实施了本年度第一次攻击，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为中心，猛烈轰炸从中央公园东北部到水泥厂一带，给敌以重创。飞行队冒着猛烈的防空炮火，同约 30 架敌战斗机交战，击落其中约 10 架……”

琢原司令官欣喜若狂，决定扩大战果，第二天继续攻击。

更为惨烈的“五四”空袭

“五三”大轰炸，重庆市内住宅区遭到了最为猛烈的袭击。在将重庆炸成一片火海之后，日机飞回汉口 W 基地检修，发现除被击落 2 架外，几乎全部飞机都被中国空军击中，机上人员轻伤 6 名、重伤 4 名、战死 1 名，如果第二天再进行攻击，飞机和机上人员都成问题。但怀揣天皇“敕令”的琢原司令已经杀红了眼，一声令下，要基地维修人员紧急抢修，并装备炸弹和燃烧弹。经过连夜加班加点的抢修，只有 27 架中型攻击机可以再度使用。琢原于是决定以 27 架飞机再次轰炸重庆，他特别命令地勤人员在每架飞机的炸弹架上装上了巨型炸弹，将攻击时间定在 5 月 4 日的黄昏，轰炸目标确定为“以重庆防空司令部、委员长行营、县政府中心、贯穿中央公园南北线以西的全部市街”。这片地区相当于重庆一半城市街区，是称为“下半城”的靠嘉陵江边的商业区和住宅区。

大火焚烧山城

综合当时官方和民间的消息，5 月 4 日的大轰炸概况是这样的：这天，四川省南部天气晴朗，27 架敌机再度轰炸市区，主要目标是商业区、居民区、工厂、军政机关等，督邮街、柴家巷、夫子池、七星岗、天官府、小梁子一带被炸惨重，有 14 处熊熊大火彻夜不息。由于日机大量投掷燃烧弹，比头一天的火灾更为严重，街上的木屋，只要有一处被燃烧弹击中，火焰喷射，就随风向其他房屋扩散。从朝天门到七星岗东西两公里，中央公园至嘉陵江边南北 700 米的区域内，共有 14 起火灾发生，形成一片火

海。市内供水设备和送水遭到破坏，人手缺乏，无法救出火海中幸存的人，惨叫声伴随着呼唤家人的喊声，不绝于耳，人们在街上狂跑，时而被弹片击中倒下。这次空袭，日机按预定计划将炸弹集中扔到了称为“下半城”的重庆街道地区，这里全是居民稠密区，没有一处军事目标，所以无辜民众伤亡极其惨重，如重庆最大的影剧院国泰剧场当时坐满了看电影的观众，被炸弹直接命中，当场死伤 200 余人。

据《民国 28 年四川各地空袭损害统计表》年末统计，“这天的轰炸，死亡人数 3 318 人、伤 1 937 人，损坏建筑物 3 803 栋，比前一日更惨重。”造成这一巨大损害的主要原因是日机投下了大量的燃烧弹。尤其是督邮街和柴家巷更遭到毁灭性的焚烧，街道、房舍、水电设施等均遭破坏，仅绸缎布庄被毁的就有 15 家，损失布匹 16 万余匹，市内 37 家私人银行有 14 家亦毁于轰炸。《日寇暴行录》一书后来提出的损失数据是：“居民死亡约 2 000 人，伤 3 300 余人，仅市区被毁房屋就达 1 200 栋”，这里也一并列出供参考。

日本历史学家、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两次来重庆进行实地调查后指出，在“五三”、“五四”两次空袭中死伤人数远不止 5 000 余人。这种统计上不一致的原因，是不少伤员在送往医院后救治无效死亡的，其中又有全家死绝者和在重庆没有户口的外省难民、流浪汉等，从而使当局在统计上不免漏记。在轰炸中，全市的机关、工厂、企业和店铺全部停业，学校停课，直接经济损失数以亿元计，间接经济损失更是无法计算。中央通讯社、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被炸，《中央日报》等十余家报纸停刊，也使来自非官方的调查变得困难重重。重庆各报后来才较详细报道了大轰炸的惨状和受损情况，但也是各说不一。一些善良的记者怎么也不肯相信日机会有意轰炸居民区，在报道中还猜测日机驾驶员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在攻击军事目

标时目测不准而误炸、误伤老百姓。然而面对惨烈的事实，他们迅速改变了看法。

国民政府美国顾问团的“中国政府情报部顾问”怀特，这天午后随情报部门的友人们一起进了防空洞。因为初期建造的防空洞没有换气装置，在里面呆久了，就会令人难受，很久都没有解除警报，怀特就出了洞来到嘉陵江边看日落。他回忆道：“当时晴空无云，日军27架轰炸机排成一线飞了过来。中国军队的高射炮连忙向日机射击，曳光弹对准日机编队飞去，红色和黄色火光散开，炮弹在闪光中爆炸，可是够不着上空的轰炸机，毫无效果。从旧市区上空传来轰轰声，日机未受损害飞去了……一接近市中区，只见火焰吞食着竹木，竹竿在火中爆裂，啪啪作响。这里一片喧嚣、混乱，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怒吼声、婴儿的啼哭声此起彼伏。有的人已经疯了，坐在地上前后摇晃着身子，嘴里唱着歌。小胡同里响起哭叫声，我几次看到有人从坡坎小路跑到大街上，在地上翻滚着扑灭身上的火……一登上山坡，眼前是一片火海，人们四处逃跑，疲惫的步行者，坐人力车外逃的、坐滑竿的人、推着手推车的人各种各样的都有。人群拥挤，道路阻塞，轿车和军用卡车在人群中鸣着喇叭行驶，人群日落时分全向郊外农村走去。”

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也是这次大轰炸的目击者。韩素音的父亲是四川郫县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她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韩素音当时同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官结了婚，随丈夫来到重庆，住进了叔父周建三的家里。她叔父是美丰银行总裁，银行是八层大楼，和四川盐务局同为当时重庆现代建筑的代表。叔父在市中区版师路的家也属豪华建筑。她对当时情况的记载是：“市内的住宅区遭到最猛烈的轰炸，成了一片废墟。5月4日下午是那样漫长，刚刚解除空袭警报，不料飞去的敌机又飞回来，轰炸重庆人口密集的地方，到处都发生了火灾。三叔家直接中弹，我和

两个佣人被埋在炸塌的建筑下，我们很快爬起来，因为燃起了大火，我们急忙跑出去。敌机仍在继续轰炸，人们从燃烧的房屋里逃出来，市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在城里燃烧的熊熊大火的光亮下，我看到潮水般的人群向郊外涌去……”

当年参加救护队的文厦阳医生回忆说：“我和一名救护队员正奔向公园，9 架敌机对着我们飞来，我们趴到地上，感到一阵山崩地裂，身体震动了一下，耳朵嗡嗡响，身上落满了沙土，建筑物倒塌，烟火中发出了惨叫声，血淋淋的肉飞到了树枝上，活生生的人‘啊’的一声就倒在血泊中。活着的人呼儿喊母，受伤的人在痛苦中呻吟，在喧闹中静静地躺在血泊里，只有等死。我们给轻伤员包扎，并且动员人们把重伤员抬往医院。”

还有更为令人痛心的一幕：重庆四郊驻有 6 个补训处（即抗日战争时期的“师管区”，是国民党对“征兵”抓来的壮丁进行集训、补充兵源的机构），总兵源有数万之众。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下令，要各补训处出动官兵来重庆市区救火，但这帮人怕吃苦、怕冒险、见死不救。第二天卫戍总司令部不得不以重金悬赏，才有数万名官兵前来救火。因火势扩大，火源又多，燃烧的房屋遍及全市，一时无法扑灭。参加救护的人，见到被倒塌的房屋压在瓦砾中的受伤者不是先施抢救，而是先问他是否富有，如是有钱人，则先向其家属勒索巨款，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钱到手后，这才动手营救，不少人就是因这样的耽搁而死在现场。

当时在重庆还有一大批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他们也在日机连续两天大轰炸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上海沦陷后，五大电影公司的男女明星们如白杨、赵丹、吴茵、秦怡等，以及剧作家陈白尘、吴祖光等不愿当亡国奴，他们参加了由重庆籍著名电影实业家夏云瑚组织的“上海影人剧团”，南下来重庆进行“文艺抗战”。当时著名电影演员、以“中国第一老太婆”著称的吴茵和剧团同仁在成都进行了抗战文艺宣传演出后回到重庆，吴

茵住在夏云瑚家。吴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篇名为《参加抗战，九死一生》的文章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况：“回到重庆后，正遇上‘五三’、‘五四’大轰炸。夏太太引我躲进‘莲花池’地区防空洞里。此洞是平地挖出来的，像一条既小又短的巷子，不料‘莲花池’也是敌机投弹的目标之一。一颗炸弹下来，不仅声音吓人，还有一阵急风带着火光钻进洞来，吓得人们很自然地往地下趴。我被压在最下面，我怀里还抱着夏家最小的儿子（他现在已是华裔德籍学者）。为了保护他，我把他放在地上，用力撑住手脚，身体悬空盖在他身上，有些人趴在我背上，这时候，我心想：不怕了！有人挡住我，即使我受伤，孩子也保住了。后来才知道这一颗炸弹投歪了一点，否则就难说了……同年在中央电影制片厂任演员，住在厂内宿舍楼上，空袭时，立即钻进宿舍旁的地下室。一阵狂风暴雨似的轰炸过去了，从地下室钻出来一看，面目全非，卧室像开了天窗，床旁的墙没有了。我放在窗台上的瓶瓶罐罐化妆品不知去向，如果这颗炸弹再偏一点正中洞口，那我们就没有今天了……”

当时的电影大明星白杨是“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正在拍摄电影《长空万里》，她在这部歌颂中国空军英雄的影片中担任女主角。因敌机的大轰炸造成大面积、长时间停电，一些演职员受伤、设备被毁，这部影片最终停拍。白杨冒着炸弹和烈火东躲西藏，有好几次也险些被弹片击中。她的住处被炸毁，只得四处借宿，弄得无家可归。

著名电影演员秦怡当时住在重庆“基督教女青年会”宿舍里，5 月 4 日傍晚，秦怡刚睡下，空袭警报就响了，别的人都自顾逃命去了，只有她一个人还在简陋的小屋里。看门人最后走，以为里面无人，竟将门反锁上了，任凭秦怡在里面大喊“等一等，还有我呀！”也没听见。秦怡无奈中只得飞身上楼，打开窗户跳了下去。她一路狂奔，刚刚到了安全地带，几十架日机就呼啸而至，

炸弹将“基督教女青年会”宿舍炸得只剩下一堆瓦砾。她在自传中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晚走半步，肯定死于非命。”

纳粹旗也保护不了德国人

日机事先确定的攻击目标地区内，并没有中国军队防地和司令部、军工厂，倒是有与外国公馆并立的领事巷和许多教会建筑、天主教堂等。日军司令部在下达给攻击队的命令书中有这样一项：“在实施轰炸时，注意不要损害第三国权益。”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在 1939 年 5 月 4 日这天的大轰炸中，外国在华的一些外交机构也未能幸免，英国大使馆、德国大使馆以及他们在重庆的通讯社和法国教堂等亦中弹，损失惨重。七星岗天主教堂烧毁，幸存下来的只有 30 米高的钟楼和从法国运来的大钟。法国神父雅克·波尔盖斯怒不可遏，拍了好几十张火灾后的照片寄回法国，向本国政府和舆论界报告日军的暴行。

天主教爱国会的刘宗渔主教在解放后回忆说：“（大轰炸）使这一带全都被烧毁，听说与教会有关的人死了 20 个。江北的圣特丽萨教会、沙坪坝的教堂都遭到了轰炸，丁修道女也是这年死去的。现在与教会有关的人中，都没有直接见到过当时的情景。”

美国教堂也在这天的轰炸中被毁，据陈元荣牧师回忆，“五三”、“五四”两天的大轰炸，除圣社交会堂以外，安息会教堂、公戏会、中华基督教会等四处遭大火烧毁。美国牧师莱普尔在日机轰炸后，收集了部分炸弹碎片，他回国在向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日本投下的炸弹是用美国钢材制造的，并阐述了必须改变这种政策的意见。陈牧师当年在重庆陪都大会堂亲眼见到蒋介石亲自主持仪式，把勋章授予回国的美国牧师，意在请他们回去后提请美国政府注意，美国当时仍在与日本进行石油和废钢铁等贸易。

英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在这天的轰炸中有1名外国人和20名中国人被炸死。英国政府接到大使和领事的报告后，责成驻东京大使库莱基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法国领事馆中了2颗炸弹，一幢建筑物全部被炸毁。德国大使馆因周围大火蔓延，受到很大损害，门、窗、墙壁、房顶都遭到破坏。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卡尔·麦当斯拍下的一幅照片：德国大使馆官员在院内展开一幅特大的纳粹旗，意在向空中的日本飞机表示“这里是德国大使馆，请不要轰炸”。虽然日、德两国此时还未结盟，但这幅照片把日本和德国的紧密关系披露给了广大读者。

随着重庆大轰炸的惨状以各种新闻报道和研究报告的形式迅速传回美国，日军惨无人道的兽行，在这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度激起巨大反响。连最不想管“闲事”的美国人也愤怒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各大城市纷纷召开谴责日寇暴行、声援中国抗战的集会，众议院迅速提出并通过中止向日本出口原油和废钢铁的动议，美国政府也渐渐强硬起来，要求日本立即中止在华的战争行为。

“101号作战”的国际背景

1940年5月，随着德国军队突然入侵法国，“西线无战事”的长期僵局被打破了。按照费正清博士的观点，随着西线不战不和僵局的结束，尤其是法国的很快沦陷，使得欧洲战争和东亚战争融为一体，促使一直对德、日两个凶恶的法西斯国家持绥靖政策的美国、英国不得不丢掉任何幻想，开始寻求结成全球性的反法西斯联盟。毫无疑问，一直单独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中国，此时也迫切需要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支持，她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联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成员。英、

美两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支持，美国国会刚一通过了“租借法案”，罗斯福总统随即宣布这个庞大的援助计划既适用于英国，也适用于中国。针对日本在中国的空中优势，美国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和装备，并立即派出“志愿”飞行员和飞机组成“飞虎队”进驻重庆和昆明，直接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第四个加入这个“全球联盟”的国家是荷兰，她在欧洲的本土虽然被德国占领，但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却完好地保存着，荷属殖民地政府与英、美签订了共同防日协定，顽强抵制日本想取得这一地区石油的努力。虽然英、美此时的主要目标还是在如何在欧洲抗击纳粹德国，但在日军肆虐的亚洲，已经产生了所谓“ABCD 集团”(指美利坚 American，不列颠 Britian，中国 China 和荷属东印度 Dutch)，准备采取联合行动遏制日本。

这种新的格局立即使日本做出反应，为了避免孤立，日本急于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结成所谓“轴心国”，并在 1940 年 9 月建立了这样一个同盟。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为日本切断中国外援并攫取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一地区丰富资源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同时，德军高效能的战争机器也为日本树立了榜样：从 1940 年 5 月份以来，纳粹德国的装甲部队势不可挡地突破英、法联军的防线，进逼法国首都巴黎；随着法国主力第 9 军团的投降，英军在敦刻尔克海滩大撤退，法兰西土崩瓦解；6 月 10 日，未设防的法国首都巴黎被德国冯·库希勒将军率领的第 18 军占领；紧接着贝当傀儡政府成立，并按希特勒的要求于 6 月 21 日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国就此被纳粹德国侵占。

日军“101 号作战”计划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德军在欧洲的胜利，除了其装甲部队进展神速外，飞机的狂轰滥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法军统帅魏刚将军在 5 月 20 日视察北部前线时，就曾说过：“最使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德军的装甲师和

飞机，已经使法军的士兵产生了恐惧现象。这要算是德军的一个最大的成功。”德军的这一新的战略战术及其巨大战果，显然使侵华日军大受启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决定增派大批飞机，对坚持抗战、决不投降的中国政府和内地城市加大空中打击力度，对抗战的最后堡垒四川尤其是重庆进行更大规模的轰炸，以迫使其彻底屈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军大本营确定了必须先行建立攻击重庆的桥头堡计划，这就是占领与四川东部紧邻的湖北宜昌，在此建立空军基地，以缩短轰炸航程、加大空袭次数。为此日军在东京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这个新的战略部署，最后日本天皇直接下达了“陆军须解决宜昌”的命令。华中日本陆军大批西进，很快就于 1940 年 6 月 11 日攻占了鄂西重镇宜昌。

在建立宜昌这个桥头堡之前，日军其实已经着手制定并开始实施对重庆的新一轮战略轰炸。1940 年 4 月 10 日，以军令部次长名义发给各舰队司令官的《海战要务令续纺（航空战部分）草案》第 74 条明确规定，“对军事、政治、经济中枢机构、主要交通线等敌国要地进行空中攻击，终止其机能，并破坏重要资源，使敌难以作战，同时挫败敌国民的作战意志，以达到战争目的。”在第 76 条中更规定，“对敌要地的攻击，要用大部队实施猛烈攻击，或不分昼夜执著攻击，不断予以威胁等……”5 月 13 日，当德国轰炸机和装甲部队还在法、比边境地区横冲直撞，比利时军队全线崩溃之时，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就与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协定，由陆、海军组成联合“航战队”轰炸中国内地，并将此行动的代号定为“101 号作战方案”。该方案正式形成了陆、海军协同作战的体制，将作战时间预定为自 5 月中旬起约 3 个月的时间内，方案将“要地攻击”的作战思想也定型化了。“101 号作战”计划制定的主要攻击目标，仍然是重庆、成都。

空中截击：维系无数生命的电波

对日寇这个极其险恶的计划，重庆方面当然是一无所知的。不过自 1939 年 5 月以来的大轰炸给重庆造成的惨重损失，终于使国民党政府清醒过来，开始加强防空工作。尽管仍停留在“消极防空”层面上，但也有一定起色，尤其是在电子侦讯日机动向方面成效显著。1940 年初，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获得大量美国援助的电讯器材的基础上，成立了技术研究室，下设 5 个工作站，分防各战区，侦截日机活动情报，从而使重庆防空指挥部门从破译的日空军密码电报中，掌握了敌机的动向，及时发布不同的空袭警报，指挥全市居民进入防空洞以躲避日机的轰炸。其中对重庆防空工作贡献较大的，要数 1940 年 8 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六电讯工作队。

自战争开始后，每年 5～8 月，几乎每逢天气晴好，能见度高时，日机就要来空袭重庆。由于敌机每次出袭基本上都没遇到有效的抵抗，在倾泻炸弹后，即人机无损地“胜利返航”。只有在每年 9 月以后，重庆在白昼有雾，直到次年的 4 月浓雾消失以前，才是敌机较少空袭的期间。驻重庆的中国空军，既然无力用飞机截击日本空中强盗，就只能依靠电讯侦察手段了。电讯工作队用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线电电波，在武汉到重庆 700 公里的空中，筑起了一道维系千万人生命的无形屏障。

据当时在这个工作队担任情报工作的邱沈钧、丁绪曾回忆，第六电讯工作队成立后，使重庆对日本空军电讯防空方面的业务逐步走上了正轨，基本上已能及时侦获日本飞机出击和气象各方面的确切情报，也就是掌握了敌机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当时重庆工作队队址设在浮图关下的徐家坡，隶属于驻上清寺的空军第一路司令部。两者之间架设有专线电话，工作队侦获情报后，及时用电报、电话报告司令部。从 1940 年 6 月到 1941 年 8 月，在日

寇飞机执行“101号”、“102号”作战计划频繁空袭重庆的阶段，电讯工作队在预警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敌机每次大编队空袭重庆前，几乎都要先派出侦察机进行侦察。该机在武汉到重庆的航线上，对沿途各地的气候情况不断向基地发报，内容有天气总体情况、云量大小、云层高低、能见度如何等项目，同时还要报告重庆四周各飞机场有无中国战斗机驻守等。电讯工作队破译敌侦察机发出的报告，可以判明敌机是否来重庆空袭。如果天气有利敌机执行轰炸任务，大批轰炸机就会当即由武汉起飞，这已成为一种规律。

敌机空袭的航线，一般均由武汉起飞，经湖北沙市、宜昌进入四川，沿云阳、万县、涪陵等地抵达重庆。敌机执行轰炸任务后，仍循原路返航。根据这个特点，电讯工作队即可从敌机飞行需要的时间和距离重庆的里程等情况来决定发布哪一种警报。敌机的袭击十分频繁，只有发布恰当的警报才能确保重庆全市军民的安全，有利日常工作和老百姓的生活正常进行。

敌机袭击重庆也要受季节和气候的限制。每年秋季，重庆在上午经常被浓雾笼罩着，雾重庆的天气一直要延续到次年的初夏。这段时间敌机受雾季不良天气影响，很少来骚扰，大编队的轰炸是不会有的。每年的5月到8月，则是空袭的高潮季节，这段时间天气晴朗的日子较多，老百姓有预感，每天早晨做好逃警报的准备。空袭警报一发布，市民都能够较有秩序地进入防空洞内躲避。

邱沈钧和丁绪曾在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使我们迄今难忘的一次空袭，是1940年初秋的一天。那天电讯工作队在获悉敌机要来空袭时，队长冉一鹤随队赶往防空情报所，主持侦译工作。上午10时左右，先后有3批日本强盗飞机窜入重庆市区投弹。冉一鹤坚守岗位直到下午1时许。解除警报发布后，他得知徐家坡一带被炸，急忙回家去看看，只见多处房屋被炸塌，空中因被炸扬起的烟尘‘雾气’尚未降落。他见此情景，有些着慌了，急奔家

人躲避的防空洞去找亲人。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小防空洞因洞口被重磅炸弹炸塌，大批石块堵在洞口，又被厚厚的泥土封死，冉一鹤全家亲人都被活活闷死在洞内。经大家将洞口挖开，冉一鹤所能见到的，已是亲人们的尸体。几小时以前还是活生生的妻儿家人，竟不告而别。只见冉一鹤呆若木鸡，既哭不出声，也流不出泪，当场就昏厥了过去。一个坚守阵地的防空工作者，面对全家老小惨死在日寇的空袭之下，这是多么惨烈的悲剧场面！“1941年夏天，发生了一个例外的情况：那天已侦译出敌轰炸机3个大编队，起飞后正向重庆袭来。当我们译出敌机最后一个大编队向武汉基地发出飞临涪陵上空的报告后，防空部门据此发出了紧急警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明显地早已超过敌机从涪陵飞抵重庆所需的时间，但仍不见有敌机在重庆上空出现。防空部门十分纳闷，无法判明敌机的行踪。正在猜测之时，我们突然侦译到敌领队机向基地报告，称‘涪陵上空天气突起变化，雨云在低空中不断增加，飞机在云上无法寻觅目标’，向基地请示应如何执行轰炸任务。不久，我们又侦译到武汉基地发出的复电：‘改袭梁山，向机场投弹后，即返航。’重庆防空部门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并立即发布解除警报。由此可见，电讯工作队侦译日本空军电讯，对防空机构是相当重要的，是他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这样估价并不过分。”

虽然能够及时侦知日机来袭的重要情报，但重庆的防空力量仍不足以阻止其大规模的入侵，使重庆只能在强敌的残酷进攻面前消极躲避，终于还是演成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日机驾驶员报告：几乎每天都有百吨炸弹落下

1940年5月18日，在德军7个装甲师组成强大的楔形队伍

向英吉利海峡凶猛推进的同时，第一批 24 架日机飞临重庆上空，对重庆白市驿和广阳坝机场开始进行整整三天的轰炸，意味着“101 号作战”再次拉开了战幕。5 月 20 日，市内夫子池、中国路、七星岗一带被日机投下的密集炸弹、燃烧弹击中，炸毁民房 80 余幢，市民死 56 人，伤 134 人。5 月 26 日第 4 次攻击以后，城市街道也列入了轰炸目标。之后两天，日机着重轰炸重庆市郊正在建设的小龙坎、磁器口等新街道，中央电报局全部被炸毁，广播电台破坏严重，中央日报社、国民公报社遭到破坏。据日军联合空袭部队的攻击一览表报告，重庆近郊的两个钢铁厂破坏严重，弹药库全部被炸毁。

在持续三个多月的“101 号作战”大轰炸中，据日军联合空袭部队司令部关于“101 号作战概要报告”称，海军轰炸重庆（后来包括成都）所用的飞机总数是 1 737 架，陆军 286 架，投弹 1 405.66 吨，不仅给重庆人民肉体上、更给他们心理上带来惨重的创伤，其损失丝毫不亚于“五三”、“五四”大轰炸。这期间日机给重庆造成的几次重大损害，现分类概述如下。

商业、金融机构受损情况

5 月 22 日，日机 63 架自湖北飞袭重庆，沿长江来回轰炸，储奇门、太平门、望龙门、朝天门等处接连中弹，重庆“下半城”顿起大火。商业场、中国工商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重庆川盐银行等工商、金融企业损失惨重，大量商品及办公用品被焚毁，来不及躲进防空洞的 8 名银行职员被炸死，另有 27 名居民受伤，送往医院抢救时又死亡 3 名。

5 月 26 日清晨，担惊受怕一夜的市民刚出防空洞，市内又响起紧急警报，日军陆、海军航空队出动九五式、意式重型轰炸机 36 架，自汉口飞袭重庆，投掷爆炸弹、榴弹约 108 枚，全部命中

城区。大溪沟电厂首先中弹起火，厂方被迫拉闸断电，而因断电水泵不能启动，又给救火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重庆打枪坝水厂水塔及附近的金刚塔，均中弹片，沿江抽水泵船被炸沉 3 艘，供水中断达 12 小时。正在坚持生产的职员、工人死 7 人，伤 24 人，其中重伤致残者 6 人，民房被毁 150 余幢。

学校受损情况

5 月 27 日上午 9 时，日军出动总数达 99 架的大机群轰炸重庆，其中一支飞行机队径直飞往北碚，四处投弹，从未遭到过轰炸的复旦大学校园乱成一团，教务主任孙寒冰教授当场被炸得血肉模糊。孙教授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曾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死后遗下妻子和子女 4 人，当时的《新华日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就在孙教授刚刚倒下不到一分钟，又有 2 枚炸弹相继在复旦大学校园内爆炸，炸死职员汪兴，学生朱锡华、刘晚成、汪茂泉、陈仲瀛、王文炳等 6 人，炸伤 4 人。刘晚成系重庆金融界巨头刘航琛长子，轰炸开始时他正在宿舍，慌忙中钻进床下，就在这时，日机俯冲扫射，一串机枪子弹破窗而入，击穿床板，将躲在床下的刘晚成当场打死。复旦大学法语教授蒋碧徵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住处附近就是复旦大学医务室，轰炸过后，一批批受伤的同事同学以及老百姓被抬着、搀扶着出来，施以紧急救治。他们肢体破碎，血流如注，惨状真是触目惊心！有一位同学大概已被震死，全身毫无伤痕，眼睛也睁着。另一位同学两膝中了弹片，皮肉翻开，变成两个血球。看了他的伤势，我只感头皮发麻，而呻吟号叫之声仍然时时刻刻在耳边回响……"

以后日机每两三天袭击一次，不仅大学而且中、小学也遭到了惨烈的轰炸，致使重庆大部分学校停课，儿童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中。

6 月 28 日这天刚过正午，约 120 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奔袭重庆，投下了 1 000 多颗燃烧弹。因连日酷热异常，空气十分干燥，各处发生火灾，火势猛烈，席卷全市，无法扑灭。沙坪坝地区集中了许多教育机构，抗战爆发后从上海、北京、南京等地迁来 19 所大学，其中大部分在这个区。据《新华日报》报道，国立中央大学被炸毁，教职员住宅被烧毁，幸好时值暑假期间，教师和学生死伤较少。

工业区受损情况

7 月 31 日，日本海军第 13、第 5 航空队出动 88 架中型攻击机，日本陆军第 60 飞行机队出动 36 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共 124 架分头轰炸重庆市内外目标，在渝的豫丰、裕华等纱厂和资渝、资蜀炼钢厂，以及大鑫、新民等机器厂，大渡口、渝金等钢铁厂以及龙章造纸厂、康元制罐厂等工厂，遭到多次轰炸，被迫停工。工厂员工及市民死亡 68 人，受伤约 800 人，房屋毁坏 3 308 幢。

6 月 10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4 时 35 分，日军战斗机、轰炸机混合编队共 129 架分 4 批空袭重庆，中国空军和地面炮火进行了阻击，但因力量薄弱，未能阻拦日机进入市区。中兴钢铁公司和外地迁川的金陵兵工厂先后中弹数十枚，遭到毁灭性轰炸，员工死亡 46 人，轻、重伤 162 人，厨房及员工宿舍 68 幢坍塌。轮渡、趸船 4 沉 7 损，嘉陵江客运中断，两岸职员、工人多有不能返家者。

8 月 2 日，日本陆、海军联合出动飞机 124 架，空袭重庆近郊工业区。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情报所等单位综合报告，在日机空袭中，顺昌、大鑫、上海、大公、华生、三盛、恒顺、新民等厂均受不同程度损失，另有 22 家兵工企业遭到轰炸，全市

工业区还频频起火，员工死 17 人，伤 80 余人，房屋毁坏达 250 余幢。

外交使团受损情况

1940 年 6 月 11 日，自湖北飞来日机 126 架，分 4 批袭击重庆，投弹 200 余枚，全市被炸死 23 人，伤 44 人，房屋焚毁 70 余幢。苏联大使馆中弹 2 枚，大门和武官办公室被毁；塔斯社中国总社大门被炸塌；德国海通社被燃烧弹击中，房舍、用具焚烧一空；法国哈瓦斯社房屋被炸，1 名厨子死于非命。

关于这天的轰炸，日军联合空袭部队自己的记载是：由海军联合空袭部队 4 个攻击队 79 架飞机和陆军第 3 飞行集团 36 架重型轰炸机组成 115 架轰炸机编队，于下午 1 时侵入重庆上空，白天强行轰炸了 A 区（江北地区）和 H 区（川东师范、浮图关、化龙桥地区）。重庆《新华日报》的报道是："117 架日机同时侵入市空共投炸弹、燃烧弹 200 余颗，死伤 60 余人……这次轰炸不仅市中区损害严重，苏联大使馆亦多处中弹，法国哈瓦斯社、苏联塔斯社中国总社房屋全部倒塌，殃及外国设施……"

从 1940 年 5 月 18 日开始一直持续到 9 月 4 日的"101 号作战"，在 112 天时间内，重庆遭到了 72 次狂轰滥炸，平均每 1.5 天 1 次。据日军侦察机飞行员从空中观察后报告："6 月中旬以后，陆上攻击队连日全力出动，集中攻击重庆。此时侦察机拍摄的重庆面貌逐渐发生变化，成为一片悲惨的废墟，几乎每天都有 50 吨至 100 多吨的炸弹落到市内房屋密集地带，整个街市已成为一片瓦砾和灰烬……山口多闻司令官有时亲自乘指挥机，率先表示决心。到 7 月上旬，约两个月时间，全力出动攻击重庆，有时上午、下午连续出击，从上空看，重庆一片白色，极有可能完全成了一片废墟，奄奄一息……"

美国大使的目击：空袭目标皆非军事设施

1940 年 5 月 28 日，顽强抵抗德国装甲部队和大规模空袭的比利时军队，终于彻底崩溃。这天清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正式宣布向德国投降。也正是在这同一天上午，日本空军当年对重庆最大的一次空袭开始了。

“中国派遣军”联合空袭部队出动 94 架轰炸机，兵分 3 路，由高雄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 36 架飞机轰炸广阳坝机场，第 15 航空队 26 架飞机攻击江北区金陵兵工厂及附近目标；另一路第 13 航空队 32 架飞机对市中区川东师范学校一带进行空袭。特别是对城市街道进行轰炸的第 13 航空队第一攻击队 32 架飞机从西北方向侵入市中区上空，从 6 000 多米的高空投掷 250 公斤的炸弹 62 颗、60 公斤炸弹 128 颗，造成严重损害。地面上虽有国民党中央本部的“政治机关”，但该地学校和住宅大量集中，顷刻间四处起火，血肉横飞，无辜居民被炸死 178 人，伤 408 人，烧毁和倒塌房屋 700 余幢。

当天，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从市中区的大使馆目击了轰炸的始末，直接向华盛顿的赫尔国务卿报告称：“今晨，日机对重庆市区进行了数月来最猛烈的轰炸，两队日机向商业区和住宅区投炸弹，估计死亡数百人，据使馆调查，美国侨民安然无恙……”

4 天之后的 6 月 1 日，约翰逊大使又向国务院发电详细报告：“我目击了 28 日的空袭，经注意观察发现，日机似无意命中任何军事目标，炸弹是对离日军占领区 500 英里、不设防的开放城市投下的。”

6 月 11 日重庆遭轰炸后，美大使当夜 8 时即向华盛顿发出急电称：“财产遭到了严重损害，虽然死伤人数尚未查明，但因有效运用了避弹壕，故不致死伤过多。”

第二天，重庆再次遭袭，日海军 75 架飞机和陆军 36 架飞机，

对 B 区（城内东半部）、A 区、H 区进行猛烈攻击，死亡 222 人，连同昨日共死亡 286 人，伤 635 人（据日方统计），《新华日报》发出愤怒的呐喊：“倭寇的兽行比以前更凶残！”当天约翰逊大使再次向华盛顿紧急报告情况称：“今天对重庆猛烈进行无区别轰炸，以市商业中心地区为主要目标，进行集中攻击，损害程度是 1939 年 5 月 4 日以来未曾有过的……”

在这一年之中，美国都在与日本政府进行所谓的“谈判”。日本急于想获得美国对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的正式承认，而美国则以日本撤军为先决条件。其实美国的谈判不过是为准备军事行动拖延时间的手段而已，它早已打算用武力解决日本问题了：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美国太平洋舰队正从加利福尼亚基地调往夏威夷，同时石油禁运和断绝日美贸易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接到重庆“大轰炸”的报告后，罗斯福总统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二天即致电赫尔国务卿：

“非常明显，对与军事设施无关的重庆进行无区别轰炸，难道我们不应该唤起日本政府的注意吗？”

赫尔立即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重庆遭到的残酷轰炸“严重关注”，并致电东京的美驻日大使格鲁，将美国政府的声明提交日本外务大臣。

已经欲罢不能的日本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对重庆的轰炸，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着。

顽强抵抗引来“零式”机参战

在“101 号作战”开始后，日机遭到了重庆防空力量有史以来最顽强的抗击。苏制伊 15、伊 16 战斗机性能高于日机，由苏联空军志愿人员驾驶的这些飞机，涂上国民党空军的徵记，在重

庆上空与日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此外，由美国训练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的美制霍克式战斗机也参加了重庆保卫战，因而防空力量得到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加强了电子侦讯敌情工作，重庆防空部门可以说对日机来袭的时间、航程、批次、架数及有无护航战斗机等重要情报有所掌握。虽然保卫重庆的空军力量仍然有限，日机在总量上仍占压倒优势，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不能拒敌于门外，但却能给入侵之敌以重创。国民党的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连《新华日报》也报道说“我空军用闪电战术同日机作战”、“以猛虎扑羊的队形穿入敌阵”。在 6 月 9 日空袭重庆后，日本联合空袭部队指挥官在呈交井上成美参谋长的战斗简报中，对损失一项记述是：“第二攻击空战后，指挥官座机（有小谷少校、池田大尉、矢野空曹长和士官兵 5 人）遭紧追而来的战斗机集中射击，在重庆东部约 80 里处自爆。另外，重伤 1 名，20 架飞机中弹受损。”空战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据武汉 W 基地日军航空指挥部的统计，在整个“101 号作战”的三个多月中，日本海军和陆军各损失 8 架飞机，战死 111 人，伤 49 人。日机最大的损失是轰炸最高潮的 6 月，海军联合空袭部队 5 架中型攻击机被击落，机上人员死亡 43 人。每次日机来袭，重庆上空都要发生激烈的空战，日机被击落 97 架，被高射炮击中的飞机 57 架。重庆防空司令部第一处的“历年敌机袭渝高射部队战斗战果统计”表中，关于 1940 年的记载是击落敌机 10 架，伤 44 架，主要是指这一阶段的战果，与日方的统计大致吻合。同月，日本陆军重型轰炸机队 67 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被击中，损失 4 架，侦察机 2 架被击落。

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日军联合空袭部队，迅速由国内调来一批刚研制出来的最新式“零式”战斗机进驻武汉 W 基地。这种舰载机由于其续航能力强、机动性极好、火力强大而在“二战”中曾煊赫一时，其性能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所有工业国家能够生产

的主力战机。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也屡屡尝到它的厉害。“零式”战斗机第一次出击，是在 8 月 19 日的空袭中为日本轰炸机群护航。由于事先获得有关“零式”机参战的情报，中国空军有意避战不出，这天日机空袭没有遇到任何拦截，因而造成了地面重大损失。据重庆防空司令部《空袭损害统计表》记载：“敌机共出动 135 架次，投弹 411 颗，死亡 181 人，伤 132 人，损坏房屋 2 194 栋。”日军预计的“101 号作战”是 9 月初结束，但实际上一直持续到 10 月底重庆“雾季”开始后。在 9 月 13 日的空袭中，护航的 13 架“零式”飞机才首次跟中国约 30 架战机交手，据日军司令部的统计，中方约有 27 架飞机被击落，之后日机又重新掌握了制空权，重庆再次陷入深重的灾难中。

在此期间，关于中国空军受创的情况，我们现在能找到的保存完好的记录，是 1940 年 10 月 1 日空战，紧邻重庆的璧山县政府后来给四川省航空委员会的一份电报，电报称：“本月元日（即 10 月 1 日，引者注）敌机与我机在县境空战，所有我机及飞行员伤亡情形及办理善后经过，谨呈如下：① 我机被迫降落县境，经派员四处清查，共计十三架，飞行员负伤 3 名，阵亡 10 名……② 跳伞负伤飞行员武振华、王广荣、王特全经本县自卫队防护团分别寻获救护，卫生院救护队包扎伤痕，予以治疗慰问、执行后，均送交空军救护车运走；③ 我阵亡飞行员经派人寻获掘得尸身后经分别清洁，一律以白洋布裹尸并赶制内棺 10 口装殓，各覆国旗以示尊重……”

当时空战情形虽已无法重现，但这一纸“代电”却可以让人想像其激烈的程度。

美国著名作家史沫莱特在“101 号作战”期间，正好在重庆，她写道：“当轰炸机来到上空时，我已习惯卧倒在沟里。日军的空袭机群由 30 至 50 架轰炸机编队组成，时常分三至四批不断地飞来，我们时常站在日方宣布的安全地带南岸的山顶上，一边抱着

虚幻的安全感，一边眺望着北岸的城市被炸。我刚到这个城市时，中国甚至有 24 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敌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战斗机逐渐少了，有时只能看见一架中国战斗机在逆江而来的敌轰炸机队后边追逐，那时我常想，我能为那架小小的飞机写下一首不朽的诗篇，该有多好啊！”

狂轰滥炸中，也有一个美国人“受益”

在日机长达 72 天连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中，倒使一个美国人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他就是美国空军援华志愿人员，蒋介石的航空顾问，后来大名鼎鼎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空袭警报响时，陈纳德从不躲避，用怀特的话来说，他就像一个足球教练，当比赛临近时研究对方的记录照片一样来研究日机的编队情况。他正带领中国空军和美国志愿飞行员，想方设法努力制定同日机对抗的战术。陈纳德这位优秀战斗机驾驶员、退役的美国陆军准将，像忠实的“空袭观战武官”一样详细地观察日机轰炸的全部情况。根据观察和研究，陈纳德当时在脑海中萌发了两个对付日机的主意：一个是有关轰炸城市时，燃烧弹的有效性；另一个是将来同日本海军投入中国战线的新式舰载“零式”战斗机作战时的有关方案。正当“零式”战斗机自负地夸口“重庆上空无敌机踪影”时，蒋介石的这位沉默寡言的航空顾问，抬头看着“零式”战斗机的编队，反复思考，制定出了一种崭新的战术，给日机以重创。

在“101 号作战”结束后，陈纳德就致函美国空军总参谋长阿诺德将军，建议发展日军使用的五磅燃烧弹，用于以后如法炮制。3 年后，陈纳德将军回到美国陆军担任航空部队司令官，在滇缅战线上给日军以重创；他的同伴则率领 B-29 轰炸机从成都附近的双流、新津等七大机场起飞，对日军的汉口空军基地和“零

式”战机的出发点日本大村工厂、横须贺等地，进行猛烈的燃烧弹集中轰炸，取得极大的战果。

在持续时间最长、最大规模的“101号作战”空袭之后，还有更大的灾难即将发生，重庆在劫难逃。

震惊世界的“大隧道惨案”

1941年6月5日，因日机轰炸造成的重庆“大隧道惨案”，短短数小时之内死伤近万人，景况之惨、受害之重，震惊全世界。“大隧道惨案”从而与“黄河决堤”、“长沙大火”一道被列为抗战期间中国的“三大惨案”。

这是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将足足百万日军死死拖在中国战场上，使其无法抽身配合德国即将对苏联发动的进攻，并为英、美准备在亚洲和太平洋与日本最后摊牌决一死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人民对侵略者英勇顽强的抵抗终于赢得了英、美两国由衷的敬佩，支持中国抗战到底的呼声越来越高，就连美国工商界巨头们也强力支持全美抵制日货运动，同时提供了一笔3.5亿美元的援华贷款。1941年7月25日，也就是在发生了重庆“大隧道惨案”的一个半月后，罗斯福总统在财界人士的强硬支持下，亲自宣布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一切资金，英国、荷兰立即响应。到了8月17日，一纸更为强硬的通牒送到了日本驻美大使野村手上：“美国政府现在认为有直言相告日本政府的必要：如果日本政府今后仍继续推行其对于邻国作军事支配或军事威胁的政策和计划，则美国政府将被迫立即采取必要步骤，来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这个第一次把中国所受到的攻击与美国安全联系起来的官方文件，实际上等于是宣战书，美日开战只是时间问题了。

1941 年，本来是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在重庆，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隧道惨案”。这次惨案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尽管造成惨重损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机的侵袭、骚扰，但众多市民并非直接死于日机投掷的炸弹、燃烧弹爆炸，而是自己内部的大混乱所致。这笔血债归根结底还是要记在日本侵略者的账上。但作为世界灾难史上一场极为罕见的巨大“国耻”，其中也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自己好好地总结和汲取。

事情已经过去 60 多年了，“大隧道惨案”几乎被人们淡忘了。今天的重庆日新月异、面貌全新，大隧道所在街区高楼林立、歌舞升平，隧道正在改建为重庆轻轨。然而一段极其惨痛的历史、无数冤死的灵魂就此湮灭在黑暗的地底深处，实在令人痛心和惋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这样的“国耻”永远不在中国大地重演，我们不惜翻开这沉重的一页历史，撕开国人身上陈年的疤痕，重现当年的惨状，让我们的子孙千秋万代永远牢记!

“大隧道”的由来

所谓大隧道，是指当年的重庆市区内经由临江门、南纪门、千厮门、公园路、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等地段的一条长长的人工地下通道，1938 年开始开凿。当局的初衷，并不是把它作为防空之用的。据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办公室主任的谢藻生介绍，当时重庆行营有位留学美国回来的组长谢贯一，最先提出仿照欧美国家发达的地下交通，利用重庆特殊的地形开凿地下通道以解决市区街道狭窄、交通不便的建议。报告提交行营主任顾祝同审查并获赞同后，适逢全国禁烟委员会正好有一笔 50 万元的税款要

交重庆行营，顾祝同即命令行营工程教导员左应时、公路监理处副处长彭先蔚，会同重庆市长李宏锟、市府秘书长赵子英组织地下通道的筹办。计划既定，不料这笔烟款却被蒋介石临时批下一纸“手条”，挪作更为紧迫的川陕公路建筑之用，此事只得作罢。

后来战事吃紧，重庆遭到日机频繁轰炸，市民死伤惨重，重庆防空司令部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开始积极进行防空工事的构建。曾任刘湘手下的炮兵司令蓝田玉建议在老城区开凿大隧道，战时用于防空避难，平时可作地下交通要道。有关部门组织重庆地方政府和商家自行筹款，开始了工程施工。开凿的隧道有两条，一条是朝天门至通远门，另一条由临江门、夫子池、石灰市、保安路、大梁子等处横贯市区东西南北四门，共有 13 个进出口。当局还设置了专职的“大隧道工程处”，由防空副司令蒋逵（即刘湘原来的“航空司令”）任处长。两条隧道分段施工，不久又因经费困难，工程骤然停止。

此时日机来袭更加频繁，因市区几乎无防空设施，损失越来越大。情急之中防空部门想到了这几段未完工的地下隧道，于是决定开放已凿通的临江门至十八梯等 7 段隧道，作为防空洞供市民使用。其中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 3 段地下通道内部连通为一组，后来的大惨案就发生在这一段，尤以十八梯处最甚。

由于时间仓促、经费不够等原因，而且大隧道的设计也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负责的工程师之一谢元模后来专任工程处副处长，在惨案发生后就因其“失职”被蒋介石亲自下令记大过两次。其他技术人员也都是学土木工程的，对隧道工程并不内行，他们甚至对某些地段究竟多长、到底能容纳多少人也未测算清楚。隧道的主要设计者谢元模后来对调查者说，在通常情况下可容纳 7 000 人以上吧。日本学者前田哲男为调查重庆大轰炸实况亲临现场观察，估计发生惨案的这一段防空洞“全长 2.5 公里，正常定员 4 300 人，最大容量是 6 555 人，洞内保持着大人能站、能走……”。各

段防空隧道的容量，以出事地段的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这一组为最大，正常情况下可容纳 4 000～5 000 人，紧急形势下大批人员涌入，实际人数肯定超过此容量。因此，日本人前田哲男的估计，是比较可信的。

由于设计上的草率，大隧道防空洞内各处宽窄不一，不少出入口和通道还有急弯和直上直下的梯坎，既长且陡，又湿又滑，正常行走都极为困难，拥挤时更易跌倒。发生惨案的这段大隧道出入口，除十八梯一处洞口还较平坦外，其余都是斜坡梯级式，出入洞都要上下陡坡转急弯，一到急迫时刻，危险可想而知。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审查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也明确指出："本隧道设计不良，气流不畅，洞口位置太坏，高度不足，石级角度太陡，行人上下，即使不拥挤也易颠扑。洞口泥泞不除，单人徐步，也易滑倒。"

更令人奇怪的是，死人最多的十八梯和演武厅这两个洞口的木栅门全是向内开的，只有石灰市洞口的木栅门向外开。后来的调查者无不诧异，真不知设计者为何会做出这种难以解释的设计？当洞内拥挤堵满了人的时候，洞门向内怎么能够打开！

建洞初期没有设置通风、照明设备，仅用煤油灯照明，不仅光线昏暗，而且因煤油燃烧耗去大量氧气，通风口又开得过小、距离过长，呼吸条件十分恶劣，极易使人窒息。此外，洞内多处未设计坐凳，时间一久，避难者体力难以支撑，等等，这些都给以后的窒息大惨案埋下了祸根。

其实完善这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最起码设施，并不需要花很多钱。在修筑大隧道的过程中，所谓经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些大小贪官污吏无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大肆贪污，冒领经费私分，在施工中偷工减料，擅自取消必需的设备。如大坪朱家花园岩下所建的防空司令部的防空洞，原批下的经费是 40 万元，作为开凿石洞的工料费。岂知石洞开到 3 米深度时，却发现底下原

来是一个天然的大溶洞，可容纳上千人在洞内办公，因此工料费可省一大半。贺国光接替刘峙出任重庆防空司令，为了分赃，经协商由前任刘峙报销了 28 万元，后任的贺国光报销了 12 万元，工程的大部分经费落入了他们两伙人的腰包。正是在这种贪污腐化、人人敛财自肥的情况下，大隧道虽能容纳大量躲避空袭的人们，但内部却由于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设施，而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大隧道的管理也存在很多漏洞。初期由各地区防护团员兼任清洁工作和排除积水，但他们都是义务劳动，责任心不强，往往达不到要求。后来改由市警察局清洁总队负责，清排工具由防空司令部发给，并给予一定的报酬，情况才有所好转。客观地说，当局确也经常组织工程人员定期检查洞内岩石风化、裂缝和木柱支撑等情况的变化，以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建洞初期，为便于能够紧急出入，13 处进出口并无门栅互相隔绝，但后来发生了不法之徒利用隧道作为藏身之地，甚至发生过杀人抢劫的刑事案件，于是在各出入口装置了木栅门，紧紧锁上，使人不能自由通行，这又给日后的大惨案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防空洞的等级之分

1941 年后，日本袭川空军部队强化“疲劳轰炸”的战术，即用数批小股飞机，利用黑夜轮番不断地窜入重庆且不断盘旋在市区上空，一改过去扔掉炸弹就返航的惯例，进行不间断地袭击。这样虽然每次实际损害并不太大，但却给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使重庆防空司令部一时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果断地发布解除警报的信号，使群众无法及时走出防空洞来呼吸新鲜空气。

当时的重庆市有 1 800 余处防空洞，按使用人员的不同身份

和职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供政府首脑、国民党高官及财界大亨个人专用；第二类是各机关和公司等事业单位的专用洞，称为“民间防空洞”；第三类才是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洞。公共防空洞不分对象、不定人数，设备不齐，当然内部条件差，环境恶劣。第一、第二类高级防空洞，门口有卫兵严密把守，须凭证进入，设施齐备、防护坚固，非常安全，于是就被人用来投机营利，导致“入洞证”的倒卖猖獗一时。

“五三”、“五四”大轰炸时，曾在罗汉寺石佛凹岩陷缝中避难的防护团员曾治维，后来换了工作进了实力雄厚的“崇德”进出口公司。公司为职员购买了进入民间防空洞的出入证，有效期一年。曾治维拿到入洞证，听说一纸证件竟值两千元，而当时一般员工的月薪才不过几十块钱，他感到极为惊愕。当然，民间防空洞比起公共防空洞来，位置和内部设施以及等级都优越一些，并且保证不会像较场口隧道那样拥挤不堪。尽管如此，一张有效期一年的入洞证要花两千元才能得到，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

第三类的公共防空洞后来也要凭证进入，即用提供劳动力挖洞的证明书，才能换回一家人一张的入洞证。经常出入公共防空洞的韩素音女士在《无鸟的夏天》一书中写道：“人们清早起来，空袭警报一响，就带上手提行李，把坛坛罐罐搬进防空洞，在洞里度过一天。1941 年日机连续 7 昼夜轰炸未受阻击时，在洞中时间长也有许多人死亡，特别是幼儿不堪暑热，因极度疲劳和痢疾而大量死亡。”

可容纳数万人的大隧道就属于这类低级的“公共防空洞”。早在三年前，就有人在报纸上对重庆民用防空洞的种种糟糕情况发出了明确警告。1938 年 3 月 15 日的重庆《星渝日报》副刊“前线”版上，刊登了该报编辑廖隐泉的文章，指出重庆市内大小防空洞情况令人堪忧。作者经过实地考察，举出四个弊病：一是壕

中普遍有水，遇雨成溪，难以下脚；二是平时不开门，有人偷偷进去大小便，遍地污秽，成为蚊、蝇繁衍之地，人藏之于此，“虽不死于空袭，难免不死于‘传染病’”；三是防空洞大都通风不好，“通气管开得少且不够大，多有得几人，即令人发闷”；四是光线不好，没有照明设施，“黑暗得可怕”，而防空洞大门却不知为什么漆成白色，老远可见，“极可能成为敌机之目标”。

这篇文章还指出，上述情况尤为严重的地方是市党部、夫子池、中央公园等地的防空洞。作者最后痛心疾首地呼吁当局，赶紧设法改变，否则恐造成大患。

然而，这篇登在一张小报上的警告，却无人理会，廖隐泉的预言，三年之后不幸竟成了现实！

大惨案实况概述

1941 年 6 月 5 日傍晚，雨后初晴。按照气象情况和当时敌机空袭的一般规律判断，这种天气往往不会有空袭，于是疏散到市郊的市民和公务人员陆续回到城里，人人都比较放松。但偏偏事出意外，18 时许预行警报突然响了，虽然还在路上的行人十分惊慌，但市区居民却比较镇定，照例在家用过晚餐，然后才收拾好细软，扶老携幼陆续走向各处的防空洞。

其实这次日机的夜袭规模并不大，据后来防空机关估计，总共大约 24 架中型轰炸机，分成三批，每批仅 8 架飞机连续不断地进行夜袭。这次夜袭只是骚扰性的，首批敌机并没有侵入市中区上空，只在南岸地区盲目投下一些中型炸弹就返航了；接着又是第二批空袭，胡乱投弹、扫射一番，又迅速离去。此后每隔半小时左右，又如法炮制。这本来是重庆市民在去年日寇“101 号作战”中已经习惯了的“疲劳轰炸”战术，但由于当天的空袭是本

年度第一次在夜晚实施，日机居然收到奇效，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了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日寇所投入的飞机不多，但却连续不断，整夜都有敌机在市区上空盘旋不停，时而投弹、时而扫射，警报长达 5 个小时无法解除，从而使重庆防空部门判断失误，防空观察哨在黑夜中也无法识别敌机的架数、批次，以为是大规模的空袭，于是在全市范围发布紧急警报，而且长时间不予解除，自己乱了阵脚。这是造成“大隧道惨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防空指挥机关一乱套，毫无思想准备的市民当然更加惊慌失措，他们争先恐后地就近逃入大隧道防空洞避难。在可容纳数万人的大隧道之内，挤满了市区内附近几条街上的人。因突然空袭，从南岸、江北来的人，提着大包东西的老人，带着几个孩子的母亲，等等，根本无法进入专用的防空洞，只好就近躲进了大隧道。一时间，洞内人数超过了容量的一倍以上。发生惨案的较场口地区地面上，专设的用来调整人们出洞换气的辅助警报信号红绿灯球，此时恰恰又坏了，使得逃往附近演武厅、石灰市、十八梯等处地下隧道内躲避的人们发生误会，以为大批敌机临头，本来在洞外观望的大批人顿时惊慌失措地蜂拥进洞，包括维持秩序的防护团、空袭服务队的人员也惶恐起来，跟着大家一哄而入。据重庆防空司令部 1942 年 8 月 10 日向美国防空当局通报大隧道惨案情况的《重庆六五空袭情形及改进办法》称：“空袭服务及其他人员多不事先入洞，一有事故即蜂拥而入，致使拥挤践踏，此为一最大原因。”这个报告现在看来似有推卸责任之嫌，但当时空防人员素质较差，不能恪尽职守、临危不乱，确实加大了局面的混乱。一时间，大隧道内挤满了人，不少地段根本没有通风和照明设备，长达数千公尺的大隧道一片漆黑，只靠几个进出口通风。而这些进出口处为了防止炸弹碎片飞入，又筑起一道很厚的石墙，再加上隧道地势低洼，更使空气不能畅通。

造成这一大惨案的原因，当时不知内情者有一种说法是，洞内的通风机突然坏了，无法输送新鲜空气入内，从而使众多的人窒息而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 1940 年，隧道工程处就与华中公司机电工程行订立了合同，购买发电机以备直接发电照明，并替通风机供电。这次空袭的前两天，即 1941 年 6 月 3 日，该公司才将发电机安装完成并进行了试车，防空司令部通知公司人员于 6 月 5 日下午 2:00～5:00 验收。但当晚空袭警报发出前半小时，防空司令部也未派人前往验收，整个空袭过程中已安装完毕的发电机竟未开动，无法启动通风和照明设备，以致酿成惨案。事后当局追究责任，防空司令部工程负责人谢元模申辩道："本人非电机专家，因等待电灯厂工程师未到，故未前往验收。"实际情况是：防空司令部为验收之事向华中电机公司索贿，反过来自己又被军政部索贿，三方条件都没谈好，验收就此搁下。因没有验收，防空部门不敢擅自使用所有设备，只好让避难的人们拥塞在黑暗、窒息的洞内，绝望地等待敌机离去，以重见天日。

防空隧道空气污浊，里面的人们呼吸困难想挤出来，洞口外的人由于害怕被炸弹所伤，又拼命往里挤，因而一开始就造成很大的混乱。随着数千人在这段隧道内呆的时间越来越长，纷纷感到呼吸困难，更加强烈要求出洞。洞口的值勤人员多次向防空司令部胡伯翰副司令报告洞内空气污浊，实在不堪忍受。然而这位胡司令却不准许开门通风，一再下令值勤人员维持好洞内秩序。最后由于时间过长，洞内氧气更少，群众实在闷不住了，争着往洞外挤，胡伯翰才将紧急警报改为空袭警报，但已为时晚矣。

惨案发生的确切地点，是较场口附近的演武厅、石灰市、十八梯这三段互相联通的一组隧道。当晚 22 时左右，此段隧道内的民众急于外出，洞内人群有老有少，年轻力壮者争先恐后往外拥，人群不能鱼贯而出，秩序混乱。当挣扎着挤到洞口的人群突然吸到新鲜空气，反而头晕目眩昏迷倒地；多数人则被挤倒在地，使

本来就狭窄的洞口更加堵塞，人群不能畅通。这时又有消息传来，说是日机投毒气弹了，于是洞口值勤人员拼命阻止人群拥出。因害怕遭到毒气的伤害，刚出洞的人们只得又拼命往回挤，里面不知情况的人则竭尽全力往外拥，于是洞内外越来越多的人群挤在洞门口，既不能进也不能出，大门又紧紧闭着，天气极度的闷热，洞内本来就很稀薄的空气这时更加污浊不堪、令人窒息，所有的人都感到再也无法忍受；加之洞外没有组织好救护工作，一再耽误，才造成了这场人为的大惨案。

这天晚上，其他各段防空大隧道避难人数比演武厅、石灰市、十八梯这三段少，当窒息开始发生时，里面的群众还比较冷静，自动开启了未经国民党军政部验收的电动通风机和电力照明，所以没有发生惨案。演武厅隧道内在当晚 19 时左右，窒息情况实际上就开始了。但由于防空情报不准确、指挥失灵，把守洞口的宪兵和警察及防护团员担心所谓“大规模轰炸”造成伤害，坚决不准任何人出洞。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接到大隧道内发生窒息的报告达 4 次之多，但他却粗暴地在电话上吼道：“叫他们放安静些，警报没有解除以前，绝对不放一个人出洞！”卫兵接此指示后，果然将十八梯隧道段的木栅门锁死，并关闭了另外两个洞口，同时开枪警告不顾一切想破门而出的人。

晚 22 时后，因洞内深处已有人窒息死亡，拥往洞口的人越来越多，漆黑的洞内一片救命的惨叫，但守门的卫兵仍持枪威胁人们后退。其实想后退再也不可能了，人们已经丧失了理智，开始相互抓扯、践踏，最先倒下去的人默默死了，后面的又填补上来，最后均在绝望和半疯狂状态中悲惨地死去。

事实上，当时洞内的群众即使将木栅门上的铁锁打碎，也出不来了。因为洞门是向内开的，人们越挤越紧，根本难以打开。这样就使得拥塞在洞口和阶梯上的人们陷于进退两难之境，互相践踏造成的死亡最多，未死的人也奄奄一息，动弹不得，最后又

被活活压死、闷死。短短 2～3 小时内，洞内的尸体就赫然堆满了高高的石阶梯，封死了大门，里面活着的人根本无法逾越，也只好默默地等死。约 1 小时后，门外的防护队员发现洞内渐渐安静下来，知道情况不妙，立即大声呼喊，但却再无人应声。他们迅速劈开木栅门冲进洞去，只见无数尸体已一层层地重叠到洞顶，情景极其令人恐怖。

根据当年防护团员的描述，所有的死者都保持着互相抓扯的姿势，扭结在一起不能分开。一具具尸体浑身汗水如洗，青一块紫一块，无论男女，衣裤都被自己或别人撕扯成巾巾片片，呈刷把状。死者个个双眼瞪得铜铃般大，舌头也吐出口外，全都呈临死前的难受状：有的皮肤抓破，血流不止；有的手指抠地，难以拔出；有的嘴巴啃进泥土，遍体鳞伤；女的几乎都披头散发，口角流血，手足张开，一些孕妇被拥挤践踏而死，腹内胎儿却还在作最后的蠕动。从伤亡的人来看，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女，年老体弱者无力参加这场残酷的“生存竞争”，只好安坐在洞内深处听天由命，因耗氧甚少，反倒得以幸免。

幸存者描绘的“人间地狱”

6 月的山城重庆已是一座火炉，这样一个通风、照明状况极差的山洞，实际上早已变成了一座真正的人间地狱，若非亲身经历，根本无法想像那极为恐怖的情形。惨案发生后，当时的重庆《新民报》较早登载了幸免于难的生还者何顺征的现场回忆，他说：“警报发出后，驻守十八梯防空大隧道门口的宪警及防护团员将门上锁，开始感觉热得慌；跟着避难的人们脑子发生了慌乱，各处都在殴打，但不知究竟为何故。这时候，第一批敌机离去了，我觉得心中越是发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了急病一样。当时很想

喝水，就向外走，但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又过了一些时候，心里更是难过，觉得快要死了。这时殴打情形似乎更多了，还有人在狂叫救命，以后就没有声音了。黑暗中觉得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部到处受伤，衣服都被撕破了。此时我的心要下坠到了极点，洞内的人都挤倒卧地，我也昏昏沉沉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双目流泪，口流清水，我只好听其自然，实已失去知觉，进入假死状态了……”

解放后曾在重庆市政府参事室当炊事员的李建国，也是演武厅洞内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对政协调查人员描述当时的恐怖情景时说：“我在防空洞里由于面贴石壁得点凉气，从昏迷转入稍为清醒的时候，仍无力动弹，这时忽然看见有打手电筒的，从微光中窥见一个老妇人头面都碰烂了，披头散发，呼天喊地，嚎哭怪叫，周身上下血咕叮当，简直像活鬼一样，骇人极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毛骨悚然，心有余悸。”

石灰市地段的情况又如何呢？前面提到过的重庆行营办公室主任谢藻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其时我住在会府忠烈祠 2 号，距石灰市大隧道很近。每次有警报时，我家的一个工友，名叫朱更桃，总是到石灰市大隧道躲避。那次惨剧发生后，他竟得生还。据他身临其境所知道的情形，对我说道，在洞内，当危急时，起初只感觉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觉身体浸在热水当中，脚下特别发烧，地下温度异常之高，用手向地下一抓，似抓得一把极热的东西；看见左右接近的人，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衣裤撕烂，好像神经失常，心中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他因坐在一口箱子上，把口张开，用嘴唇紧紧吸着防空洞的石壁，由鼻孔奄奄一息地延长生命，得免死亡。待到解除警报时，看见左右接近的人，有很多死去……”

三处防空洞中，情况最惨的是十八梯这一段。幸存者陈荣安当时年仅 19 岁，在草药街一家铁锅店当铁匠。空袭来临时，他跟

着老板娘及四个学徒，从十八梯口只几分钟就奔进了防空洞。此时洞内空前混乱，凳子上已挤满了人，汗流浃背的身体挤在一起闷热难受，空气恶浊得令人昏厥。勉强忍受了 1 小时，他听到有人高喊：“扔毒气弹了！”一刹那人们慌乱起来，纷纷向洞口挪动，他和老板娘及四个学徒也拼命往外挤，迅速就离散了。因空气太稀薄，此时连洞顶上的煤油灯也一个接一个熄灭了，洞里一片黑暗，呼吸困难。他在事后对记者回忆道：“只要一活动，倒在地上的人就会拼命抓你，喊着：‘扶我出去呀！’”由于根本无法动弹，陈荣安只好紧贴洞壁站着，他觉得空气贴着洞壁传了过来，于是就张开大嘴贴在洞壁上，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久，他清醒过来了，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音，脚下到处是死尸，他以为来到了阴间，有许多人已经脱掉衣服，光溜溜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事后他才得知，他的老板娘和他的四个师兄，都已经死于非命了……

住大隧道附近草药街 35 号的白素芳当时 26 岁，是个家庭主妇，丈夫是做家具生意的，有一幢二层木楼，底层是工作间，楼上住人，日子过得比较宽余。当时白素芳抱着 9 个月大的女儿躲进了防空洞。进洞不久，就听到有人喊“扔毒气弹啦！”有个青年男子向这里招手：“快出来！”这时她已经呼吸困难，喊不出声了，她想如果自己死在这里，孩子也会死，无论如何也要出去。于是她拼命向上挪动身体往外爬，沿路摸到地上到处都是死尸，无法落脚。她在极度惊恐中向洞外拥去，不停地踏着死人。然而挤向洞外的人群几次都被挤了回来，她一直紧紧抱着小孩，趴在洞内的排水沟里，才幸免于难。白素芳事后回忆道：“渐渐就没有声音了，静得连洞顶落下的水滴声都听得清楚。后来我看到前面有一点光亮，就拼命爬过死尸到了洞口……”

家住演武厅附近的邓国彬，是一名防护团团员，也是这场悲剧的目击者。紧急警报发出后，他先跑往演武厅那一组防空洞，

因人太多挤不进洞，他就在洞口协助值勤人员维持秩序，引导居民进洞。邓国彬事后称，他的确听到了敌机扔毒气弹的消息，但是他周围的防护团员无一人知道洞内的通风机“出了故障”而没有开启。因为炸弹不停地落在附近，隧道周围受到强烈震动，所以拥挤在洞口的人群一个劲地向洞里挤，防护团员帮着往里塞。敌机到达防空洞上空时，按规定当然不能让避难的人出来；当时敌机一批又一批地飞来投弹、扫射，隧道的木栅门紧紧关上了，1 个小时之后，他们才知道洞里发生了大混乱。

邓国彬还说，他和其他防护团员自从那夜以后，一连好几天，只要一闭上眼睛，无数尸体就浮现在眼前，那样的情景，使人感到异常恐怖。在木栅门内，尸体一层一层地堆到了洞顶，腿和腿交错，一具尸体的肚子下露出另一具尸体的脑袋，一具尸体的头上伸出另一个人的脚，尸体堆积如山。从尸体堆中救出了一些还活着的人，邓国彬的内弟也帮助抢救，防护团员在尸堆中寻找着幸存者进行紧急救助，然后才开始清理死人。

17 岁的汤政诚也住在草药街，跟着父亲学木匠手艺，另有两个学徒一起干活。空袭警报响起后，他和母亲、妹妹、学徒一起挤进洞，但很快就失散了。洞内温度极高，人们呼吸困难，到处都是沉重的喘息声。防护团的人进来分发过金灵丹，药一进口，感到一阵凉爽，但转眼药力一过，更加痛苦不堪。他两次都想挤进拥向洞口的人流未成，当第三次再作努力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就倒了下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感到了一股新鲜空气，于是恢复了知觉，睁眼一看，四周全是成堆的死尸，他也倒在其中。也许是死者不再需要空气了，有了剩余，让他拣了一条命。汤政诚好不容易来到洞外，但猛然想起家人还在里面，他又赶紧回洞去找。刚进洞，踏着死尸走了几步，突然尸堆里伸出几只手，他被一拉，摔了个仰八叉，尸堆中发出恐怖的最后呼唤：“先生救命呀！”紧接着他的脚和短裤被一只垂死的手抓住了，他呐喊着：

“放手！”用力一挣，裤腰带挣断了，裤子滑下来，落到了对方手里，他几乎光着下身，迅速逃出了这座活地狱……

当年以窒息惨案闻名于市的十八梯等隧道，如今正在修建轻轨铁道。在我们前往采访时，遇到西南政法大学的周益华教授，他介绍说：他的继父何道海，1921 年 10 月生于重庆白市驿何家湾，是一个印刷工人，当年正在渝中区一印刷厂当学徒。他的大伯何光荣是个运输工人，1920 年 11 月出生于南纪门下邵家院 52 号，当年以及解放后 20 多年都住在下邵家院的长江边吊脚楼。木楼板缝很宽，涨水时楼下就是江水，离十八梯不远。周益华说：“当年大隧道惨案，我继父也躲空袭进了防空大隧洞，已窒息昏死过去，我大伯何光荣见我继父何道海久未归家，急忙挤到平时躲空袭的防空洞去找。洞内昏黑，死人、活人堆躺、挤压在一起，呼救声、呻吟声已经微弱，却更加惊心动魄，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好不容易在以前常躲避的一个角落找到昏死过去的他，背回家来，据说我继父躺在凉板上，10 多个小时（或说一天一夜）后才苏醒过来。”

究竟死了多少人

重庆“大隧道惨案”已经过去 60 多年了，直到今天我们仍不得不说精确的死伤人数根本无法统计，这也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了。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各种资料提供一些当时的情况，供读者自己去判别。

首先看看当时的官方人士是怎么说的。

大惨案发生之前，重庆市长一职已经易人，由蒋介石的心腹吴国桢担任。作为市长，他对大隧道悲剧负有直接的责任。在他本人所写的报告书中，尽管力图缩小惨剧实况，以便减轻自己的

罪责，但也无法完全掩盖事实真相。事发后吴国桢亲自赶到了现场，指挥抢救和善后工作，后来他说："至则见洞门之内（至十八梯洞口），一望若有二三百人，手持足压，团挤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俯觑。门外则有防护团员、防护大队、服务队员多人，束手无策；呼之抢救，均谓无效。桢亲自动手，并督率他人同时向外强拖，亦无效果……桢再往纸烟公会洞口探视，东方处长已督率人员抢救多人出洞。当见死者多衣服不全，七窍流血。又见救护人员出洞之后，多不肯再入，虽经多方慰勉，皆云洞内空气太坏，经时稍久，即难支持。桢乃与东方处长亲身入内……"

蒋介石的心腹、时任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唐纵，在其日记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录。唐纵长年坚持记日记，数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他在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前几大本日记被解放军缴获，一直由公安部保存。1991 年公安部所属群众出版社将其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整理成书出版，名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关于大隧道惨案，查唐纵当天的日记全文为："6 月 5 日。夜袭，隧道窒息，发生大惨局。下午在会汇报，后散会，闻有警报。七时许入洞，至十二时始解除。在洞中闻美专校街被炸起火。事后调查，较场口隧道因人数过多，时间太久，而防护团不许人外出换气，将门倒锁，致发生窒息而死者数千人。至六日止，各方统计不一，调统局报告，九百十三人，宪兵第三团统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人。闻市党部统计较宪兵团尤多。至八日晚上尚未能获得一真确数字。此次惨况，闻在八时即已发生。当时，防护团员以维持秩序，不许人民外出，致洞内人向外拥挤，以不得外出，均倒毙拥塞于洞口。死者难受，自将衣服撕毁，且有握发自拔，死后犹拔发在握。其状诚不可言。"

以后缺 7 日、8 日、9 日三天的日记，上面引文所言"至八日

晚上”云云，据推当为日后补记。在所有的政府官员中，唐纵因其日记纯属私人文档且未曾想到日后会成书出版，所记录的情况当较客观而最具可信度。

重庆行营办公室主任谢藻生记下他所亲身经历的一件事：“6月6日，蒋介石传见刘峙、吴国桢、贺国光三人。蒋介石问：究竟死了多少人？刘峙、贺国光茫然不知所对，独吴国桢很从容地冲口而出，答以具体的数目字，说：几千几百几十几。蒋介石点头，似表示吴国桢比刘峙、贺国光强一些。出来后，贺国光问吴国桢说：你这个答复的数字，有根据吗？吴国桢说没有根据，我知道他（指蒋介石）的性情，如果不答复一个具体数字，他便不高兴，我所答复的数字，是真是假，他又从何得知呢？贺国光笑道，你真聪明，真会应付事情。这件事，是贺国光亲口对我讲的。”

多次下令不准人们出洞的防空副司令胡伯翰，在惨案发生后竟还蒙在鼓里，当晚十时许空袭警报解除后，他即准备脱衣就寝了，这时才有噩耗传来，谓大隧道死人极多。胡伯翰于11点过才赶到现场视察，一见死人果然堆积如山，顿时惊呆了。事后他向审查委员会供述：“当晚十一时一刻在出事的隧道甲洞口（即情况最严重的十八梯一段），亲见洞门二公尺、洞内十几公尺远的地方，人体堆积……”

至于死亡数字，胡伯翰则讳莫如深，据其部下、时任防空司令部第三处处长的丁荣灿回忆：“惨案死伤人数，官方公布死亡461人，受伤290人……这个数字是防空副司令胡伯翰请示蒋介石核定同意公布的。各单位开始在现场登记的时候，事实上已运走一部分伤亡的人，因而那也是不可靠的。我闻警后虽曾立即赶到灾区现场指挥抢救，也曾派人赶到各出事洞口进行登记，但同样也是官僚主义，虽有数字，亦不可靠，模糊记得的一个印象是蒋介石的指示下公布过一个官方数字，大约是一千人以下。”

后来发生的事果然如此。大隧道惨案发生后近一个月，即

1941 年 7 月 3 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才代表政府，向全世界正式公布了重庆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字：这次大惨案共死亡 992 人，重伤 151 人。这与唐纵所记宪兵三团统计的 1 527 人和国民党市党部比这个“尤多”的数字，相去甚远，当时就无人相信。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当年重庆的户口制度不健全，又有许多户人全家死难，无人前来申报，故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美联社驻重庆记者闻知惨案后，当天即赶到十八梯现场，将洞口旁边右梯上堆积如山的男男女女和老人、小孩的尸体拍成照片，发回国内；美国《生活》杂志迅速加以发表，向全世界报道了这场大悲剧，称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也在四千名左右。当时仍在重庆的韩素音在 1968 年写的自传中也说：“约一万二千人在重庆的公用防空洞中死亡”，还特别注明，“也有报道说死亡二万人”。《重庆抗战纪事》的统计年表上，关于 6 月 5 日损失情况的记载是：“当晚，较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死伤数千人。”

最清楚详情的，莫过于一直在惨案现场的当事人了。惨况最烈的十八梯、石灰市、演武厅三处隧道，都有人生还，他们的说法与当局官员截然不同。曾任石灰市街区保长兼空袭服务队长的廖化吉，在惨案发生后被派去清理现场和看守死者遗物，他事后作证说：“石灰市洞内的尸体搬了一夜又一整天，连死带活共约搬出五千人左右，救活约一千人，死去的约四千人。”据曾入十八梯洞内避难、而侥幸生还的欧阳祝泽说：“十八梯洞内死的人很多，搬了一个昼夜，才勉强搬完，大约死亡五六千人。”在此避难的另一幸存者郭伟波也说：“一夜之间，窒息压死的市民约一万人。”在演武厅洞内逃生的李建国，对调查者说：“三个洞子都死了不少的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厅洞子也死了不少，大约有二三千人。总计三洞死了万把人。”

最接近以上说法的，倒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办的《中国抗战画史》。该杂志登载了大量现场惨案的照片，说明文字是：“重庆于

民国三十年六月五日，因敌机施行疲劳轰炸，发生空前大隧道惨案，窒息而死者近万人，其中尤以贫苦人民为多。”

1998 年 8 月 1 日成都《华西都市报》曾刊登邓又平、华勇的文章称，“重庆大轰炸”死亡人数据《民国档案》记载：《洗衣妇折签数出“死人 9 000”》。文章说：“笔者在查看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民国档案》时，发现了几份国民党监察院留下的有关此案的原始调查报告。国民党监察院在案发后派出的调查专员万灿于 1941 年 6 月 7 日给院长于右任的报告中写道：‘总之，此次洞内容纳人数约万余人，死者逾半。据保甲长所称登记尸首总数达 8 400 余人。’另一调查专员陈之宣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十八梯防空洞附近曾遇一张姓洗衣妇人，彼当晚于抬出一人即折一竹签，天明时统计达 9 000 之谱。’”

虽然事隔太久，这件骇人听闻、举世震惊的“大隧道惨案”的具体死亡人数，今天仍然不是很清楚。但是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死亡人数大致应该在 8 400～10 000 之间。

让我们再来看看事发后现场尸体清运的情况，也许可以对上述判断给予一定佐证。

惨案发生后，当晚 23 时即开始抢救，直到第二天下午，共花了 15 个小时左右。据谢藻生回忆，当晚卫戍司令刘峙就急调 20 多辆卡车前往出事地点搬运尸体，运到朝天门河坝，他们认为这些人仅是因窒息深度昏迷，送到空气新鲜的地方，或许可以复活。确实也有人因吸到新鲜空气得以生还，谢藻生随贺国光到河坝去视察时，就亲眼看见一个姓曹的人，在尸堆中苏醒过来，得以救治。之后还有不少人也从昏迷中醒来，一时间现场悲惨的哭叫声响成一片。然而，更多的人再也不能复活了。搬尸工作进行了一整天，在朝天门等 3 个码头装殓，当局起先还紧急征调各棺材铺的薄木棺材殓尸，一些慈善团体也捐赠了一些，但约 6 000 具棺木迅速用完了，后来只得用竹席、草垫一裹了事，再用驳船转运

到郊外集体埋葬。据解放后重庆市文史馆新编的《重庆市略志》1955 年初稿第六节记载：“最初用木棺（木匣）来装运，各善堂尽量把所存棺木全搬出来，共计抬出五千三百多口，尚不敷甚多。后又找来若干部大汽车，把死尸像货物一样，乱丢乱抛，运了一整天，才把这些冤死的遗骸运完……总计这个大隧道内的人数，至少总在万人以上。就以当时各善堂抬出的棺木数作标准，其被汽车装走的尸体（指裸体或席包的尸体），断不止增加一倍。”

又据当时任保甲长防护团员的廖化吉等人所说，演武厅洞子的死人遗物，堆满了“唯一电影院”门前一整条街，石灰市洞子里的死人遗物，也在街边堆起长长的一排；十八梯洞子的死人遗物，堆满了金马寺派出所的大院坝。这些东西是有关机构以“集中招领”为名搜集起来的，然而当地居民多是全家死绝，即使剩下老弱孤儿，在惊慌恐怖情况之下，对已撒上石灰、面目全非的亲人尸体都无法辨认，遗物当然更无法认领了。至于流动人口中的遇难者，其遗体、遗物更是无人关照，遗体最后运去掩埋了事。据当时曾被派往当地派出所看守遗物的甲长胡华德回忆，他曾去守过半夜，并未见一人前来认领，这些无主的遗物，后来都被“充公”。

最惨不忍睹的一幕发生在朝天门码头的殓尸过程中。据时任防空司令部通讯队队长的邹高竞回忆，当时有不少“尸体”确实处于假死状态，参加装殓和救护的担架兵、防护团某些人和宪警等人，为了搜刮和抢夺受难者的财物，竟活活将还未断气的人卡死。当时负责现场指挥的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发觉后立即下令制止，并搜查担架兵的腰包，令其交出掠夺物，部分担架兵意欲反抗，姜吟冰当即下令在洞口就地枪决一名劫财施暴者，这才弹压下去，事后还有不少趁火打劫者被送进了监狱。

惨案发生后，重庆市民怨声载道，纷纷要求政府追究当事人

责任。蒋介石也极为震怒，其每天不离左右的侍从官唐纵在 6 月 11 日的日记中，有一段文字虽短但意味深长的话，可窥见一斑：“近来审判案件，委座多批枪决。此可想见，委座近日来情绪之不宁。想系隧道惨案刺激所致。”

在全市各阶层人士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为首组成“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开始调查事件真相。当时被该委员会调问的高层人士，有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兼防护团长唐毅、宪兵司令贺国光、卫戍第一分区司令李根固、空袭服务总队长谷正纲、防空隧道工程处长吴国柄（系吴国桢之弟）、副处长谢元模等。

调查结束之后，当局对这些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高官政要做出了处理。

客观地说，惨案之后，国民党当局确也对防空工作做出了一些改进，增调了军警加强管理，并成立了防空洞管理处等专职机构，全市所有大小防空洞每洞均设了正副洞长，管理处经常进行检查督导，杜绝了许多隐患，因此这以后再未发生过大的事故。

然而逝者终究不能再生还，这场举世震惊的大惨案虽已过去了数十年，但留给今天中国人的，不应当仅仅是一些“史实”和枯燥的数据。

“战（政）略轰炸”终以失败收场

“大隧道惨案”后，日寇丝毫没有手软，仍变本加厉地对重庆进行持续的空中攻击。死难者尸骨未寒，1941 年 6 月 15 日日本

海军联合空袭部队又出动飞机 27 架，其中包括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数架，再次侵入重庆上空，投弹 100 余枚，市民被炸死 16 人，炸伤 19 人，毁房 120 余间。美国驻华大使馆也中弹数枚，几乎全毁，所幸当时大使馆人员全体都进入了地下室避难。仅仅 4 天之后，驻湖北日军再次出动轰炸机、战斗机共 63 架，分两批轰炸、扫射重庆市区，天官府、王爷石堡、天灯街、存心堂街、百子巷、武库街、大井巷、猪毛巷、老关庙等地多处中弹起火，市民死亡 39 人，伤 86 人。英国驻华使馆再次挨炸，终于倒塌。

1941 年 7 月 4 日，日机 24 架再次袭渝，炸死炸伤市民 30 余人，毁房数 10 间，泊岸的轮渡、木船及民生公司的轮船被炸沉 25 艘。翌日下午，日机 36 架空袭，警报响起，重伤病医院全体医护勤杂人员闻声而动，跑向病室，将病人迅速转移到防空洞。不一会儿，日机飞临上空，一颗炸弹直接命中医院，手术室当即倒塌，贮藏室被炸起火。此时，尚有 50 多名来不及转移的伤病员，还在病房里挣扎，其中有的人已拔掉输液的针头，滚爬在地。他们刚愈合不久的伤口又都崩裂开来，鲜血直淌。随着又一颗炸弹坠地，第一病房中弹全毁，正在替伤员做最后检查的两名女护士被当场炸死，一名勤杂工被坍塌的房屋压死。这时，第 3 颗炸弹又呼啸而至，将重伤病医院大楼炸垮，巨大的烟雾和刺鼻的硝烟味中，只听见一片悲惨的哭喊声，什么也看不见。空袭警报解除后，重伤病医院院长视察了现场，清点了受损情况；他在向市政当局写的报告中列出了这次轰炸造成的损失：护士及勤杂工死 9 人、伤 2 人，第一病室、手术室、贮藏室被炸毁。

1941 年 8 月 6 日以后，日本联合航空队又一次开始采用“疲劳轰炸”战术，幸好经过“大隧道惨案”后防空工作大有改善，才未使悲剧重演。然而在一周的时间内，每天不分昼夜均有日机反复袭扰。重庆全市断水断电，市民断炊断饮，昼夜难以入眠。全城居民长期处于极度的惊慌恐怖之中，其心理上的折磨，已经

使人达到忍受的极限。

在日寇对重庆的持续轰炸中，他们一直还有一个绝密的计划，就是直接对当时国民党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下毒手，渴望在空袭中尽可能将其击毙。为此，他们不断派出汉奸化装成商人、学生、职员等潜入重庆，刺探有关蒋介石行踪的情报，并不惜重金收买当地流氓提供有关消息。在 1941 年 8 月 9 日这一天，他们差一点得逞。

这天，日本海军第 13、第 15 航空队出动中型攻击机 87 架，分两批空袭重庆。因有间谍密报，日机除轰炸朝天门、大梁子、龙门浩、海棠溪等地外，还重点轰炸了蒋介石官邸所在的曾家岩、小温泉两处目标。其中，位于小温泉的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官邸中弹 2 枚，1 枚击中蒋介石的专用防空洞，因岩层坚固，洞中毫无损伤。另 1 枚炸弹落在校长（由蒋介石亲兼）办公室前空地上，地面被炸了一个深坑。2 枚炸弹均重 800 公斤，炸死南温泉镇民 7 人，伤 19 人，房屋毁坏 16 栋。

1941 年 8 月 30 日，由于汉奸、间谍密报，被驻重庆的外交使团称为“鹰之巢”的蒋介石作战本部黄山山庄，再次遭到日机轰炸。为了避开市内的轰炸，蒋介石便经常在这里办公。他的官邸名为“云岫楼”，是一幢三层楼建筑，可俯瞰江对岸市中区全貌。坡下不远处是宋美龄居住的“松厅”，当时她已离开重庆赴美访问。附近还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居住的“云峰楼”。在“松厅”和“云岫楼”之间挖有一个备蒋介石夫妇专用的防空洞。日本陆军航空队第三飞行团长远藤少将侦察获知 8 月 30 日这天，蒋介石将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军事会议，各战区的将军和参谋长云集此地，于是立刻拟订了作战计划。这个刽子手活到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亲自乘轰炸机连续数次参加轰炸重庆，到达重庆上空一看，两江汇合处的重庆市街已惨遭破坏，满目疮痍，真不知道该炸哪里才是致命的地方……”

直接炸死不肯投降的蒋介石，一直是日本侵略军向往的目标。

远藤早就从离任回国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口中，知道了蒋介石黄山官邸的确切位置，甚至了解到有关房瓦颜色等细节。现在机会来了，远藤得到这个重要的情报后，简直欣喜若狂，决定由陆军航空队第 60 战斗队队长小川小二郎指挥这次行动。据日军编撰的战史丛书《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记载，当天的具体攻击情况是："远藤飞行团团长督促小川战斗队长出动，他亲自乘别府（人名）中队长的飞机，11 时飞离武昌，一直到沙洋镇，都是在云层下 200 公尺高度飞行，由此往西，天气晴朗。15 时，在 5 500 公尺高空，对重庆东侧对岸的中国要人住地进行轰炸，周围射来高射炮弹，但无伤亡，所有飞机安全返航。"

远藤自己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是："虽然没有遭受敌战斗机的阻击，但敌高射炮火猛烈、准确，炮弹在飞机下方近处爆炸的冲击波，把机上人员的臂部震得不断跳离机座。已不可能低空进行精确轰炸，高空水平轰炸，当然难以命中目标……"

但日机扔下炸弹就飞走了，直到两天后，他们在汉口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蒋介石在孙中山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才知道轰炸失败了，蒋介石安然无恙。具体情况是，由于日机突然袭击，当天参加会议的人们连隆隆的飞机发动机声音都没听见，直到炸弹落下，卫兵们惊恐的呼喊和随之而来的猛烈爆炸，才使人们如梦初醒，在一片慌乱中跑出会议室奔向防空洞。根据战后台湾编撰国民党军事史有关方面的记载，当时确有一颗炸弹命中了"云岫楼"的一角，另一颗在西侧的防空洞附近爆炸，两名卫士当场被炸身亡，四人重伤，草地上血迹斑斑，与会者踏着满地的鲜血逃向防空洞，以防第二次袭击。由于炸弹落偏了一点，蒋介石本人才得以幸免于难。他在两天后的孙中山纪念会上演说中提及此事时，感慨万端地说："房屋震动起来，知道是轰炸。夜里下雨，不能入睡。从这次轰炸，想到重庆全市同胞们受到的种种痛苦，话也说不出来了。国民的这种苦难不是第一次，已经持续 4 年了……"

炸弹重现日军投掷细菌弹铁证

2002 年 4 月 3 日《重庆商报》报道："一枚沉睡了 60 多年的神秘炸弹近日重见天日"，有关人士认为，这枚炸弹是 1939 年重庆历史上最惨烈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中遗留下来的。根据其奇特的造型初步估计是枚细菌弹，市博物馆邀请了有关专家进行鉴别，这是日军轰炸重庆曾使用细菌弹的一个证据。这枚神秘炸弹长约 40 厘米，弹体布满规则的菱形立体图案，如一个成熟的玉米，尽管历经 60 多年的风雨，弹体依然锃亮，毫无锈蚀的痕迹。重庆市博物馆近现代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枚炸弹制作相当精良，里面的火药仍未泄露，仍有爆炸的危险，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放在阴凉的防空洞里保存。

据介绍，这枚炸弹是不久前一名叫赵大兵的文物爱好者在嘉陵江边发现的，当时炸弹半埋在泥沙中，曾当过炮兵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枚不寻常的炸弹，因为一般的炸弹表面光滑，但这枚炸弹表面凹凸不平，估计是靠弹体里的毒气和细菌伤人。

赵大兵的发现引起了博物馆的重视。专门研究近现代史的李金永研究员称，过去曾发现了 100 多枚炸弹，但这枚与众不同。他说，日军对重庆市区的轰炸，持续进行了近 7 年，一直有传言说日军使用了细菌弹，但因轰炸时间长，证据来不及收集，日军也矢口否认。如果这枚神秘炸弹能确认是细菌弹，将成为日军使用细菌弹残害我市百姓的铁证。

他还向记者介绍，细菌弹比一般炸弹更残忍，它通过传播细菌、瘟疫让百姓慢慢生病备受折磨而死，当时的日内瓦国际公约是明令禁止的。但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仍悄悄地在湖南常德实施过细菌弹轰炸，因为当时证据收集很充分，日本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近年来，在梁平也曾先后发现数枚类似炸弹。

“疲劳轰炸”备忘录

无论“五三”、“五四”大轰炸，还是“101 号作战”和“大隧道惨案”，日寇给重庆数百万人民带来的肉体上、精神上的毁灭性打击，都不亚于“广岛之难”。这里，我们不能详细描述日机在上述几次震惊世界的悲剧之后继续进行的“疲劳轰炸”全过程中每一次施暴的具体情况，只能根据当时保存下来的统计资料，客观记下大致情况，以作“历史备忘录”。

1941 年 8 月 8 日，日机 96 架分 4 批空袭重庆，投掷 800 磅炸弹 100 余枚及燃烧弹数十枚，下南区马路 144 号公共防空洞被重磅炸弹击中，当场垮塌，洞内避难者 46 人全部死亡。

1941 年 8 月 10 日中午，日机第 3 次轰炸了重庆第 21 厂。这是当时国民党拥有的最大的一个兵工厂，此前已经被炸，死伤多人，厂区遭到严重破坏。这次轰炸，工厂又被 8 枚炸弹击中，伤 2 人，炸毁厂房 10 多间。8 月 13 日，日机又来投弹 50 多枚，炸死工人陈光辉、童世才和卫兵张连三，重伤职工 8 人。次日，日机继续飞来投弹 40 多枚，炸毁厂房多处。

1941 年 8 月 14 日，是国民党的“中国空军节”，据唐纵日记记载：“今日为空军纪念日，预料必有空袭。（日机）第一批六十三架在观音岩、大溪沟等处投弹，其目标当为自来水、电力厂，闻水、电两方均有相当损失。第二批二十一架在南岸投弹。据敌方宣传，八月以来，对重庆及附近，实行昼夜连续之大轰炸，以二小时五小时为间隔。迄十四日上午止，计四十次，参加机数达千架云。昨日神仙洞一八〇公共防空洞被炸，一弹中门口，一燃夷弹中另一门口。天下有如此之巧事，宁不奇叹！计死亡一百七十七人，重伤一百六十七人，轻伤一百七十二人。因该处多全家被难，领恤金者寥寥云。”

1941 年 8 月 19 日中午，日机 45 架空袭重庆，投掷重磅炸弹及燃烧弹数十枚，神仙洞 180 号公共防空洞被炸弹、燃烧弹各一枚直接命中，洞中避难者死亡 130 人、重伤 180 人。

1941 年 8 月以后，日美关系紧张，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其陆海军航空队撤回原基地，对重庆的空袭减弱。进入秋冬后重庆大雾，日机未再能前来空袭。重庆防空司令部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公布称：在日寇对重庆长达一年半的“疲劳轰炸”（即所谓“101”、“102”号作战）中，共炸死 9 218 人、炸伤 13 908 人，占这一时期全川被炸死炸伤人数的 41% 和 5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 1942 年，美国空军开始驻防重庆，防空力量大大加强。加之日军将主要空军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地区，重庆这一年中没有遭到空袭。

1943 年以后，日寇也只偶尔派出侦察机和零星轰炸机前来重庆骚扰，但一经中、美空军拦截，立即逃之夭夭，没有一架日机再能进入重庆上空。

抗战胜利后据四川省政府的全面统计，八年抗战中，日军为实施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共出动飞机 9 513 次，投弹 21 500 枚，炸死炸伤重庆市民 16 000 余人，炸毁房屋 17 608 幢。这个数据由于种种原因不尽可靠，特别是死亡数字确实难以做到精确统计。

1987 年，新华社在报道纪念卢沟桥事变 50 周年的消息时，提到的重庆大轰炸统计数中，总死伤人数是 26 000 余人。这个统计还只是直接死伤于轰炸、焚烧的人数，未包括间接受害者，如“大隧道惨案”的死伤人数等。根据对照大量的统计、报告和原始记录，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可信的。

尽管重庆人民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但日寇“战略轰炸”所要想达到的“以炸迫降”的目的，却以完全失败告终。大轰炸带来的死亡、毁灭丝毫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了与日寇血

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最终将侵略者自己送进了坟墓。

参考资料

① 陈安全译《海明威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

② 英籍作家韩素音自传《无鸟的夏天》，三联书店，1984。

③ 黎明、贾文玉等翻译《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④ 美国《时代》周刊当年驻重庆记者塞德·怀特：《历史的探求》，（参见《重庆大轰炸》）。

⑤ 英籍作家韩素音自传《无鸟的夏天》，三联书店，1984。

⑥ 邱沈钧，丁绪曾：《抗战时期重庆的电讯防空工作》，《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

⑦ 据 1941 年《四川省各地空袭损害统计表》。

⑧ 见璧山县政府给四川省航空委员会的电报（“军防字第 12681 号代电”）。

⑨ 前田哲男：《战略轰炸的思想》（中译本名《重庆大轰炸》，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

⑩ 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中，时任重庆市长吴国帧向审查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书。

⑪ 参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丁荣灿《一九四一年重庆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回忆》，谢藻生《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

古城成都，地处川西平原，是四川省省会。早在公元前 310 年，就由秦国的秦惠王派出大臣张仪、张若千里迢迢入蜀，为从汉中地区移民而筑城。三国时期，刘备建都成都，成都从此成为历史文化名城。

由于处于偏僻之地，交通不便，成都的发展十分缓慢。20 世纪 30 年代的成都是一座纯消费城市，工业方面比重庆落后，更像一座“中世纪手工业城市”。作为纸币的创始地，成都有几座造币厂；作为辛亥革命前期“保路运动”发源地，有一个铁路公司，但却是徒有虚名，从来没有修建过一寸铁路，更没有一列火车开出。成都人引为骄傲的，是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11 年）的“启明电灯公司”，有一些从欧美购进的火力发电设备，所发的电只能供两千盏灯照明。遍布全城的是刺绣、陶瓷、卤漆、竹丝、丝棉、麻织品等小手工作坊，稍大一点的有粮食加工业、食油业、食盐业和柴碳业、丝织业、烟草业、猪鬃业、木材业、砖瓦业以及金银铜器业，基本上都属于半工半商的手工操作。除此之外，成都再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近、现代化工业，更无任何军事设施。唯一一家兵工厂还是在光绪四年（1878 年）建立的“机器局”和之后扩建的“火药局”，日产三四十枝步枪和一些弹药，而且在宣统元年（1909 年）就因军阀内战、相互争夺而倒闭了。成都市民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点灯用煤油，煮饭烧柴禾，根本不知自来水为何物，饮用水主要是水质欠佳的井水。后来在中山公园（今文化宫）等处建了几座水塔，敷设了一些水管，部分街区才有了自来水龙头，讲究一点的人家，饮用水就靠雇人从这里接来担回家，因此出卖劳动力靠真正意义上的“薪”、“水”吃饭，是当时成都一个庞大的行当。

不过，正因为成都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工业也落后，但商业和农业却发达，加上作为四川省省会，除了全城约一百万人，还有全省人口作后盾，所以具备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最佳条件。

绵里藏针的城市

抗日战争开始后，宁静的成都远离战火纷飞的前线，作为大后方省会城市，虽然容纳了大量华东、华北、东北各地的难民，但整个城里没有设立任何重要的政治机关，也没有大规模的军队集结，除了一两个教练用的机场外，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设施，例如指挥中心、弹药库、兵工厂、军事运输设施、军用仓库等。应该说，像成都这样一座城市，在军事方面是没有攻击价值的。爱好和平的成都人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日本飞机的炸弹，怎么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然而，日军在将重庆列为“战略轰炸”重点的同时，也将成都作为空袭的重要目标。

日本人的目的，是要用血腥、恐怖、死亡来毁灭中国的大后方四川，特别是成、渝两地，从而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事实上，日本法侵略军早就对成都这座“绵里藏针”的中国内地城市恨之入骨了。早在 1935 年 11 月，在日本东京召开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的所谓“三相联席会议”上，就曾做出了“武装占领成都”的决定，当时的日本报纸也大肆叫嚣“不惜进行圣战以恤国体”，要求政府立即派兵进驻成都，血洗这座城市，以报“一箭之仇”、拔“眼中之钉”。

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成都，是在 1938 年 11 月 8 日。据统计，抗战 8 年中，成都遭受日机残酷的狂轰滥炸 9 次，空袭 13 次左右（即除了投弹外还低飞俯冲用机枪扫射居民），其中尤以 1939 年的“6·11”、1940 年的“10·27”和 1941 年的“7·27”三次轰炸、焚烧、扫射最为酷烈，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总体而言，日本飞机前后 6 年多的空袭，留在无辜的成都居民心灵中的伤害，也与重庆相差无几。

“跑警报”开始了

抗日战争开始阶段，远离主战场的成都相对来说较为平静，它距战区前线很远，是一个不设防的后方城市，基本上谈不上什么防务。当时的成都虽然驻有中国空军，但不是用来进行空战的，基本上属于训练部队，仅有的几架苏制飞机也全是教练机，根本不能升空作战。在重庆遭受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后，国民政府才匆匆调来一批作战飞机和一些高射炮用来保卫成都这座川西重镇。战斗机队主要驻扎在凤凰山机场，尚能迎击敌机，可惜数量太少，仍是杯水车薪。因此，成都的防空主要依赖于预先警报。在四门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另外竖有一根七八米长的木杆用来挂警报灯笼。

跟重庆的情况差不多，当时发布空袭警报也分四个阶段。成都是平原地带，不像重庆可以就近钻地洞，警报一响即要开始四处奔逃，所以成都市民形象地称为“跑警报”。

(1)“预行警报”。即在获知敌机从武汉基地起飞的情报后发布的，由于距离远、时间充裕，此时不拉响警报器，只是由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执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字告知市民将有空袭，同时城墙的灯竿上挂起黄色灯笼。这时各中、小学停课放学；集市生意陆续收摊；部分商店已在关铺板，市民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

(2)“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的警报器哨音大响，哨音是一长两短。城墙上的木杆挂上了红色灯笼，预示敌机已飞抵重庆，距离成都大约还有一两个小时的航程。这时是“跑警报”的高潮，各街道商店噼噼啪啪关铺板的响声、汽车喇叭声交织成一片，人们争先恐后逃向城外。虽然城墙上也挖有防空洞和防空壕，但这是城防军警的工事，老百姓是无法使用的。

(3)“紧急警报”。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城墙上的木

杆换上了黑色灯笼。这时敌机已飞越龙泉山，能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几分钟内即可飞临市区上空。市内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们则就近隐蔽。若是夜间，还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

短暂的寂静后，接着机声大震，敌机已经临头，调整队形后，轮番俯冲投弹，数以百计的炸弹爆炸声，使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过后，敌机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

(4)“解除警报”。警报器一声长鸣，城墙木杆上挂起了绿色灯笼，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也手执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

每次警报响了，全城不光老百姓，政府当局、机关社团、军警队伍、达官显要，儒贾缙绅都在“跑警报”。“跑警报”成了当时成都全社会的头等大事。成都当时四个出口都有城墙，狭窄的城门洞往往成了紧急疏散的障碍。有次敌机来空袭，市民疏散不及，拥挤在城门洞附近，既不能躲也无法逃，乱成一团，成为一个大目标，惨遭敌机群聚轮番轰炸、扫射，死伤不计其数。鉴于这次教训，城防当局拆除了所有城门洞，才算基本保证市民“跑警报”的畅通。

蓉城上空的顽强抵抗

1938 年 11 月 8 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成都，18 架轰炸机由武汉基地沿长江西飞入川，上午 11 时 40 分，分两队侵入成都市上空，一队在北郊上空，一队在南郊上空扫射投弹。驻防成都的中国空军十余架战斗机起飞奋勇迎战，分头反击，由于日机事先

不知道成都竟然有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毫无准备，加上轰炸机笨重、不灵活，难以对抗轻巧的战斗机，致使两架敌机受创。其余敌机见状立即扑向外北凤凰山机场，投弹 56 枚，欲绝后患。在将凤凰山机场乱炸一番之后，日机又扑向成都外南红牌楼空军训练基地，投弹 46 枚，毁坏民房和军用设施若干，因基地早有防备，幸无人员伤亡，但财产损失严重。

日军联航飞行队首次袭击成都战果不丰，还有两架飞机受创，于是决定尽快消灭成都的防空力量。

1938 年 11 月 15 日，晨 8 时 50 分，即上次轰炸 1 周之后，日机仍分两批由鄂侵川，一批 9 架往襄阳借道万县、达县及川北；另一批 9 架（其中一架轰炸万县）过荆门、宜昌、重庆，均向成都进袭。这一次敌轰炸机配备了驱逐机，它们在驱逐机的掩护下，仍以凤凰山机场为目标，倾泻了数十枚炸弹。

敌机两次轰炸，凤凰山机场损失较大。机场守卫部队的营房被炸毁，所幸部队和作战飞机早已疏散，机场仅留 3 名士兵值勤，将伤亡减少到最小程度。当敌机凌空，这 3 名士兵急忙伏于附近草丛中，炸弹猛烈爆炸，被炸飞的泥土沙石将他们埋在土堆中，不能动弹。日机飞走后，救护队迅速赶到，挖开土堆救出他们时，3 人均血肉模糊，1 死 2 伤。机场旁边的马房、厕所均中弹燃烧。据不完全统计，这次空袭中，炸弹爆炸震倒民房数间，焚烧房屋七八间，炸死 2 人，压死老妪及士兵各 1 人，重伤 2 人。

一只爱国的狗

据老成都人蔺元兹撰写的一篇文章介绍，1939 年端午节这天，日本“轰炸之王”奥田少佐轰炸成都的一件事。

奥田少佐毕业于帝国飞行专科学校，此人年轻气盛、好大喜

功，尤喜单枪匹马作战，常以效忠天皇的“圣战武士”自居。他是空袭杭州、南京、武汉的刽子手，从空中用炸弹、燃烧弹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所以又被称为“轰炸大王”。

这天是个好天气，天空万里无云，日军驻汉口空军联合航空队派出由奥田少佐带领的飞行中队空袭成都。大约 10 点钟，奥田少佐带领他的中队已飞临成都上空。机群盘旋一周后，少佐命令部下对城区轰炸、扫射，他则离开机群单独飞向凤凰山机场进行袭击。奥田的座机是单人驾驶战斗机，马力充足，性能优良，惯于在中国领空横行霸道。他一个俯冲首先扔下携带的两枚炸弹，两声巨响过后，机场上顿时硝烟弥漫；接着奥田对机场四周及建筑物进行猛烈的机枪扫射，然后围绕机场盘旋数圈，没有发现任何动静，竟然突发奇想，缓缓降落在凤凰山机场中国空军的跑道上！

这家伙落地之后没让发动机熄火，还比较警惕，停留片刻后，他才走出驾驶舱。当时守卫机场的军队有一个连，只要派出一个班，完全可以将其活捉或击毙，还可缴获一架新式战斗机。然而当时机场空无一人。奥田爬上指挥台，从身上拔出腰刀，割断旗杆上的绳子，扯下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一把塞进飞行挎包。他转身刚刚走下指挥台，只听得背后“汪”的一声，一条黑黄色的农家狗直向他猛扑过来，一口就衔住了奥田的脚踝。这一招把奥田着实吓了一大跳，好在他的脚隔着厚厚的皮靴，没有伤着皮肉，却把皮靴扯了一个大口子。奥田又惊又怒，急忙掏出手枪，砰砰两响，这只普通农家狗来不及呼叫就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地上的青草。奥田虽然胆大妄为，但遭到这只忠心耿耿的中国看家狗的突然袭击，还是被挫伤了锐气，连忙三脚并两步地跑回飞机旁，拉开驾驶舱钻了进去，座机冲天而去。

这件事，在当时的官方文件里找不到任何记载，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生当时在成都，却知道此事，并在他心里留下深重的阴影和难以言说的痛苦。之后不久，冯将军

去川南一带为抗战募捐，到泸州后，当地军政要人为欢迎他召开了大会，冯将军正在发表抗战演说之时，一位中学校长双手举起一幅绣着“为国宣劳”四个大字的红缎锦旗上前献给冯玉祥。冯玉祥突然大为光火，一边挥手拒绝，一边高声说：“献的什么旗！什么‘为国宣劳’！收回去，全给我拿走！”众人惊呆了，不知所措。冯玉祥先生慢慢平静下来，缓和了口气继续说：“老百姓非常热爱家里养的狗，那是因为它能给主人看家护院，对主人忠心耿耿，对强盗毫不留情；如今日本鬼子不只是进了我们的院子，而且已经登堂入室，烧、杀、掳、掠来了！作为一个军人，不能捍卫疆土保百姓，连一条狗都不如！这面锦旗，我实在不配领受！”说完即拂袖而去。

“轰炸之王”奥田之死

然而成都军民是不甘做任人宰割的鱼肉的，哪怕敌强我弱，只要有一点机会，他们都要奋起反抗。凤凰山机场是中国空军的训练基地，虽然飞机落后，但飞行教官技术高超，飞行学员同仇敌忾，敌机来袭时，只要能够抓住机会，他们就会给敌人一点厉害尝尝。飞扬跋扈的日本“轰炸之王”奥田，最终没有好下场，终于丧身成都坝子。

“黄鸡婆”勇歼“轰炸之王”

据蔺元兹老先生另一篇文章讲述，距“机场拔旗”后不久，已荣升大佐的奥田又带着飞行大队兵分三路空袭重庆、内江、成都，驾驶领机的奥田自己仍随原班人马直取成都。他求功心切，

仍按上次的战术如法炮制，再次单机向凤凰山机场飞去。然而这一次情况不同了，他还未到机场上空，就远远看见一架绘有“青天白日”图徽的双翼飞机正在冉冉升空。奥田一见就明白这是一架毫无战斗力的教练机，袭击这种飞机犹如老鹰叼小鸡。当下他不禁大喜，竟然萌发了要生擒中国飞行员回去请功的念头。于是他加足油门直扑“黄鸡婆”，同时按下射击按钮，子弹射向中国飞机，并摆动机翼发出信号，企图使“黄鸡婆”迫降，跟他返回机场束手就擒。

驾驶“黄鸡婆”的飞行员，是个刚从航空学校毕业不久的实习生，传者佚其名，浙江绍兴人氏，高中毕业后就投笔从戎，考上武汉航空学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的一个训练大队实习。武汉沦陷后他随大队迁至成都凤凰山机场，今天敌机又来空袭，全大队的飞机都“躲警报”去了，机场上只剩下他这架“黄鸡婆”没起飞。因为临时发生故障，他还在和机械师抢修，忙得满头大汗，等到故障排除已经拉响了“紧急警报”。但他还是不顾一切钻进驾驶舱，赶紧加大油门、飞离跑道。然而为时已晚，他正爬升时，就被敌机发现了。

奥田大佐仗着自己的飞机先进，武器精良，驾驶技术高超，他要像猫抓老鼠一样，把“黄鸡婆”捉弄够了才一口吃掉。于是他直扑“黄鸡婆”，并发出迫降信号。这位浙江实习生眼见敌机紧追不舍，围绕自己座机上下左右翻飞，机枪子弹忽而从后面射来，忽而从前方射来，那嚣张气焰不禁使他怒火中烧。“老子跟你拼了！”他心一横，豁出去了，决定来个鱼死网破！他于是加大油门，拉起操纵杆，向敌机冲去，同时扣动扳机，一串串子弹射向敌机。

这一还击更加激怒了奥田，他先还以为“黄鸡婆”没有武器呢。他迅速调整摄像机，以便拍下“黄鸡婆”被击毁的镜头，然后他紧握操纵杆，居高临下直冲下来，并按动击发按钮，一串子

弹构成一团火网射向“黄鸡婆”。实习生只觉得机身一阵颤抖，自己的座机中弹了。他连忙查看仪表，操纵系统，发动机都还正常，没有击中要害，于是他借势将飞机急转直下，来了个螺旋式俯冲。奥田以为“黄鸡婆”被击落了，也跟着俯冲下来准备拍照。不料这架中国飞机却突然急转直上，调头仰身飞行。这时俯冲下来的敌机左侧，正暴露在他的正前方，相距不过几十米，连奥田鼻子下的小胡子都看得清清楚楚。机不可失，实习生连连扣动机枪扳机，大约二十多发子弹一颗不剩地射进了奥田的座机。这架不可一世的“战鹰”顿时浓烟滚滚，像断线风筝一样，摇摇晃晃地栽向遥远的东北方向，接着可能是他自身携带的炸弹爆炸，一团黑烟夹着烈火，顷刻间就吞没了奥田的座机。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十分钟。

警报解除后，当时的“战时防空指挥部”派出队伍前去打扫现场，发现飞机已炸成碎片，并在残骸中发现了一具残缺不全烧焦的尸体，这就是奥田大佐。“黄鸡婆”打败野马式日本飞机的故事，一时间成为人们纷纷传颂的话题。但不知什么原因，当局却对此消息进行严密封锁，不登报、不广播、不宣传，事后处理都是秘密进行的。两个星期后，这个飞行训练大队也迁走了，那位英勇的浙江籍飞行员连个姓名都未给当时观战的成都人民留下，然而“黄鸡婆”奋勇战日机的事迹，却长久地留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碧血长空保蓉城

《四川日报》副刊曾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记载了奥田折戟的又一个版本。文章有名有姓、有根有据，可靠性较强。文章说：著名作家萧军的夫人王德芬，每当对他提起 1939 年“11·4”成都

大空战，“总是情不自禁地对她的表哥——抗日空军英雄段文郁表现出无限敬仰和怀念”。

1939年11月4日中午，蓉城上空碧空如洗，是难得的好天气。日本侵略者的54架九六式重型轰炸机分两批，先后从山西运城和湖北汉口起飞，偷袭成都。接到空袭情报，预先升空的我国空军健儿，怀着满腔的民族义愤，居高临下，在成都北郊上空勇猛地向敌机群迎击。日机猝不及防，队形大乱。蓝天上银燕翻飞，炮光闪闪……鏖战结束，我国英勇的空军战士以25比2的辉煌战果（在成都地区及其附近空域击落敌机7架，击伤敌机18架，我方损失2架）。此外，残余敌机在逃窜回汉口的途中，又遭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和梁平机场我方驱逐机的拦击，又被击落几架，敌机被歼过半，重创了日寇，保卫了成都。之后，日机半年不敢轰炸蓉城。在这场恶战中，号称“轰炸魔鬼”的敌总领机，位居“四大天王”之上的日本空军元老、海军航空兵司令官、42岁的奥田喜久司大佐，连同他的4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下属，被我方少尉飞行员段文郁击毙坠机于乐至县大堰村附近的山头上。段文郁也不幸壮烈殉国，是年他年方22岁，刚从航校毕业。初战凌空，他即用一腔热血保卫了他的国家和人民。

段文郁，河北省高阳县人，1917年农历5月25日诞生于一个富裕中农家庭。1934年初中毕业后，因父亲后来开设的铁工厂破产，经姨父介绍去南京赫金汽车公司当学徒，学习修理和驾驶汽车。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他看到日寇在我国神圣领土长驱直入，滥杀无辜，十分愤恨，曾对表哥王德彰说：“日本鬼子占我国土，杀我同胞，辱我姐妹，我恨不得冲上前线亲手杀他几个，方才解恨！”他怀着一颗报国的忠心，于1935年秋，弃工从戎，报考了中央航空学校。1938年他以优良成绩从航校毕业，被分到兰州接受援华抗日的苏联空军教练的培训，后被分配到成都空军“流星群”大队正式参战。

蓉城是祖国的西南重镇，日寇曾多次轰炸成都。华西大学曾被夷为废墟，祠堂街和少城公园被烧成一片火海。大火过后，一片血肉狼藉，惨不忍睹。但日寇未曾料到的是，成都空军已装备了一个大队的苏制先进驱逐机。1933 年 11 月 3 日下午，“流星群”大队就接到了明日将有大批日机空袭成都的情报，于是做好了战斗准备。翌日 11 点 30 分左右，双流机场指挥塔台上已升起了一级战斗警戒的信号，三颗绿色信号弹的弧线划破了机场上空。霎时间，银光闪闪的 3 个中队驱逐机迅速升空。在成都北部空域，段文郁和战友石干贞先后发现大批日本重型轰炸机群飞来，迅速报告了副大队长王汉勋，王下令攻击。我方 9 架伊尔-16 型驱逐机在领队长机的率领下，冲出云层，冲击敌机。在附近巡逻的两个中队的伊尔-15 型和霍克式驱逐机也迅速飞来助战。俯冲、侧击、仰攻……顷刻间，四处火光闪闪、炮声隆隆。1 架被击中的日机当空爆炸，10 余架日机拖着长长的烟尾窜逃，其中两架迅速呼啸着落地坠毁。激战后，段文郁驾驶的战鹰汽油已不多，正准备遵命返航时，中途又遭遇第二批 27 架来犯敌机。这批敌机非常狡猾，采用调虎离山之计，让第一批敌机投石问路，与中国的驱逐机队周旋，牵制和消耗中国战鹰，然后伺机从蓉城的西北角向东南方偷袭，轰炸成都。返航在最后的段文郁和副中队长邓从凯义愤填膺，勇猛地迎击敌机。敌机群慌忙开枪发炮。邓从凯在向涂有红色条纹的敌领队总机瞄准将要射击时，被另一敌机击伤机身，段文郁迅速击伤了袭击敌机，并向敌总领机发起攻击。几经交手，邓从凯向南勇追一架敌机，再也没有回来。段文郁运用高超的空战技术，单机在 26 架敌机的火网中紧紧地咬住敌领队总机不放。经过 10 多次反复俯冲攻击和仰攻，终于将敌酋奥田喜久司大佐击毙坠机（根据敌机残骸、尸体所留下的天皇所赠刻字佩剑、印章和敌空军公报等得到确认）。据当年听过警报，目睹过这场惨烈空战的老一辈人和段文郁的表哥王德彰讲，当时在华西坝郊野

看到我国空军健儿严惩日本飞贼的中国同胞，不顾敌机盲目投弹的弹片乱飞，纷纷欢呼鼓掌：“打得好，打得好！打他龟儿子日本狗强盗！”这场鏖战接近结束时，他们看到一架我国的小银燕摇摇摆摆地朝成都的东北方向滑降。燃料已耗尽的段文郁，本可跳伞获救，但他爱机心切，想方设法保全心爱的战机，打算将驱逐机滑翔到机下河滩强行着陆。因其腿上连中两弹后流血太多，昏迷中飞机失去控制，机身上翻后不幸坠毁，壮烈殉国。天黑后，战友们才在金堂县的一处河滩上找到他的遗体和飞机残骸。

段文郁生前常借休假之机，同在华西金陵大学读书的表哥王德彰，到成都桂花街与著名的进步作家萧军及其夫人、自己的表妹王德芬团聚。萧军非常喜欢这两个年轻人，即便在伏案写作，也要搁下笔来同他们畅叙。当他听到段文郁为国家、民族英勇献身的消息后，非常悲痛。接到成都空军司令部的通知后，他和王德彰参加了段文郁、邓从凯的遗体告别仪式。不久，他们又一起到双流机场“流星群”大队领回了段文郁烈士的遗物：一床丝棉被、一块手表、一架铝制小飞机模型、一本相册、一个彩色金属的中央航空学校毕业纪念徽章。他们还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参加了当地军民为段文郁和邓从凯召开的万人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高度赞扬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他们题送了挽联和花圈，并派代表参加了追悼大会。段文郁牺牲后，他的几个金兰结拜的义兄，都投身抗日，当了八路军的团长。他的弟弟段文林和段文章，经过抗日烽火的磨炼，都成了八路军冀中军区的干部，妹妹段文丽也成长为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

解放后，北京市人民政府追认段文郁为革命烈士，并给他的妻子史敬芝和女儿段新体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褒奖他在抗战中创立的奇功大勋。南京市人民政府还在南京航空烈士墓为他和他的战友们重新修墓立碑，供中外游人凭吊瞻仰。

“轰炸之王”葬身处

奥田是日本空军中的“王牌”飞行员，经常带领庞大机群空袭我国东南沿海城市，杭州、南京、武汉等地都有他欠下的血债，由于战功昭著，号称“轰炸之王”。

如前两种所述，虽然作战的主角和战斗的情节都大不相同，但是，奥田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魔鬼，终于在 1939 年“11·4”成都大空战中，遭到我国空军击落而毙命，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当局对此哀叹说：“奥田大佐之死，是我军一大损失！”

当日空战，我空军在成都上空一共击落了几架日机？“轰炸之王”奥田折戟后到底葬身何处？据后来掌握的确实材料，至少击落两架，其中一架栽到了中江县大埝坎乡麻柳沟（解放后划归乐至县管辖）；另一架坠毁在简阳县观音桥。就是说，奥田折戟后很可能葬身这两处地方。

一说葬身中江麻柳沟

上文《碧血长空保蓉城》记述，在这场恶战中，号称“轰炸之王”的敌总领机，位居“四大天王”之上的日本空军元老、海军航空兵司令官、42 岁的奥田喜久司大佐连同他的 4 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下属，被我方少尉飞行员段文郁击毙坠机于乐至县大堰村附近的山头上。

此外，亲身经历过日机残酷轰炸成都的柳光笃先生，当时正在成都大同中学读书，曾目睹了这一场激烈的空战，并一直记忆犹新。柳先生在一篇题为《“轰炸之王”葬身处》的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也说奥田等葬身中江县大埝坎乡麻柳沟。

柳先生文章介绍：那是 1939 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大雾笼罩成都。10 点过，雾散日出，根据经验，这种天气多有空袭，市民们大都做好了跑“警报”的准备。果然，将近 11 点时，各十字路口的岗亭上都插上了“预行警报”黄旗。人们扶老携幼，涌向城门和城墙缺口，直奔郊外。过了大约半小时，空袭警报响了，意味着敌机正向成都扑来。这时，少数想留在城里观战的人，也赶紧向城外远处跑去。正当人们在田间小道上奔走不停时，紧急警报响了，值勤人员大声呼叫：“就地隐蔽，不准乱跑！不要说话！”人们赶紧就近分散在树下沟中、坟场等处隐蔽起来。

不久，天边传来了由弱渐强的闷雷似的声音，接着出现了一片黑影——敌机来了！它们分成两队，每队 27 架呈品字形排列，从当空飞过去，调整了队形。少顷，又呼啸着折回，看来认准了目标，要准备投弹了。大家的心顿时收紧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灾难将要临头。正在恐惧之时，突然传来了“咯咯”的机枪声，众人抬头一看，原来是我空中健儿驾驶着驱逐机在敌机群中上下翻飞，猛袭敌机。地面上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大声叫起好来，有人甚至还开始鼓掌。这时，敌机又变为一字队形，纷纷开始投弹，黑乎乎的炸弹自空中“嘘嘘”怪叫着俯冲而下，顷刻间轰鸣震耳，地面上浓烟夹着火光冲天而起。我军飞机集中火力攻打敌人领机，不一会儿，就见敌领机屁股后冒出一缕白烟，既而变为黑烟，其余敌机一窝蜂溃逃。领机飞得渐慢渐低，脱离机群几分钟后，便坠落在天边。湛蓝的天空又恢复了平静，人们松了一口大气。警报解除了，市民们热烈议论着回到了市区。

第二天，我从《中央日报》的告捷文章里才知道，昨天被击坠的是日本“轰炸之王”奥田大佐的座机。同时得知，败退返航的敌机，沿途又遭到我重庆、梁山（现为梁平县）基地起飞的战斗机拦截，击毁 18 架。此实属空战的一大胜利。

1956 年，柳先生调到乐至县大埝坎乡工作，到了麻柳沟（抗战时期属中江县）。同行的一个老村长指着一个高高的山坡对他说：“当年日本飞机就是撞在这个坡上完蛋的。”并指着一个垭口说：“五个烧得糊焦焦的日本人，一齐埋在那下面。”柳先生请老村长把当时的情况详细讲给他听。老村长说：“那是秋末的一个晴天，为了抢收粮食，全村的人天一亮就上坡干活。快到中午的时候，看见几十架飞机排成整整齐齐的两队，向成都方向飞去。到了半下午，它们又前前后后、高高低低地飞了回来，有几架屁股后面还在冒烟哩。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架飞得又低又慢的大飞机，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黑尾巴，黑烟中还喷着火花，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向我们这边飞来。我们赶快跳进沙沟，伸头观看，只见它越来越低，最后‘轰’的一声撞在山头上，一个倒栽葱直插到山窝人家的晒坝中，浓烟大火冲天而起，接着噼噼啪啪像爆火炮似的响了一阵。声音停了后，我们大着胆子走拢去看，老远就闻到一股焦臭味。走拢后，看见一堆飞机残骸和五具烧焦了的日本人尸体。后来乡上得到了上方指示，把飞机残骸拆散抬往县城，再装上汽车运往成都，五具尸体就地埋葬了。”

一说葬身简阳观音桥

在著名的个人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著作里，有一组照片，记录了 60 年前成都“11·4”空战日寇奥田大佐及所率航空队被歼的历史事件。

书中说：这天，日本侵略军派出 27 架飞机袭击成都，来势凶猛，他们想用空中轰炸和扫射这种恐怖打击来摧毁成都人民的抗日决心，摧毁中华民族的斗志。他们这次轰炸由奥田大佐指挥。面对气焰嚣张的小鬼子，当时驻守在成都的抗日防空部队和空军

部队，给予了迎头痛击。这场空中硬仗十分壮观，结果奥田等日本鬼子终于成了异乡之鬼，让饱受日寇轰炸之苦的成都百姓大快人心。

樊建川非常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在四川省防空委员会担任总干事和四川省航空委员会参谋室参谋的刘景轼老人，并介绍了刘老先生对《成都商报》记者披露的老人所亲历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的详情：

1939 年 11 月 4 日，敌机出动 54 架，反复四次侵入成都市区投弹，我空军及高射炮部队共同出击，空战十分激烈。敌机被击伤、击落数架，其余皆仓皇逃逸。解除警报后，防空司令部接到仁寿、简阳两地对空监视哨报告：在仁简交界附近坠落敌机一架，有白晃晃的东西着陆，可能有敌人跳伞空降。防空司令部朱瑛闻报后，先命令我率领宪兵一排赶赴现场，会同地方驻军加紧搜捕，并对坠毁飞机进行检查，将武器、文件带回。当时我提出，宪兵惯居城市，对各县乡间人地不熟，难以收效，不如先行电令两县县长及驻军部队，迅速就地严密搜索封锁，待我赶到后再会同地方部署查缉。时任参谋长的高炯在座，亦表示同意。朱瑛最后改变决定，派我单独前往办理。

当天我赶到简阳，已是黄昏时分，与县长张某商量布置后，即乘马夜行赶到三岔坝，与当地驻军某营营长会面。他说，肯定没有跳伞降落这回事，当见到飞机坠落时，他就马上率部赶到现场，缴获了机上的轻机关枪数挺、小炮两门及手枪数支。我说：“你做得很好，武器暂时加以保管，以后送缴成都。”

第二日凌晨，我赶到观音桥和当地区长会晤时，他同样说没有降落伞掉下来，并已派人保护现场。我们又去了离观音桥二十里许的现场，见到敌机破碎的残骸和烧成一堆约有七八具的敌人尸体。我将在机上检查到的文件、地图及三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奥田）一并收藏准备带回。从飞机铭牌上能清楚地看到此机的

生产厂家是三菱公司。

当时，有该地区防空监视哨情报员王某赶来向我报告说：“早晨成都来电话，昨夜敌台广播，他们的航空队远征成都，胜利凯旋，不幸损失飞机两架，领队奥田大佐光荣遇难云云。要我转达查验尸体有无奥田在内。”我说：“这些尸体烧成这般模样，根本无从辨认，只有将文件带回翻译、核实再说。”我又问：“根据你们监视敌机坠落情况，这架飞机究竟是主机还是僚机？”他说：“是前面领航的一架。”因此，我初步判定是领队的飞机。至于监视哨报告中提到“白晃晃的东西”并非空降，想是巨大的银色机翼（两翼脱离机身坠地）。不过现场敌机破烂不全，很难判断是被空军击落还是高炮击中。除立即动员民工将残机抬运至仁寿文公场候车运蓉外，我与防空司令部通电话，请派卡车来文公场接运敌机残骸。

返回成都后，我向朱瑛报告经过，交呈文件、地图、相片。朱很高兴，嘱我立即将文件图片送交航空委员会周至柔主任过目。我往见周，周问：“你遇到我们（指空军）的人了吗？”我答：“在简阳途中见到。”他看了文件、图片即交有关部门翻译查证，认定该机是领队奥田的，对我完成任务表示赞赏。过后，空军司令部的人向我表示，敌机是他们击落的。我向朱瑛请示，朱说：“当然是空军与高炮部队配合取得战果，空军是首功。”事后，中江县又将缴获击落的敌机一架运至成都，连同奥田的领航机残骸，陈列在少城公园，公开展览。

飞扬跋扈的日本“轰炸之王”奥田在成都空战中被击毙，这是肯定的。到底是谁击落了奥田？击落后奥田葬身何处？以上引证了不同的说法。我们认为，段文郁击落奥田比较准确有据；而一般都说“轰炸之王”奥田葬身中江（乐至）大埝坎乡麻柳沟。我们认为，奥田陨命成都、葬身简阳观音桥更为确实可信。

惨烈的“6·11大轰炸”

1939年6月11日，日军驻武汉W基地的联合航空空袭部队，在制造了重庆“五三”、“五四”大惨案之后，又派出27架轰炸机空袭成都。当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报道：“敌机54架，今日落暮分袭渝蓉两市，其中27架侵入成都市上空，经我神勇空军起飞迎击，在本市东南上空击落敌机3架，安全返航……敌机今日在盐市口等地投弹 30～40 枚，焚烧民房多家，伤亡平民数百人……”这个报道远未概括出这次大惨剧的全部真实情况。根据后来的调查，日机这次突然袭击，以市中心商业繁华区和居民密集的盐市口一带为主要目标疯狂投弹扫射。这是成都市遭受日本飞机空袭轰炸最惨烈的一次，焚烧民房之多，伤亡之众，灾区之大，都是空前的。日机的轮番空袭长达一小时左右，在盐市口一带投掷燃烧弹、炸弹共111枚，盐市口、东大街、东御街、提督街、顺城街一带繁华地区共49条街道被焚毁，西东大街等16条街巷被烧成一片焦土。空袭中炸死市民226人，炸伤432人；中弹、烧毁、震倒的房屋共有 4 709 间，被毁的建筑除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范、华阳县中三个文化机构外，其余全是民宅、商店，经济损失达法币663 170元。

当时担任成都防护队队员的杨锡民，由于重任在身，没有跟家人一起逃到城外“跑警报”，那天他亲眼目睹了日机狂炸成都的惨状。

杨锡民负责市防护队和五分队指挥，拉响警报后，他立即到北大街警察派出所住地火神庙听命。不久敌机凌空，分三个小队共27架轰炸机飞到市中心，立即开始疯狂投弹，爆炸声如闷雷，此起彼落，大街上顿时火光闪烁、黑烟冲天，防护队员们被震得东倒西歪，站立不稳。轰炸虽然只持续了几分钟，但炸后的惨状，

却使防护队员们经历了一段极其恐怖的时光。

第一轮轰炸之后不久，防护队员们得到通知，立即到提督东街凌云饭店抢救伤员。杨锡民带领大家跑步奔去，沿途人群拥挤，道路不通，市民一片惊恐。到达目的地后，只见凌云饭店的前半部三层楼房已被炸成瓦砾堆，后半部已成断壁危楼，混乱不堪。炸后幸存者皆面容灰黑、尘土满身，或卧或坐，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令人心碎。他们都负有轻重不同的创伤，防护队员除将重伤员包扎送走外，轻伤则就地包扎，或嘱其到医疗点上药。据生还者说，在倒塌房屋的泥土下还压着有人，杨锡民带领队员立即翻挖，冒着浓烟的废墟下面确实还有人，但挖出来时全都死了。防护队所带的药品少，还没有将轻重伤者包扎完，药物就没有了，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一些无法救治的重伤员慢慢死去，境况惨不忍睹。

正在束手无策时，防护队队部又调杨锡民所在的五队到遭受日机重创的盐市口处协助抢救伤员。任务紧急，刻不容缓，他们只好把还未包扎完的伤员扔下走了。这时，沟头巷已走不通，提督西街又塞断了，五小队防护队员们只好从暑袜街绕道前往，沿途有人拆卸即将垮塌的房屋，还有抬死人的担架队穿梭而行，呼儿唤母声不绝于耳，到处充满了慌乱恐怖的气氛。又因水龙头损坏，水源不足，横九龙巷、顺九成巷等处几乎成了一片火海，消防队只有干瞪眼，看着大火熊熊燃烧毫无办法。房屋拆卸队拆了这里，火苗又从那头窜来；或者前面扑灭，后面又烧起来，大家无法可想，于是救火者成了观火者。防护队也因药物用完，无法救护伤者，只得将旗子卷起，也变成了观火者。

“沿途弹坑累累，到处破屋颓垣，大火蔓延，浓烟遮天蔽日。”杨锡民在回忆文章中忆起当年的惨景，仍然不寒而栗:“到半夜时分，荔枝巷和九龙巷因大火封锁尚不能通过，我们走到南新街，街上有好几个大弹坑，路面全毁。到交通路口，这里又是一大片

火海（包括盐市口、锦江路、顺城街），盐市口去不了。当时焚烧面积很广，横九龙巷、顺城街、西顺城街、盐市口、西东大街、锦江桥、粪草湖、交通路、南暑袜街都是重灾区。当晚，在离成都六十余里的新繁县城，都能望见成都上空烟雾迷漫，火光冲天，灾情之严重可想而知……”

这次轰炸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单是杨锡民等在现场进行过抢救工作的凌云饭店，炸后的几天之内，又挖出男女尸体数十具。九龙巷死的人也不少，其中有一户全家躲在自备的防空室内，因附近投下的燃烧弹引起大火，房屋陷于火海之中，这一家人共八口全都葬身火海，无一幸免。另外，还有许多人家，因出走不及，全家惨死。“6·11 大轰炸”之后第三天，成都市政府发布了一个概括统计：“中弹被烧、震倒、拆卸的房屋的门牌号数，共有 1 215 号，以每一号五人计，受到灾害的为六千人。其中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范、华阳县中等三个文化单位，余则属平民住宅与工商店铺等。”

战火塑造民族魂

在成都东二环路万年场，坐落着一座非常有名的“无名英雄”雕像，石基铜像高约 10 米，一个脚登草鞋的抗日战士，手持步枪，身子前探，正欲发起冲锋。如今，五十岁以上的老成都人，都记得这座雕像原先在成都市内东门大桥桥头，多少年来，一直是成都市象征性的建筑之一。这座著名的雕像正式名称叫做“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以纪念在八年抗战中出川作战的三百万川军将士，成都市民亲切地称它作“无名英雄”雕像。很少有人

知道，这座雕像的作者是中国杰出的雕塑家刘开渠；更少有人知道，这座“无名英雄”雕像和王铭章铜像，都是刘开渠先生在日机轰炸成都的隆隆爆炸声中完成的。

刘开渠和他的抗日雕塑

早在 1934 年的春天，刘开渠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看望了当时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任职的蔡元培先生，适逢鲁迅先生也在座。鲁迅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句话：“过去中国的雕塑只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刘开渠十分感动地回答：“先生说得对，是应该做人像，多做英俊、勇敢、聪明的中国人形象。”鲁迅先生的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刘开渠的心里。在那个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年代，他立志要用自己手中的雕刀，多多塑造中华民族的各种英雄人物，用艺术唤醒国人的良知和救国图存的斗志。

20 世纪前，城市雕塑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空白。回顾从 1900—1949 年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史，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各大城市只有 20 余座现代大型城市雕塑，其中还有几座是外国人塑造的。属于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作品中，有 9 座雕塑是刘开渠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塑造的人物像。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成都作为抗战大后方城市，一下出现了 10 多座现代雕塑，约占全国现代城市雕塑的一半，其中 8 座是刘开渠先生的作品。

1939 年初，日寇将战火烧到江南，刘开渠不愿留在家乡当亡国奴，毅然偕夫人程丽娜，冒着敌人的炮火，从湖南沅陵坐长途汽车来到成都。他当时是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教授，在国内外都颇有知名度。他们赶到成都是为了寻找先期已向西南‘内迁”的国立艺专，然而到成都后，才知道学校已经迁往昆明了。当时刘开渠先生的夫人程丽娜正怀着身孕，大腹便便不宜再作远

行，就在成都留了下来。

早在来成都之前，刘先生即知道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中国军队在这场辉煌的战斗中毙敌2万余名，给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迎头一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刘先生更是深为这个捷报所激励，当他得知在台儿庄一战中，川军将士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立即萌发了为他们塑像的艺术冲动。刘先生在题为《王铭章铜像和“无名英雄”像》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抗日战争以来，四川人民为了把敌寇赶出国土，献出了无数优秀儿女。我怀着极大的敬佩之情，按捺不住自己的艺术激情，要想去表现他们。我入川的第一个像，便是王铭章骑马铜像纪念碑……”

王铭章是四川的地方军将领，抗日战争打响后，他带领川军远征山东，在藤县保卫战中，与县城共存亡，和日寇血战到最后一息。最后日军攻占藤县后，他不愿当俘虏，将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王铭章所率领的川军将士在藤县英勇阻击日寇几天几夜，为以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机会。根据他的事迹，刘开渠先生迅速完成了雕像的艺术构思：这座骑马人像高三米许，像座的四面各有一块浮雕，主体像表现王铭章骑着战马，扬手鼓战，冲锋陷阵那凝固的一瞬间。左右浮雕再现了军事会议及巷战场面，前后浮雕为对牺牲者的哀悼，并镌刻有碑文。

王铭章铜像在轰炸中诞生

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战争时期铸造如此大的铜像，是异常艰巨的，而且日机经常来成都轰炸，困难可想而知。但抗日英雄的事迹鼓舞着刘开渠先生，他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让这代表着中华民族之魂的雕像，在成都街头立起来。草图完成后，马上

进行铸造工作。首先，做雕塑需要粘土和熟石膏粉，但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成都城内是根本找不到的。他就带上助手跑到很远的乡下去找，最终选用的塑铜像的粘土，是四川灾荒年间饥民食用的“观音土”。买来的熟石膏粉质量太差，多数是不能用的，他们只好买来生石膏块，砸碎炒熟用以替代。由于人手不够，他不满两岁的女儿小妹儿，也拿起小锤子帮爸爸砸石膏；身怀六甲的刘夫人程丽娜女士更是热情投入，整天蹲在灶台前用铁锅炒生石膏，弄得满头满身都是白粉，来访的朋友看见她这模样，都开玩笑说大雕塑家刘先生现在成了开面粉厂的了。

在一年多的塑造过程中，资金短缺的刘先生遇到了房东索取高房租、不得不另找工作室搬家的麻烦。他深切感受到了物价飞涨、资金短缺，以及奸商出售劣质材料等给创作和他们一家生活带来的艰辛。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仍然一心一意铸造着“民族魂”。终于熬到了正式铸造铜像的阶段，困难却更多了。极其简陋的铸铜“作坊”，就建在刘开渠一家租住的房前院子里。他所能请到的工人中，只有一两人参加过小型铜铸作坊的工作，大家对翻造雕像一无所知。翻造铜像需要铁砂箱，可刘先生根本没有钱去专门定制，只好请工人在地上挖了个深坑，在坑底铺一层枕木，然后把几块烤好的砂模，一块扣一块地安放在其中，上面紧压着一层厚厚的木盖聊以代替砂箱。刘先生在土坑的两旁各用大城墙砖砌了一个大高炉，一左一右各安上一台四人拉的双风箱，一班八人，两班轮换，就这样开始了铸造“民族魂”的神圣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筹划，总算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开炉了。此时，日本轰炸机常来骚扰轰炸，刘先生白天不敢动工，只得夜里开干。这年初夏的一天，大家估计敌机不会来了，掌炉的一位师傅提来一只公鸡，说是必须祭炉，铸铜方能成功。刘开渠先生本来不相信这一套，但为了为增强大家的信心，也同意他们祭炉子。

旺旺的炉火燃烧起来了，火苗一阵高过一阵。红红的铜水流进了铜包，刘开渠先生亲自指挥工人抬起铜包，将火热的铜水小心地倒进注入口，大家凝神屏气注视着这一切。开始时，铜水顺顺当当地流进注入口，可慢慢地却不渗了，并且往外溢。刘先生忙令停止浇注，但话音刚落，就听“砰”的一声，一柱火龙冲上天空。原来是砂眼被铜水冲开了，火苗窜起老高，院里那棵大槐树的枝叶都被烧掉了一半；半凝固的铜水落在每个人的身上，把大家的衣服烫出洞来，皮肤也烫起了水泡，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有半句怨言。

这次失败对刘先生的打击是巨大的。一年来塑造工作的辛苦，几个月来为筹划铸铜工作之疲惫，伴随着绝望一齐向他袭来。这次塑像工作所需要的全部经费，都是刘开渠先生垫支的，他十分清楚，翻铜的失败可能会导致自己家庭经济的破产。绝望之中的刘开渠回头再看着妻子丽娜，只见她呆呆地站在院里，脸上也充满了痛苦的表情。程丽娜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名门闺秀，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次翻铜的经费不够，她变卖了她母亲留给她的首饰……想到这里，刘开渠心里突然十分痛楚和内疚，他强打起了精神，走向妻子，夫妇俩默默地对望着，从妻子坚定的目光中，刘开渠重新找回了力量。他仔细察看了现场，发现按草图的设计，雕像下部的马腿、马肚子已经翻铸出来了，而且效果不错。他得到了很大的鼓舞，马上召集大家研究失败的原因，决定重做砂模，补翻未翻出的部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抗日英雄王铭章骑马像和基座的四块浮雕终于翻制成功。哪知他们正在庆贺胜利之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向他们袭来了，这就是 1939 年“6·11”日机对成都的大轰炸。事隔几十年，刘开渠先生对当时的惨景，一直记忆犹新：“那天，我正在工作室里，又响起了空袭警报。丽娜不慌不忙地为小孩收拾好食物和尿布。我催促她和其他人快进防空壕（就在我们院里）。

防空壕里太闷气，又小又潮湿，我的刚满半岁的次女小咪咪，一进壕洞就被闷热得哇哇大哭。突然一声巨响，天塌地陷一般，孩子也吓得哭不出声了。幸好土壕未塌，只是壕顶多处土块被震落了，其中一块正落进小咪咪的嘴里。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糟糕，房子上落炸弹了！”我昏头昏脑爬出了防空壕，只听一个声音在呼唤：“刘先生，求求你，给我口水喝……”我循声看去，这才发现，原来是我家做饭的大娘躺在地上，下身已被一颗敌机投下的炸弹炸飞，肚肠拖在地上……我双腿打颤，使出全身力量才说出几句话：“不能喝水。我马上找担架抬你去医院。”我好不容易找来担架，敌机又开始在头顶盘旋了……”

日机的这次空袭，不仅炸死了刘家的这位老保姆，还炸死铜像铸造小组的一位工人。尤其让刘开渠先生悲痛万分的是，他雇请来当“模特儿”的军人，一位被大家称作“老惠”的湖南籍战士，也被爆炸的弹片击中，当场身亡。但不幸之中的万幸是，仿佛上天有眼，王铭章将军的塑像一点也没受损害，敌机一飞走，掩埋好同伴的遗体，刘开渠带领大家，又投入了日以继夜的铜像铸造工作中。

这座骑马铜像纪念碑，终于在第二年即 1940 年秋天完成，坐落在成都少城公园荷花池畔。揭幕那天，成都各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公园，争相观看高达 3 米的铜制王铭章雕像：这位全副戎装、骑在骏马上的将军，宣誓出川抗日、热血保卫家乡的英雄，那坚毅的表情、威武不屈的神态，深深地鼓舞着遭受战火蹂躏的成都人民，一直到今天，还是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题材。

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1944 年，抗日战争节节胜利。成都市政府为了表彰奋勇出川、

在前线英勇殉国的川军仁人志士们，决定建立一座“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市政府首选的雕塑家又是刘开渠先生。怀着对三百万川军将士由衷的敬佩和热爱，刘开渠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个委托。尽管承包的经费极少，塑造这座雕像的很大费用都要刘先生自己开支，几乎属于半送给成都市政府，但他仍非常愿意制作这座雕像。刘开渠先生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我要创作一个理想的形象，通过它，不仅要表现出中国人民是勇敢的、坚强的人民，中华民族是有生气的、可杀不可辱的民族，而且还要表现出他们的勤劳、爱好和平、为和平而战的大无畏精神。总之，我想用我的雕塑艺术告诉我们的朋友和敌人，这样的民族是永远不会灭亡的！”

在这座新的塑像上，刘开渠先生以独特的艺术手法，突出刻画了人物面部表情的坚毅，强调了骨骼的硬朗。特别是对他的双目的处理，他采取了掏空的办法，这样就使远看的观众感到这个人物的目光是深邃的，性格是坚定的。

这座曾经长期屹立在成都东门大桥头，俗称“无名英雄”的铜像，没有毁于当年的战火，却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失去理智的人们推倒。所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它又重新屹立于成都的东大门万年场。

成都的厄运又起

1939 年 10 月 1 日，成都在惨遭“6·11 大轰炸”后，平静了几个月，市民们又一次经历了空袭的恐怖。当晚 9 时，日机 36 架分两批由湖北起飞，经川东北夜袭成都。敌机在次日凌晨 1 时

40 分左右到达成都上空，当时成都全市实行全面灯火管制，敌机盘桓多时，始终无法发现目标，只得在郊外盲目投弹约 50 枚，炸死农民 7 人，重伤 1 人，炸死耕牛 1 头，炸毁房屋两间。

1939 年 11 月 4 日，成都居民满以为到了年底，日机不会来袭，该喘口气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成都的冬季不像重庆那样大雾弥漫，形成一道屏障使敌无法来袭。日机趁成都这天天气较好，再次出动 54 架轰炸机向成都进袭。敌机在成都南北郊外先后投掷炸弹 123 枚，炸死无辜平民 16 人，炸毁草房、瓦房 62 间，重伤 18 人。

到了 1940 年 5 月，四川地区的天气情况变得开始有利于飞机航行，日机又准备开始长途奔袭成都。5 月 13 日在汉口的 W 基地，日本第三飞行集团长木下敏陆军少将与联合空袭部队指挥官山口多闻订下了“关于 101 号作战的陆海军协定”，规定从 5 月中旬开始，作战共约三个月，第一期仍然主要攻击重庆，第二期则定为对四川省省会成都的“攻略期”。从轰炸机部队的布置上，可以看出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力，即陆军第 3 飞行集团的 60 战斗队，配有 74 式重型轰炸机 51 架，临时编成的海军联合空袭部队配备有九六式中型攻击机共 132 架。陆军重型轰炸队以山西运城机场为出击基地，海军不仅从汉口，而且从西北约 50 公里的湖北孝感也派出了一部分兵力。

“101 号作战”蓉城也是重点

攻击从 1940 年 5 月 18 日夜间开始，在连续两天时间内，日寇由鄂西共出动驱逐机、轰炸机约 80 架，轮番夜袭成都。在两天的空袭中，日机投掷炸弹 100 余枚，由于遭到了驻成都的国民党空军的顽强拦截，加之地形不熟，日机将绝大多数炸弹投在了外

北新都县境内的斑竹园附近农村，农民死亡 30 余人，伤 10 余人。

然而这只是“101 号作战”的序幕，成都人民的更大灾难还在后头。

1940 年 7 月，日军“101 号作战”达到高潮。当月 24 日，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机由湖北起飞，长途奔袭成都。午后 2 时 30 分，日机 36 架分两批成菱形出现在成都市东面上空，驻成都的中国空军 6 架驱逐机立即起飞与日机展开空战。然而 6 比 1 的劣势，显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日机编队除以少数应战牵制中国战机外，其余全都扑向市区，在东南角春熙路至芷泉街、纱帽街至拱背桥一带投下爆炸弹和燃烧弹 138 枚。

由于是在市中心人口稠密地区轰炸，这次造成的损失极为惨重。炸弹落下后，各处大火熊熊，防护队员全部出动灭火救人。人们从火堆中拖出一具又一具尸体，有的头部、面部被烧焦，躯体犹存；有的烧成焦黑的一团残骸，根本无法辨认；还有的人被烧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其状惨不忍睹。市内诸葛井有李姓的一家四口，全被炸死；科甲巷张某之妻被炸死，张的幼子被炸弹爆炸后的碎片削去天灵盖，只剩半边头颅，见此惨状，在场的人无不悲泣。三圣街“美国浸礼会”也中了一枚炸弹，炸死 1 人，重伤 1 人。春熙路的《新新新闻》报馆后面，有几位躲在此处的妇女被炸死，她们手中都还抱着不满 3 岁的小孩！外东城墙边避难的市民数十人，几乎全部被炸飞的砖头、石块、弹片击中，或重伤或死亡，无一幸免。

这次惨烈的轰炸，成都市内共有约 40 条街道被烧毁、炸毁，倒塌房屋 638 间，死亡市民共 102 人，受伤 133 人，救护人员伤亡 153 人。

10 月 4 日，日军中型轰炸机 36 架由湖北侵川，扑向成都。市防空指挥部于 12 时 7 分发出紧急警报，市民紧急疏散。住在新东门附近的居民，纷纷逃往东较场、猛追湾乱坟坝躲避。12 时 40

分，敌机凌空，即以新东门为目标向东较场、猛追湾及新东门附近街道居民区投掷爆炸弹 51 枚、燃烧弹 42 枚。炸弹落地，顿时烟尘蔽天，身肉横飞，田边、地角、沟渠、坟场到处都是破头断臂、血迹斑斑的尸体。有的被炸成肉泥，不成人形；有的被烈火烧焦，成为炭块；有的肢离体碎，血肉模糊；有的穿肠破肚，血流遍地。不少怀抱孩子的妇女倒在弹坑里，花花绿绿的衣服变成片片血衣，凄惨万状。新东门城墙被炸垮一角，守城的两个士兵被炸死。城墙边的西蜀小学分校被燃烧弹引起的大火烧毁，校门外躲藏着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被火灼焦，事后清理现场，已经分辨不出是躯体还是焦炭。看守该校的工友也被炸成残疾。

在这次轰炸中，位于城北的城隍庙大殿被炸倒，看守香火的龛师也被炸死。天涯石北街落下了一枚燃烧弹，尚未爆炸，有个名叫李玉福的幼童，以极大的勇气守住这枚燃烧弹，不让人们接近。哪知这枚炸弹装的是延期信管，未等到清除就突然爆炸，近在咫尺的李玉福惨死在血泊里，前来协助清除炸弹的防护团一位队长也不幸牺牲。据成都防空司令部的统计，这次轰炸共造成无辜市民 105 人死亡，受伤 530 人，被炸街巷 13 条，炸毁、烧毁、震毁房屋约 160 间。

第二天，即 10 月 5 日，日军联合航空队再次由鄂出动中型轰炸机 36 架轰炸成都。11 时 43 分，市防空司令部发出空袭警报后，市民迅速疏散到四郊安全地带隐蔽，留在城内的居民大为减少。午后 13 时 10 分，日机侵入成都市北门上空，投掷大量爆炸弹和燃烧弹，从北较场一直炸到东打铜街、正府街。霎时，市区西北角上空全被黑烟、火光笼罩，在倒塌的房屋下压着一具具的尸体和断脚残臂的重伤者，呻吟声、号泣声、喊爹叫娘声此起彼伏，惨不忍睹。根据当时成都报纸的新闻报道，上河坝街一间破房屋里，有一个 90 多岁、鹤发童颜的老媪，被倒下的木板压死，白发染得殷红血赤，血淋淋的大肠从蓝布衣角中脱出。她的儿媳和不

满 10 岁的小孙女身肉模糊，躺在她身旁；她的儿子死在柴堆上，一家人全都死于非命。德盛街的土墙脚下，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死难同胞，其中一个补碗匠手里还拿着补碗钻孔的工具，显然是炸弹突然落下，来不及逃跑而身亡的。在他旁边还有一个佝偻老人，头部被碎片所伤，淌着鲜血，还未断气。另有几个少年，躲在北较场边街区的一个角落里，因房屋燃烧造成缺氧，又无法逃脱，全部窒息而死。这次轰炸，日机投下空中爆炸弹 73 枚，炸死平民 47 人，炸伤 121 人，救护人员也伤亡 5 名，经济损失达法币 602 950 元。

同年 10 月 12 日，日军航空联队轰炸机 27 架由湖北起飞，侵入成都。午后 1 时，成都市政府发出紧急警报，约 30 分钟，隐约听到敌轰炸机沉重的机声，旋即看见 27 架敌机成“一”字形出现在东北角上空，成都守军的高射炮立即猛烈射击，日机不敢低飞，只得在高空向西和皇城坝一带居民区进行“水平轰炸”，分批投掷爆炸弹、燃烧弹 96 枚。许多房屋被炸毁、焚烧、倒塌，20 余条街巷变成瓦砾、火堆，毁掉房屋 588 间，平民受伤 227 人，死亡 124 人，经济损失达法币 1 367 520 元。

这次轰炸，有几处大型建筑物被毁。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是一个拥有百张以上病床、设备齐全的大型医院，也是为遭受空袭伤害的人员施行救助的重伤医院，它中了两枚炸弹，约二分之一的房舍及医疗设备被炸毁，卧床病员也有不少伤亡。平安桥的法国天主教堂是一幢占地两亩多的古老建筑物，其教堂被日机投下的一枚炸弹炸穿，邻近的民房也因受震倒塌，压伤压死 10 余人。枇杷园的四川大学，中了两枚炸弹，图书馆和部分校舍被炸毁，学生也有伤亡。此外，被炸的街巷有长顺街、东城根街、金家坝、字库街和东西御河街，基本都是平民住宅。

由于日机使用了重型炸弹，在轰炸中，一处中弹，就有十多处被震倒塌，居民多有重大伤亡。在当年留下的一份空袭损害报

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字库街有一年近古稀的老人，被炸断一条大腿倒在火堆旁，在万分痛苦中死去；东城根街有一个叫李惠龙的，从瓦砾堆中爬出，鲜血糊满脸颊，手被碎片所伤，而且已经双目失明；四川大学李教授的老母，病卧床上，被炸弹炸死，侍奉母亲的妹妹也被弹片削去左手，鲜血直流；长顺街有一老太婆，解除警报回来，一见房屋已成废墟，财产化为乌有，一气之下昏死倒在地上。至于瓦砾土堆里、路边上、弹坑旁断肢残体的重伤者，仅救护第五中队一个中队（共有三四个小队）就抢救了 70 余人；交掩埋队掩埋的尸体 30 余具。在这次轰炸中，连救护人员也不能幸免，据成都市防护团事后的统计，各中队防护人员因公死亡 8 名，受伤 6 名。

“10·27”日机追着人群扫射

1940 年 10 月 27 日，日本飞机又一次对成都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上一年的“6·11 大轰炸”。这次空袭与“6·11 大轰炸”不同，上次是夜袭，这次是白天；上次以投掷燃烧弹为主，这次以机枪扫射为主。因此，尽管来袭日机数量不多，但却使大批无辜成都市民死于非命。

这天，日军 21 架轰炸机由鄂入侵成都，中午 12 时 20 分进入市区上空。在地面高射炮猛烈射击下，日机不敢低飞，从三千公尺高空水平投掷了 94 枚燃烧弹和爆炸弹，成都市西、南、北门一带街巷多处中弹，炸毁、烧毁、倒塌房屋 440 间，重伤民众 39 人，死亡 32 人，财产损失约计法币 683 300 元。

这次轰炸，成都直接受灾街道有二十余条，波及的街巷约七八条，以居民住宅为多，店铺次之。北门楞枷巷、金马街一带，灾情甚为严重，当地居民多系贫困户，不敢远离城市，成为轰炸

中的牺牲品。成片房屋被炸毁，成为焦土。一个裁缝铺的学徒被烈火烧得蜷缩成一团，头足难辨，焦黑的尸体发出难闻的恶臭。有几辆黄包车被炸得稀烂，拉车的苦力压在破烂的车架底下，头破血流，手足不全；一个茶馆的老板娘和她的几岁小孩，被炸弹炸成肉泥，房屋也被烧光。街沿、路边到处横七竖八躺着血淋淋的尸体。书裱、旧货、裁缝、笔墨纸张、茶馆、面馆、酒馆及人力货运车、黄包车等铺面被炸毁，人员死伤惨重。由于城防工作的疏漏，具体数字无法统计。包家巷甫澄医院被炸毁一二十间病房，医生、护士一死一伤；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房屋被炸毁一二十间，陈列馆的文物字画几乎全毁；动物园饲养的野猪、刺猪、狗熊、梅花鹿全被炸死。还有一枚炸弹落在祠堂街警察局后面的居民院中尚未爆炸，警士黄钰成奉命赶往施救，炸弹突然爆炸，黄钰成死于非命。

防护队五小队队长杨锡民，这次仍然参加了炸后的救援工作。据他回忆，在当天预行警报发出后，他率救护队向郊外疏散，敌机轰炸后飞走，他们迅即接到通知，要他带队赶到东较场城墙缺口执行任务。到达目的地后，即看见有数人被日机疯狂扫射的子弹所伤，防护队给予包扎后，即出城参加另外的救护。在沿城边的府河、南“母猪沱”一带，他们看到有许多还在冒着硝烟的弹坑，被敌机扫射受伤的人遍地都是。那些人断肢残脚，倒卧血泊中，辗转呻吟，一片惨状。他们给轻伤者就地包扎后，将重伤号分送四圣祠医院和其他医疗点。从城墙到猛追湾一带，经防护队救助的轻重伤者已达数百人，尚有各医疗点救护的人未计算在内。

日机这次轰炸重点在本市东南和西南地区，计有北糠市街、春熙路南段、东顺城街、油篓街、南新街、新街后巷子、走马街、祠堂街、少城（今人民公园）公园、西玉龙街、上罗锅巷和东较场内外、猛追湾等处，都是人口密集、店铺繁多的商业闹市区。

这次空袭，充分暴露了日机驾驶员的残忍本性。他们只要见到街面上有人群，即穷追不舍，俯冲扫射，恨不能将所有的人斩尽杀绝。少城公园假山前挖有一道很长的防空壕，警报拉响后，许多市民就近逃至该处躲避；敌机发现这里人群密集后，即反复在公园上空盘旋，不断向防空壕方向俯冲并猛烈扫射，壕内民众无法躲避，以致死伤无数。据防护团灾情报告，祠堂街名叫幺心一的市民全家避入壕中，被敌扫射，五六人无一幸免。这次轰炸之后，成都各个医院都住满了人，死伤人数虽无确切统计，但至少在三四千人以上。

1941 年“7·27”大轰炸

由于在数次空袭中都遭到了成都空军的拦截，一些日机被击落或者负伤逃回，日军于是加强了对成都机场的袭击。1941 年 5 月 20 日，日军 21 架驱逐机于 11 时 10 分侵入成都市，凌空后即排成“一”字队形，从城南武侯祠向西南方向黄田坝、簇桥、太平寺一带低空飞行，并用机枪扫射平民。两天之后，日军轰炸机 27 架再次奔袭成都，在外南太平寺、簇桥、红牌楼等地投掷炸弹 42 枚。这两次空袭的目标都是成都市西南郊外的机场和空军学校。据不完全统计，两次空袭造成 29 人死亡，11 人重伤。

1941 年 6 月 21 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侵华日军仿佛也不甘落后，加紧对成渝两地实施狂轰滥炸。6 月 21 日凌晨，日本 27 架轰炸机在 9 架驱逐机的掩护下，由汉口 W 基地出发空袭成都。上午 9 点警报拉响后，城内汽车都驶往郊外避难。当时一辆商用载重汽车搭乘疏散出城的市民 50 余人，由棉花街驶出城门，刚到小桥子，汽车尚在行驶，9 架日机突然凌空，发现

地面载满人员的汽车后，立即俯冲并疯狂扫射，司机当即被击伤，汽车翻倒，车上男女老幼均倒在水田内，压死天津籍难民张子祥及无名男子两人，重伤 6 人，其余人员均受轻伤。此次空袭造成的损害，当然远不止于此，但由于当时的资料散失，具体损害情况难以查证。

波浪式的轮番攻击

日机对成都“政略袭击”造成的第三次重大损害，是在 1941 年 7 月 27 日。这天上午 11 时左右，日军海军航空兵第五联队与左伯航空联队出动九四式中型轰炸机 108 架，分四批由武汉王家屯和山西运城起飞，空袭成都。

首批日机从川东北入境，经忠县、邻水、长寿、合川等地，直接奔袭成都。上午 10 时 20 分，成都市防空司令部发出空袭警报，11 时 20 分，紧急警报拉响。11 时 45 分，沉重的轰炸机声从东北角传来。霎时，北较场军校中弹，黑色的烟尘冲上云霄，达百米以上，来不及逃避的无辜市民被炸得血肉横飞。紧接着，另一批日机经铜梁、潼南、南充、岳池、广安，复经合川县西飞至成都上空，开始对以辛亥秋保路纪念碑为中心的少城公园和旧皇城、南较场、西较场及附近街巷进行猛烈的轮番轰炸，并扩大到西部三洞桥、四座磨及锦江两岸。日机驾驶员数次妄图炸垮“保路纪念碑”这座当时的成都标志性建筑，均因碑高且直、从空中看下去目标过小而未得逞，但日机在数次俯冲中发现了躲避在人民公园内的大批居民，于是趁机疯狂扫射，造成惨重伤亡。据成都民防当局事后的现场调查，这里成了特大灾区，屋檐下、树林中、花架下、池塘边和土山脚的掩体里，尸陈狼藉，血流满地。有的死者头、脚、手被炸飞挂在树枝上、墙壁上、屋顶上，有的

死者大片血肉被甩在断壁残垣上粘着。当时的报纸报道：一个被炸死的孕妇的头、身躯、手脚全都模糊不清，肚内胎儿从肚腹裂口处流出来，胎儿的头脚与带血的泥浆混合成黑乎乎的一团。还有一个少妇，左臂已不见，头上、左肋下淌着暗红的血，胸脯裸露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婴儿右手抓住母亲的乳头，张着大口睡在她的怀里，翘着屁股一动也不动，母子俩皆已遇难。

中午时分，又一批日机在多架驱逐机的掩护下，入川后经万县西飞，顺带轰炸了合川县后，经潼南、遂宁直达简阳，然后空袭成都。炸弹、燃烧弹不断投下，成都城西南均被黑烟完全笼罩，房屋倒塌，烈火熊熊。最后一批日机经川东北地区的梁山（即梁平）、大竹、岳池，再次飞临成都上空，在对成都市郊有关军事设施狂轰滥炸之后，又转向太平寺的两个机场，对仓库、弹药库投下数十枚炸弹，才分头向东北方向返航。

在这次轰炸过程中，敌机采用大批量、连续不断的“波浪式”攻击，给成都市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在《七二七敌机袭蓉概况》的报告书中记载：“此次空袭因敌机架数甚多，灾区极广，自鼓楼街、西顺城街、青石桥街一线以西之西半城的 120 余条街巷及西门外枣子巷、石人坝、抚琴台、四座墓一带均中弹。投弹数目有漏斗孔可查者，计爆炸弹 420 余枚，燃烧弹 20 余枚。唯敌机此次所投者多系小型燃烧弹，装置瞬发信管，一触即炸，纯以杀伤人员为目的……（这种炸弹爆炸后）地面多无漏斗孔，以敌机数判断，其装载量亦必不止此数，故实际投弹量当在八百至一千之间。”该报告统计，日机炸毁、震毁、烧毁房屋 3 205 间，经济损失约值法币 3 504 770 元；死亡人数 698 人，包括救护人员死亡 19 人；受伤人数 1 368 人，其中重伤 905 人；被炸面积约有两三平方公里。

造成如此重大伤亡和损失的原因，据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称，是由于“是日适值星期天，敌机久未轰炸，成都一般市民多逗留

城市，漫不经心，不肯疏散，经本部迭次电话命令军警、防护团督促，仍有不少人迟疑观望……”其实即使逃到城外，也难于幸免：一向较安全的城郊，在这次轰炸中成为重灾区，三洞桥、四座墓一线，田边、地角、桥头、林盘都留下数不清的大小弹坑，在此躲避空袭的两百多人，不死即伤，其状甚惨。据现场目击者报告和事后回忆，有的死者尸体倒插田中，有的父子俩拥抱着死在竹林里；一个躲在田角哺乳的妇女，母子皆死；婴儿还伏在母亲身上，因鲜血流尽全身苍白，惨不忍睹。路旁还有两座茅屋被炸，屋内祖孙三代老小四口僵卧血泊中，全部死亡。

城内重灾区是旧皇城附近一带，一颗炸弹把一株大核桃树连根拔起，躲在树下的回民苏旭群一条大腿被炸断，当时就断了气；苏的儿媳的胳膊被折断，孙女全身像开水烫过起满水泡，奄奄一息。清真西寺乡马尊五，躲藏在自家大院的防空洞里，炸弹把防空洞炸穿，他被活埋在洞里身亡。清真十寺阿訇余九臬被炸弹爆炸后掀起的泥土活埋在花园里，待挖出来后已经断了气；勤杂工马师傅被震动波高高抛向空中又跌下来，活活摔死。

除了大批炸弹、燃烧弹当场爆炸造成上千人伤亡外，“日机还留下未爆炸的炸弹五千枚”（省防空司令部的报告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此处可能有误，五百枚较为可信）。历经当年这场大劫难的当事者，至今活着的已经不多，邓璞如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敌机在本市西南、西北区投弹数百枚，死亡、损失极为严重。在西城清真寺三所被炸毁后，有的人从瓦砾灰烬中挣扎而出，有的则在血肉狼藉中呻吟，由防护队员从土堆中发现掘出，惨状目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轰炸，市民死伤达 1 600 百余人。这次空袭轰炸，我是亲身经历者，其详情如下：

1941 年 7 月 27 日，原中央政治大学在成都招考新生，我被派在外西南巷子培英中学考场任监考员。未发试卷前，学校就向

师生员工约法三章：① 如遇敌机轰炸，在预行警报时，学生就立即停笔，但不许离开座位，交回试卷；② 空袭警报时，学生整队离考场，出校门后，各自寻找适当地点隐蔽；③ 解除警报时间早，仍回考场继续考，如时间晚，则明日继续考。考试那天，敌机来了百多架，约在 11 时凌空轮番投弹。我在城外看到一颗颗黑乎乎的炸弹从天空投下，如下雨一般，然后听到城内隆隆的爆炸声，嗅到浓烈的火药味。我紧紧抱着一棵树的树根，闭目等死。人到了这个生死关头，虽然万念俱灰，但不免要想到妻儿老小，他们尚在城中，不知是生是死，真是百感交集！解除警报后，想家心切，我立即从城墙口进城，匆匆回家，见家人无恙，劫后余生，喜出望外。

听街邻说：‘青龙街、平安桥、少城公园等处都遭惨炸！’我遂与家人到灾区看看，走到青龙街成都县立中学附近，只见到处都有防护队员在挖掘死伤者，街面插满了红旗，不许通过。我即绕道羊市街到达平安桥，那里有天主教堂办的医院，正在收容受伤的人。沿途担架不断，伤者呻吟之声，令人心碎。我们看到一位妇女自小腹到下身的半截，都被弹片削走了，一片鲜红模糊的肉身裸露着，真是惨不忍睹！再转到少城公园，因辛亥纪念碑既高且直，敌机不易投中目标，但是机枪扫射，殃及桥下沟边隐蔽的人们，死伤也很大。

回家后稍停片刻，忽然长顺街半节巷内李少庚女医生带着孩子、包袱到我家来避难，说她家后院中了一弹，现在尚未爆炸，所以跑出来躲避。我立即前往她家查看，果然见到后院水井旁有一弹坑，仅一墙之隔就是我家大院，若是爆炸，我家也有危险。于是我们立即报告防空司令部，经查看属实，于是在弹坑周围插上小旗，派人日夜监视，不许居民走近。又在弹坑内泼洒水若干担，经过 24 小时后，才轻轻取出一颗完整的炸弹……”

张明锦的一段沉重回忆

长期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如今早已退休安享晚年的张明锦老人，也是成都“7·27”日本飞机大轰炸的受害者。她在回顾半个多世纪前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时，呼吁人们善待生命，警惕战争，珍视和平。她指出：“提起日寇在侵华战争中的暴行，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以及在日寇占领区惨遭屠戮的死难同胞。然而，对于当时远离沦陷区的四川大后方也有数以万计的同胞惨死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之下，人们也许就知之不详了。事实上，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当中国遭到外敌入侵时，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灾难之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的家庭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下面是张明锦老人的一段沉重的回忆：

顷刻之间家破人亡

1941 年 7 月 27 日，日寇出动 108 架飞机对成都进行狂轰滥炸。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世难忘却又不愿回顾的日子。

当时我只有 13 岁。在这一天之前，我曾有一个虽不富裕却很温馨、和谐的五口之家。全家靠父亲工薪为生，父母感情甚笃，姐姐就读于树德中学高中，我读成县女中初中，妹妹不到 3 岁。可是在这一天，38 岁的父亲和 17 岁的姐姐惨死在敌机的轰炸之下，我和妈妈被炸伤，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顷刻之间家破人亡！

多少年来，我不愿回顾、不忍回顾这带血的日子。一想起这段往事，我的心要淌血，我的泪要流。可是，为了让处于环境中无忧无虑成长起来的年轻朋友们了解过去，珍惜今天，我还是拿

起了沉重的笔。

在国弱民穷的旧中国，敌机来炸，偌大一个成都，上无战机拦截敌机，下无供人民栖身避难的“人防工程”。每当政府发布敌机来袭的“预行警报”后，惊恐万状的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跑”，跑到空旷地区，跑到郊外竹林茅舍下隐蔽起来。当时人们称之为“跑警报”。那时节，人们生活在“跑警报”的恐怖与慌乱之中。“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逃家离门时就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成都本是一个常年阴云笼罩的城市，平时偶尔天空放晴，人们总会感到精神为之一爽。可是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一遇到大晴天人们就不由得提心吊胆，因为这正是敌机来轰炸的有利时机。

我们举家遇难的那一天，正是成都难得的一个万里无云、碧空如洗的夏日。由于连续 20 多天没有敌机前来骚扰，人们沉醉在这难得的宁静之中，惊恐不安的神经也松弛下来了。

这天刚刚吃过早饭，就听见街上有人在喊“预行警报！”当时的“预行警报”是在各个街口挂出黄旗，表示敌机正向大后方飞来，通知市民提前出城避难；“空袭警报”则是急促的短声，表示敌机即将凌空。听到发布预行警报后，在家里一向诙谐、民主的爸爸笑着问姐姐：“大姐，跑不跑？”“我要跑，不管你们跑不跑！”姐姐一向很有主见的。于是，全家便翻越城墙缺口，跑到西门外的四座磨附近。我们城内的房东在那里农田中修建有几间专供跑警报的茅屋。

那一天，在这座茅舍的屋檐下、堂屋里挤满了跑警报的人。男人们高谈阔论，妇女私语，气氛并不算紧张，大概人们以为到了城外就安全了。我父亲坐在屋檐下。由于他的健谈和诙谐，身边聚了一大堆人。一贯爱听大人谈话的我，也和姐姐一道挤在爸爸身边，听他们谈天说地。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了。

上午 11 时左右，敌机排成一字队形从低空由城内方向朝我们的茅舍飞来，只听得炸弹爆炸声和机枪扫射声惊天动地。我吓呆了，本能地拔腿跑向躲在堂屋中的妈妈身旁。一刹那间，天昏地暗，我两眼一黑，右手一阵麻木。屋顶上的泥土、竹片不断打在我们的头上，我一边挥动双手抵挡，一手护着头部。一会儿，硝烟散去，我看见自己右手的三根手指正在汩汩地淌血，妈妈左眼被炸伤，血从眼眶里不断往外淌，只有抱在妈妈怀中的妹妹没有受伤。

妈妈定了定神，急促地拉着我往屋檐下去，一边走一边说："快去告诉爸爸，我们被炸了。"

刚跨出堂层，我们顿时惊呆了：屋檐下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的尸体！爸爸的头被炸碎，已无面目可辨。妈妈好不容易从枕藉的尸体中，从为爸爸做的袜底下辨认出了爸爸。她一头扑在爸爸身上号啕大哭。哭了一会，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她猛地站起身来，拉着我，抱起身边吓呆了的妹妹，直奔离茅舍不远的小河边。盛夏时节小河已经涨水。我跟着妈妈奔到小河边，她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她一边拉着我直往河中心水深处奔去，一边不停地说："我们跟爸爸去！我们跟爸爸去！"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妈妈要投水自尽。我大喊一声："我不死！我要活！"求生的本能，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不顾手指伤痛，拽着妈妈直往岸上奔。一些在一起躲警报的好心人也帮着我把妈妈拉上岸。这时，妈妈怀中的妹妹吓得哇哇大哭。我突然想起姐姐，赶快回到遇难者中去寻找，却不见姐姐的身影。我边找边喊，终于在离茅舍不远的田中找到了浑身是血、两眼紧闭的姐姐。我使劲摇她，喊她。她嘴里不停地哼，不知是听见我的叫声在作答，还是伤痛在呻吟。我一直守在姐姐身边，直到一些闻讯赶来救助的亲友把我从姐姐身边拉开。亲友们找来一付门板，准备把我抬去救治。这时，妈妈把当时全部家产——140 元的纸币，分了 60 元放在我身上。那个时候，在

民族危难面前，同胞们见义勇为，两个陌生人把我抬到附近的救护站，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又把我从西门抬到东门的四圣祠医院，放在医院附近一个礼拜堂地下的草垫上。

兵荒马乱中的截指手术

只有 13 岁的我躺在草垫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熟人，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受伤的手还在不断地流血。饥、渴、疲惫，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晚上 10 点左右，我听见有几个陌生人的声音在说："这孩子的手还在不断流血，失血过多，性命难保，必须赶快送医院，手术切除，止住血才行。"于是，我被抬到四圣祠医院手术室门外的地上。

大轰炸之后的成都，不少的家庭举家遇难，据说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内被炸死的尸体用卡车运了几天。医院里更是人满为患，不断有浑身血淋淋的伤员被抬进手术室，人们很难注意到我这个在地上的小孩。我知道不止住血就保不住性命之后，我强忍住饥渴和伤痛，只要手术室的门一打开，就拼命喊道："快抬我进去把手指拇截了！"但这微弱的喊声，湮没在来往运送伤员的嘈杂声中，根本无人理会。偶尔一次，手术室的护士回了我一句："肠穿腹破比你伤重的人多得很，你那点伤算什么。"直到凌晨一两点钟左右，手术室关门后，我又昏昏沉沉地迷糊过去。我仿佛觉得有人把我从手术室门边抬开，边抬边说："抬了死人又抬活人。"

第二天，7 月 28 日一早，我刚醒来，看见自己又被放在医院顶楼的走廊上。我身边仍然没有一个亲人，伤痛麻木的心，似乎还没意识到到底出了什么事。突然街上又喊起："预行警报了！"我马上从担架上爬起来，顶着像铅块般沉重的头，拖着棉花般酸软的腿，扶着楼梯，一步一拖地从顶楼挪到医院大门口，我要去

“跑警报”。当时，身边没有任何大人照顾我，我只记得东门猛追湾有我的一位舅爷，我要设法到那里去“躲警报”，我得自己救自己。

一出医院大门，意外地看见我姐姐的同学屈姐姐正来医院找我，真是备感亲切，我一下子扑进她的怀里，眼泪忍不住直往外流。屈姐姐给我带来一件面衫，罩在我那已被鲜血浸透的衣服上，又找来一辆人力车，把我和她一起拉到舅爷家。经过 7 月 27 日轰炸之后，成都街头一片惨景，无人掩埋的尸体到处可见。这一天敌机没有来，直到傍晚警报才解除。屈姐姐刚从威远来成都，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不敢在深夜行路，不得不赶快离开医院前往下榻的旅馆。

尽管我不断地喊“姐姐，把我的手指切了！”但重伤员多，我始终没有机会进入手术室。晚上 10 点左右，一位在成都市政府当勤杂工的陈二哥来医院看我，他是我们原住乡下时的邻居。我央求他说：“快去市政府找余伯伯（当时的成都市长余中英）给我开张条子，请医生把我的手指截了！”余中英是我父亲的朋友，又是郫县同乡，我父亲也曾在市政府供职。陈二哥很快拿来了余市长的条子，于是我才被抬进了手术室。

全麻之后，右手除拇指和食指外，其余三个指头全部被截除。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被安置在大病房的一间床上，屈姐姐在我身边坐着。早上医生正来查房，街上又发出了“预行警报”。我只好又在屈姐姐的陪同下去舅爷家，直到警报解除才回到医院。

第三天早上，查房的医生刚刚把我受伤的手拆开，正准备清洗上药，突然又有“预行警报”。医生顾不上诊治，匆匆地照原样把伤口包上。于是不得不再“跑警报”。傍晚又该回医院时，我那麻木的神经似乎才苏醒过来，哭喊着要找妈妈，决不一个人再回到医院。屈姐姐无奈，只好陪着我到市内亲戚家，到处找妈妈。找了几处都不知妈妈的去向。我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哭喊道：“妈

妈一定自杀了，我也不活了！”最后，我们在城外一个亲戚家才打听到妈妈的下落，原来她已住进陕西街存仁医院。

当妈妈看见我时，第一句话竟是责怪我不该离开医院来找她。她坚持要屈姐姐再把我送回四圣祠医院。因为她所在的那所专治眼耳鼻的医院不收普通的外科病人。她怕耽误我的治疗。我却执拗地哭着说：“决不离开妈妈，伤治不好，死也要死在妈妈身边。”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三舅父的一个朋友，我们喊任伯伯的，在斌升街开有一家私人诊所。我央求妈妈，允许我作为陪伴和她住在一起，白天到任伯伯家医手，妈妈这才允许我住下。

7 月 31 日，屈姐姐陪我来到任伯伯的诊所。这时离 7 月 27 日受伤已经整整四天了。炎天盛暑，伤势恶化，任伯伯一拆开伤口，就失声喊道：“哎呀！伤口生蛆了！”在任伯伯的精心救治下，我的伤口逐渐好转了。我记得，那断指根部残存的几块大骨头，是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剖开血肉，一块块用钳子钳出来的。任伯伯一边手术，一边连声称赞我：“真是个坚强的孩子！”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情况，正像一个哲人说过的：“忘掉忧愁的最好办法，就是有更大的忧愁。”比起父死姐亡的伤痛来，这点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样，我和妈妈躺在存仁医院的病床上，纵然再有“警报”，我们也不跑了。因为妈妈说：“死了，就跟爸爸、姐姐在一起了。”我和妈妈厮守在一起。这时城内许多亲戚都疏散到乡下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医院也没有多少病人，一个正在读高中的远房舅舅整天来陪我们。妹妹也不知被哪家亲戚抱去了。我手上的伤口慢慢愈合，妈妈被炸坏的右眼却在不断流血。医生主张摘除受伤的眼球，这个现在看来不算太大的手术，在那时却颇有风险。当时，妈妈一则怕手术出现万一，我和妹妹无人照应，二则怕手术花钱太多，断了经济来源的家，无力承担。因此不愿手术，想拖一天算一天。我劝妈妈说：“长痛不如短痛，治好了，保住了右眼；治

不好，我们就和爸爸姐姐在一起了。”这样，由我这个 13 岁的孩子作为亲属签字，妈妈的右眼被摘除了。

由于我父亲遇难前，已辞去了市政府的工作，父亲死后，没有任何抚恤费，一家三口，生活无着。我的四姨父，一位中学国文教师，为我们在报上“募捐”，我至今还记得那募捐文中的几句话，说我家“上无片瓦之覆，下无一垄之植，恳请亲朋好友，移香帛之资，为孤儿寡母助”。就这样，募得一笔捐款为我家日后的生计。九月初一，我们回土桥乡下。妈妈开垦祖父、父亲、姐姐坟边的荒地，种豆类蔬菜，聊补家用。知识妇女出身的妈妈，这样辛勤劳作是力不能胜的，我常为她半夜的哭声惊醒。作为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我无力为她分担劳作，也无法找到谋生的途径，只能不断用温言细语劝慰她。

这年 10 月，我父亲的老师夏斧私爷爷和父亲的朋友黄子刚伯伯将我从成县女中转学到成公中学，伙食、学费全免。这样，我才没有中断学业。1943 年，我一边读书，一边为人做家庭教师，担起了供养妈妈和妹妹的担子。这一年我才 16 岁。

对年轻朋友说几句话

对于在家庭遇难时，救助过我们的人，我衷心感谢，终身铭记。但对更多的人，我很少谈及这段伤心的往事。有人若好奇地问到我的断指时，我往往一笑了之，不愿详谈。

因为我家那种猝然从小康之家坠入贫困的遭遇，使我在旧社会备尝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我那颗高傲的心，拒绝别人同情，更不愿作为别人的话题。我要自己救自己，救自己的一家。但这愿望，在旧社会谈何容易。因此，纵使我学业之余在多处当家庭教师，收入不薄，但妈妈总是担心我会失业，因此吃穿用度

极度俭省，我们家终年难吃上几次油多的菜，更不要说吃肉了。甚至买牙刷的钱，妈妈也要问了又问才肯给。幸亏，在我大学最后一年，解放了。解放后，一切变了样。妈妈在衣食无虞，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今天，每当我在明媚的夏日里，看见无忧无虑地在阳光下追逐嬉戏的孩子们，每当我在月色皎洁的夜晚，看见漫步街头的情侣们，我就会从内心生出一股暖流：多么幸福的年轻人！你们今天没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计之忧，没有战乱频仍，东躲西藏的跑警报之苦，工作之余，能尽情享受人们应该拥有的欢乐！你们可曾想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多年不罹战祸的和平岁月多么来之不易！要是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百年来那种备受列强欺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痛历史不是不会重演，家破人亡的命运，也可能再次从天而降。年轻的朋友们，请记住 50 多年的和平生活，凝聚着老一代的浴血奋战，荟萃着各条战线无私奉献的人们的辛勤劳作。当我们今天享受和平幸福，享受美和爱时，也想一想自己将为下一代贡献些什么？

苏良秀家的悲惨遭遇

20 世纪 40 年代，回族人苏良秀住在成都市八寺巷 17 号(又叫人寿街，现成都市金家坝一带)。当时她只有 11 岁，一家 9 口人中，有 5 人死于日军飞机轰炸，她与小弟虽然幸存下来，但都落下终身残疾。2003 年 10 月 14 日，《华西都市报》报道了她一家的遭遇：

一家 9 口仅余 4 人

老人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日本飞机轰炸成都那天是 1941 年 7 月 27 日。当天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成都狂轰滥炸，整个成都爆炸声震耳欲聋。我的祖父那天到清真寺做礼拜去了，父亲在外地做生意，当天家里有 7 人，还来了 3 个客人，一共 10 个人。中午时分，空袭警报突然响起，我们 10 人全跑到后院的核桃树下躲起来。"不料，一颗炸弹从天而降，打在核桃树附近，"当时我只见火光一闪，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再醒来时，躲在树下的 10 人仅有她和小弟以及另外两名客人共 4 人免于一死，其他 6 人当场被炸死。经过这次轰炸，苏良秀一家 9 口仅余 4 人。其祖父做礼拜回来后，承受不住家毁人亡的打击，随后含恨而死。

她和弟弟终身残疾

由于 5 间房屋被炸毁，无处栖身，苏良秀和父亲、小弟只能搬到清真寺走廊上住下，过着凄惨的生活。苏良秀四肢被炮弹爆炸时产生的火焰大面积深度烧伤，左腿髋关节被炸成破损错位，她在马道街一家法国人开的医院里医了半年，但仍落下终身残疾。其腿部皮肤被烧伤后，由于没有及时清除淤血，左腿皮下的淤血已凝结成块，这几年来，髋关节和腿部的疼痛时时折磨着苏良秀。去年，苏开刀将左腿里的一个血块取了出来，还有两个大的血块仍在体内。"我至今保存着医生从我腿上取下的血块，这是日军给我造成伤害的罪证。"

与苏良秀一起受伤的还有她当时年仅 4 岁的小弟，他被弹片击中头部，不仅影响智力发育，而且造成了终身脑病。

发誓索赔警示后人毋忘国耻

“时间虽然过去60多年，但那时的悲惨情境仍然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一直在为失去亲人而难过!”苏婆婆说，多年来，她一直把仇和恨埋藏在心里。2003年10月，看到《华西都市报》关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准备向日本政府索赔后，她激动了，她觉得伸张正义的日子来了。她连夜写下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赔偿家毁人亡的损失，以告慰死去亲人的在天之灵。“我更希望通过我们的索赔，向后人展示这段屈辱的历史，以此警示后人，不要忘记国仇家恨。”

凶残的轰炸还在继续

仅仅过了半个月，日本飞机再次轰炸成都。凌晨，成都市民都还在睡梦中，日机已分批侵入四川境内，四川省防空指挥部发出“预行警报”，市民纷纷起床收拾好东西作好“跑警报”的准备。早晨4点20分，空袭警报拉响，在凄厉的警报声中，成千上万的民众摸黑蜂拥出城躲避。5时时分天刚破晓，紧急警报骤然响起，片刻之后18架日本飞机飞临成都上空，在南北郊外用机枪疯狂扫射，投弹数十枚，城南百花潭被毁，除有记录表明一位七旬开外的老人和他年仅3岁的小孙儿被炸得头破臂断、血流遍地外，其余伤亡情况难以追寻。

1939年6月到1941年12月，即日军实施“101号作战”、“102号作战”、“103号作战”期间，日机共出动500多架次飞机对成都进行了18次轰炸，投下炸弹、燃烧弹1 300多枚。成都百

姓伤亡 3 000 多人，整个城市房屋损失 9 000 多间，情景十分惨烈。时至今日，一些成都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这长达两年半的轰炸经历。

参考资料

① 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杂志蔺元兹撰写的“民间传闻”。

② 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杂志蔺元兹先生另一篇“民间传闻”。

③ 《四川日报》副刊《人物》，1999 年 5 月 21 日谌志源文《碧血长空保蓉城——记抗日民族英雄段文郁》。

④ 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杂志柳光笃先生的文章《“轰炸之王”葬身处》。

⑤ 杨锡民，邓璞如：《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成都遭受敌机轰炸的惨状》，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四川省遭受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不仅是重庆、成都，还有其他六七十座城市。被炸城市遍及川东、川南、川中、川西、川北，危害之烈，不亚于成、渝两地。当时的四川，没有一处地方被辟为与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除了从被击落的飞机里坠落下来之外，没有一个日本兵踏上过四川境内的土地。这个河山壮丽的西部大省，大大小小的古老县城散布在深丘或峻岭之中，远离战线。六千多万四川老百姓大多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日本法西斯缘何对这个“天府之国”如此切齿痛恨，除成、渝二地之外，还恨不得将全川其他既无战略意义也无重要军事价值的县、市悉数毁灭呢？几条战线同时作战的日军，本来轰炸重庆、成都就已经力不从心了，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大面积袭击四川省其他县市呢？

现代化大规模的战争跟冷兵器时代的攻城略地完全不同，尤其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最终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进攻的先头部队，而是以强大的后勤支援为后盾的持续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之所以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横冲直闯，几乎战无不胜，最现实的原因，并非它的兵士多么英勇、它的将领如何具有正义感、它的武器多么锐利，而是在于它那极其强大的后勤支援能力。美国参战后，它一月内生产的飞机、大炮、坦克和各种军需物资数量，就超过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年产量的总和，而且在美国广袤的土地上，还有几乎取之不绝的资源可供备用；以两亿国民为基础的庞大兵源，更是德、意、日三国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即使撇开道义方面的战争性质，单说实力对比，也可以说事先就注定了谁是赢家。

中国的综合国力当然无法跟美国相比，但在艰苦、漫长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却有着“天府之国”四川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力、物力资源都非常丰富，而且其人民甘愿为全民族存亡做出重大牺牲的‘大后方”,这是打赢这场持久战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川拥有巨大的作战后援能力，八年抗战中，她虽然远离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但六千多万四川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从人力、物力上为抗战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因此，日寇不遗余力地大面积袭击除成渝两地之外的四川其他县市，绝不仅仅是“虐待狂”和“嗜杀成性”；日军大规模轰炸四川，是有它的战略目的的。

日机袭川的战略企图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计划中，对具有如此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后方四川，显然不会视而不见。日本势力最早染指四川，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场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并向日本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 2 亿两白银，日本同时还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加给中国，规定“日本臣民行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延期工艺制造，又得将延期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其中长沙、重庆、苏州、杭州就被列为新的“通商口岸”。在此期间，日本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据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报道，“日本人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省可以抽调兵力多少出来作战”。1896 年 2 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已抵达重庆，盛气凌人地向中方通告，日本拟在重庆设立租界，清朝政府采取拖延战术迟迟未办。后来日方不断施以巨大压力，清政府被迫于 1901 年同日本签订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条约书》，规定“在重庆府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次年，日本租界正式对日本商人开放，大阪汽船和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及大

阪洋行、大利洋行、友邻火柴株式会社等十余个日本企业蜂拥而入；紧跟着，日本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从此王家沱一带“成了一个拥有全权的侵略大本营，一个‘国中之国’。”

日寇侵略四川的“秘密计划”

早在“七七”事变，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就开始千方百计向这个中国西部大省区渗透。或以公开的外交人员身份，或打着经商、文化交流的幌子不断派遣间谍深入四川腹地收买汉奸，扶植亲日力量，搜集各种情报，以配合其军事行动对全川实行颠覆，期望一旦不能实施地面部队的军事占领，也要尽可能破坏这个“大后方”的各种抗战功能，以绝后患。日本特务的秘密活动，一直受到四川地方当局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密切注视并力加挫败，轰动全国的“大川饭店事件”即为一例。但日寇并不甘心失败，以其驻渝总领事馆为大本营，在抗战爆发前夕加紧进行各种破坏、颠覆活动，企图为日后大举军事入侵铺平道路。日本领事馆加强了准备军事入侵的间谍活动，召谷廉二领事多次在此地秘密策划在四川扩张势力的阴谋，其活动的大致情况，在一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文章中可见一些披露。

这篇揭露日特“秘密计划”的文章作者署名为高永立，文章写于“民二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即 1937 年 6 月 30 日)。文章前写有一个序言，简要概述了情报的来源，称这个秘密计划是在 1937 年 4 月下旬，驻重庆的日本领事馆秘密召开的“四川谍报会议”上制定的。本文作者的密友刘君的至交好友某某，时为国民党重庆行营要员并担任“某项重要工作”，千方百计获得了日寇的

这份秘密文件，并查得当时参加会议的 40 多人，其中有日本领馆的特务 4 人，其余均为被收买的汉奸和当地的匪徒流氓。该“秘密计划”分为五个部分，现照录入下：

第一章　特殊贸易（即走私——高注）

帝国（日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之自称—高注）对华之特殊贸易，在华北及福建获利颇厚，近年帝国之财政情况转佳，实有赖于此。然特殊贸易在华中尤其四川，则不甚繁荣，实为吾人之遗憾。盖四川等地人民之购买力较一般为低，吾人当归下列办法打破此难关：

一、除照过去旧法，将帝国货物换制华方厂名商标（冒充中国国货——高注）外，并重新减低价格，以增强推销能力。

二、除将过去在蓉、渝、万（县）三处，已设立之特殊贸易机关，增加工作人员外，再于遂宁泸州嘉定叙府涪陵四处（原文如此）增设特殊贸易机关，以与当地华商多方联络。

第二章　贩毒

帝国之大陆政策，近年在军事政治外交诸方面，虽有飞跃之进展，但贩毒政策，亦应积极施行，以辅助军事政治之所不逮。贩毒政策过去在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南及福建等省收效甚巨，但对于四川从未有计划施行，今后当依下列办法积极进行；吾人预料，四川人民思想简单，此项计划，数月后当可收获宏效也。

一、暂从天津密运一批海洛因白面吗啡，分渝蓉万梁四处推销。

二、暂以巨金收买贩卖海洛因白面之川人二十，分赴边远县区推销。

三、在四月内，决在渝或万或梁山完成一所制造海洛因或吗啡之机关，地址在乡间为宜。

第三章　成都设领

成都位于中国西南要枢，为中国后防重镇，亟应设置领事，以统制帝国在华西之工本人员，使其能有严密之联系。设领问题，去年曾向南京政府要求承认，惟以成都人民顽固反对，当去年岩井

将预备赴蓉时，我帝国之二新闻记者，又被成都暴徒击毙，设领问题遂因之搁浅。后虽对我死者赔款道歉，然未达设领之目的，吾人为帝国发展计，今后当派人赴蓉与刘（湘）主席接洽，谈判此项问题，力促其早日实现。接洽时须尽量避免成都人知道。（月余前喜多曾来蓉，与中央社记者谒刘，谈话不过五分钟，未得结果而返，十日左右以前，闻又有日人来蓉接洽，亦未得结果而去，恐日帝国主义，决不因此失望，以后当更积极进行其计划也——高注）

第四章　挑拨离间使刘陷于孤立

四川处于西南与西北华北之联络点，对于政治及时局，均具有决定作用。广西陕甘绥晋河北诸省，民众与军队抗日情绪均高，今四川当属刘湘因与中央之矛盾，亦有加入抗日阵营之倾向，尤其在西安事变时，刘之态度非常明朗，吾人若不设法破坏，将来必为帝国大陆政策进展之障碍。今后当照下列办法进行，使刘陷于孤立：

一、于重要时机，从多方制造谣言，夸大地方与中央之矛盾，使内战爆发。（过去四川发生一两次谣言，沪报都说来自日使馆，与此极相符合——高注）。

二、挑动缺乏抗日情绪之军队，作反刘军事行动。

三、离间刘与广西陕晋之联络，使刘陷于孤立。（过去喜多到云南，后又到四川来，便是离间云南与广西及四川与广西之联络，在四川虽未成功，在云南却收了一些效果——高注）。

第五章　破坏救国会

查成都救国会之成立，始于今年三月，人数虽只在五百左右，然其组织与主张对于社会之影响，实得一般人之同情，不可忽视也。吾人应照下列办法从速破坏，不然则对帝国之影响，实未可预料也。

一、利用××训练（这两字是我临时用××来代替的——高注）之学生，作反“立即抗战”之宣传，谓日本之进攻东北四省及华北，不致速亡中国，如中国果立即抗战，则物质准备不足，反足

以遭致速亡，以理论攻击救国会立即抗战之理论，使之陷于破产。

二、从各方面宣传，说救国会就是人民阵线，人民阵线就是共产党，救国会就是共产党的外围，人民必须防共产党，防救国会，共同消灭救国会，使救国会脱离民众。

这份揭露“秘密计划”的文章刊登后不久，《救亡会刊》即遭到成都市警察局的查封，这份文件的作者及其真伪和产生的种种复杂背景，已不可考，当年查封该刊的成都警察局的报告、批文上也语焉不详，现在看来疑点不少。然而有两个基本事实是可信的：作者显然十分了解在抗日战争即将开始时，日本当局对中国大后方四川奉行的政策、目标和战略，熟悉日本特务在川的活动详情，此其一。其次，此前此后发生的事实与该文件披露的情况大致吻和，如当年五月初，日本驻渝领事馆官员多喜确曾潜来成都，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一起秘密会见正在成都布置川军出川抗战的四川省主席刘湘，重新试探日本在蓉设领之事。但洽谈只进行了约五分钟，即遭刘驱逐；之后重庆日本领事馆又多次利用亲日报纸散布谣言，离间刘湘为首的四川实力派地方军人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等等。因此笔者认为，即使这份“秘密计划”是杜撰的，但其披露的内容决非空穴来风，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份以特殊方式揭露日寇破坏四川抗战工作的阴谋、引起全川人民高度警惕，唤起川人坚决抗战到底的珍贵史料，其用心可谓良苦，其爱国热情更是难能可贵。

轰炸四川的具体步骤和战术

“七七”事变三周之后的 1937 年 8 月 1 日，在重庆人民一片

怒吼声中，日本驻重庆领事馆 29 人在召谷廉二率领下，登上了日本商船“宜阳丸”，由日本炮舰“比良”号掩护撤离了重庆，之后日商、日特在重庆地区的所有工厂、商业机构或关闭或瘫痪，日寇阴谋破坏四川抗战运动的活动彻底破产。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就开始着手制定武力攻击四川的“战略轰炸”作战方案了。

日寇对整个四川省的空袭，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早期阶段（1938 年）：此时抗日战争处于第一阶段，日寇由于侵华军事行动进展迅速，因而蔑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战争潜力，满以为凭借军事力量便可以“速战速决”，彻底征服中国。故其空军采取的策略是以战略袭击为主，政略袭击为辅，作战目标侧重于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破坏，轰炸范围多系与军事直接有关的地点。当年，日机开始进袭四川，但全年一共只有不到 10 次的轰炸和袭扰，每次最多不过出动 27 架飞机，空袭明显带有试探性质。其轰炸目标主要是重庆、成都和梁山（梁平）的空军基地，目的是打击中国后方的空军力量，破坏机场设备设施，并为下一步的大规模空袭四川作实战演练。

中期阶段（1939—1941 年）：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寇由于战区扩大，兵力不足，加之中国中西部的山地战场不能充分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因而军事进展迟缓，始觉单靠武力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速战速决既不可能，于是日寇改变侵华政策，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企图实现所谓“速和速决”。日空军为了与此配合，也改变策略，以政略攻击为主，战略袭击为辅，轰炸目标迅速由点、线扩展到面，范围遍及中国后方的广大城市，甚至农村也不能幸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危害无辜平民，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扰乱后方的社会秩序，破坏中国的抗战潜力，以此迫使中国政府屈膝投降。

基于这种“以炸迫降”的策略，日寇在这三年之中，调集其侵华空军的主要力量，肆无忌惮并连续不断地对四川进行所谓“空中闪击”，每次出动大队机群，时而分批进扰，时而集团袭击，规模之大、轰炸之烈，都是其他省、区所罕见的。特别是这三年夏秋两季，四川人民几乎难有安宁之日。在为此而策划的“101作战”“102作战”计划实施过程中，日机的首要目标是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其次是四川省会成都，然后是自贡、万县、泸州等重要的资源城市及空军基地所在的县市。而一些城镇既非重要军事、经济目标，又非日机来袭入川必经之地，但日寇为了要“沮丧中国之民气”，也不惜代价长途跋涉进行狂轰滥炸，其攻击目标不仅指向重要工厂、物资仓库、首脑机关和军事设施，而且将各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和居民住宅区也作为毁灭的对象。每次除使用爆炸弹之外，往往还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妄图在爆炸之后继以焚烧，把四川的重要城市化为一片焦土，使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陷于全面瘫痪。在这3年时间内，全川共有六七十个市县遭到了日机的空袭，造成极大的损害。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美国对日参战，加之日军同时又侵略东南亚各国，从而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穷于应付的被动局面，不得不把侵华空军力量抽调到其他战区，其对四川的“政略轰炸”，终于以失败告终。

后期阶段（1943—1944年）：在停顿了1年多之后，日寇于1943年2月，又恢复了对四川的空袭，并一直持续到1944年12月。这一阶段日机的攻击目标以沿重要交通线的城镇和空军基地为主，袭扰的地区包括重庆、成都、梁山、万县、新津等市、县。当时，日本由于受到太平洋和东南亚战线的牵制，能够用于侵华战争的空军力量十分有限，加上美国援华空军陆续进驻四川，日机已失去往日的空中优势，再也不可能为所欲为，故入川空袭的

次数不多，规模一般也比较小。

这一阶段日机袭川的动机和目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日寇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活动尚未奏效，企图再次进行军事打击、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迫其就范。日军这两年中大举进攻国民党部署在正面战场的军事力量，同时轰炸后方城市，就是这一计划的具体体现。二是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党政府和盟国驻川空军部队多次出动飞机，频繁轰炸沦陷区日寇的军事目标，且袭击的机群多由四川各基地出动，故日军在遭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也派战机入川轰炸以图报复，借以减轻其受到的空中威胁。

日寇轰炸主要采取的战术

空袭四川各地的日机，为使攻击取得最佳效果，其方式变化多端，可谓花样百出。他们通常用的战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分批进袭，连续轰炸

通常是用小批机群，对袭击目标进行轮番骚扰，每批间隔一定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延长空袭过程，使被炸城市无法坚持正常的生产及生活，也难以组织群众消除空袭后果。日机袭渝采用的“疲劳轰炸”战术，也是这种袭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有时持续空袭时间长达数天，而且昼夜不断，使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惨重损失，同时也给防空部门的工作增添巨大的困难。

大队机群集团袭击

采用小批量机群进袭，弱点是容易遭到中国空军驱逐机群的狙击。为了安全和增强空袭的威力，日寇在空袭渝、蓉等重要城市时，也经常采用大批机群分进合击的战术，各个编队机群抵达目标附近后，先按预定方案集结于高空，然后乘隙窜入市区狂轰滥炸。日机采取集团袭击方式，一般都派有驱逐机护航，出动的飞机多在百架以上。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这种战术的要点是使被攻击目标在意想不到和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突然袭击，以加大空袭造成的损害。日机实施这种袭击时，每每奏效，使四川不少疏于防备的城镇深受其害。例如，当时的川东重镇奉节县，本是日机沿长江入川的必经之地，开初日机路过这里时一直未在该县投弹，一般民众逐渐产生麻痹思想。1939 年 6 月 28 日大批日机凌空，市民仍以为系过路飞机未加重视，结果遭到 21 架日机的轮番攻击，毫无防备的群众死伤千余人，大半个县城顷刻之间变成了废墟，其损失为万县地区之冠。乐山、松潘等县首次遭到日机空袭就损失惨重，也是由于对日机这种战术缺乏警惕造成的。

先虚后实，杀回马枪

日机空袭四川某些县城，有时先投下少量炸弹，然后佯装返航，实则是飞往附近无防空监视哨的地区盘旋，使当地政府误认为空袭已结束而发布解除空袭警报，当避难群众纷纷返回家

园时，日机突然返回大量投弹、扫射，使民众因猝不及防而大批丧生。

先撒传单，后投炸弹

为了麻痹目标地区的民众，日机还采取先撒传单、后投炸弹的手法，以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如 1940 年 9 月 3 日轰炸南充，造成死伤各 1 千多人的大惨剧，即是采用的这种战术。当日，36 架敌机凌空后，首先并不投弹，而是以各种队形在低空盘旋，同时散发大量配合日寇政治诱降的反动传单。尽管政府当局一再拉响防空警报，但不少市民误以为头上盘旋的法西斯强盗并无空袭之意，大祸临头仍若无其事，有的还在抬头观看日机的“飞行表演”，有的争相拾捡落下的各种传单，根本未作逃避打算。日机撒完传单，一齐列队飞往城郊绕了一圈，然后像饿虎扑食一样向城区俯冲下来，顷刻之间，炸弹、燃烧弹和机枪子弹密若雨点，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城区各处血肉横飞，硝烟弥漫。当天南充逢场，赶集的人很多，这次空袭死伤各 1 千多人，大量的房屋财产被毁，其状惨不忍睹。

低空突袭，机枪扫射

这是日寇以消灭地面人员为目的，辅助炸弹轰炸从而扩大战果的战术，也是战争后期日机袭击四川境内各空军基地的惯用手段。主要原因是日机飞行员的投弹技术欠佳，且炸弹成本高昂，轰炸机场目标一般命中率很低，浪费很大，因而后来改用以强行俯冲、机枪扫射为主，代替投弹轰炸的办法。日军大本营曾一再吹嘘此举的战果如何辉煌，其实因子弹的威力毕竟大大低于炸弹和燃烧弹，效果并不理想。在袭击城市居民疏散隐

蔽的地点和一些小场镇时，日机也把这种战术作为杀伤人员的重要手段。

日机撒下的传单

在对四川各地的轰炸中，日机往往都要撒下大量传单，或花言巧语劝降，或赤裸裸地炫耀武力，或以日本占领区所谓“歌舞升平”引诱苦战中的后方军民，内容五花八门，目的却只有一个：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妄图以这样的“纸质炸弹”击毁抗战军民心理防线，不战而胜。

对这样的宣传战，当时各地政府的措施是比较严厉的，日机投下的传单一经发现即悉数没收销毁。因此，事隔 60 多年后，已经很难再见到当年日本飞机与炸弹一起投下的传单了。我们在对当年日机对四川大轰炸的调查中，意外地在四川省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保存完好的日寇传单，这里不妨公之于众，从另一个侧面看看日本法西斯的嘴脸，也作为一份难得的历史存照吧。

这份传单是 1941 年 7 月 30 日日本飞机在四川大竹县境内投掷的，为此，当时的大竹县政府还特向“四川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呈递了一份报告，称：

“昨日敌机窜入县境旋于十一时复窜县城上空盘旋一匝，并投掷物品下地。派搜查人员呈缴检获之敌宣传品本年六月十七日小申报四张，内容荒谬，亟应查禁……”

传单约八开大小，最醒目的是这样一个大标题：

“中国的民众呀，请速要求你们的空军飞起奋战！”

接下来，它的内文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你们的空军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的空军到底在干着什么？

你们真的没有足以保卫头上空中的空军吗？

重庆的上空，昆明的上空，成都的上空，滇缅路的上空，都被日军所占领；日本的空军可在这些地方的上空飞行无阻，连日接夜的实行轰炸而不受到丝毫阻碍。

统计自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七日止，前后不过十几天，其间被日本空军所击毁的你们贵方飞机，已达五十一架。这些飞机，都是看见日机来袭将行桃（逃）之夭夭溜之大吉飞避他处，在途中被击落；或不敢起飞反攻日本空军，缩首敛翅似的蛰伏飞机场而被炸毁的。

其中虽然偶尔也有几架新近从美国运购的优秀飞机，然而就大体而言，却是不大中用的古董式飞机的集团。在过去，你们对于空军的建设，曾费过不少的心血和牺牲。

然而结果如何呢？你们的心血和牺牲，不是只购置了一些性能低劣无用之物的古董式飞机，和聘用了一些畏避空战的驾驶人员而已吗？

因此，你们似应立即要求贵方的空军起飞以尽其所应为的任务呀！”

在此文的旁边登有两幅大照片，一幅画面为日机飞掠重庆上空，另一幅为重庆被炸后冒出浓烟的情形；其说明文字是：

“从空中日机上俯摄的重庆，如一条白色的带是扬子江，右面的支流是嘉陵江，其合流点有黑烟上升的是渝市，飞翔着的不用说是日机。”

传单的另一面最显眼的是一幅“抗战必败”的漫画，与之并列的则是一些看似商业广告的文字，也不妨照录一二：

“新雅粤菜馆，著名菜好，定价公道”；

“乐府，仙乐舞宫，设备富丽，红星云集”；

“中电舞厅，点心精美，女子招待”……

不用作任何注解，日寇妄图瓦解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企图，就从这些精心选择和搭配的图文内容上昭然若揭。的确，中国的空军到底在哪里？对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的复仇日，究竟是哪一天？

在后面第六篇“大后方人民的反抗与贡献”里，我们将向读者介绍，历史终归会做出无情的回答！

四川各地被炸实录

自 1938 年至 1944 年，日机在长达 7 年的时间内，对川东、川南、川中、川西、川北几十个县市进行了轰炸、袭击。当时，被轰炸的县市到底有多少？几份统计各说不一。不过，不管是几十，日机轰炸的本质不会变，所造成的死亡、伤害、毁灭，与成、渝两地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这里，除了少数能够采访到当事人、收集部分活材料外，对大多数县市，我们已无法详细描绘种种惨状了，只能根据当时各地政府和防空部门呈报的空袭损失记录，或当地史志、文史资料的记载，将部分市县被轰炸的大致情况罗列于后，作为历史存照：

川东地区

梁平（梁山）

梁平在三四十年代名为梁山（1952 年改称梁平），是抗战期

间日本飞机轰炸四川各地中受损程度仅次于重庆、成都主城区的地区。梁平虽是个偏僻的小县，却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空军第三总站和后来美国战略航空队的秘密基地，有两三座军用机场。加上当年日机从武汉起飞轰炸重庆必经梁平，该县因此成为空袭的一个重要目标。

据梁平县档案局资料不完全统计：自 1938 年 10 月 4 日起至 1944 年 12 月 27 日止，日机出动 81 批次，共近千架次，轰炸梁平 51 天，投掷爆破弹 2 568 枚，燃烧弹、定时炸弹、照明弹和细菌弹共 2 882 枚，炸死 1 708 人，伤残 773 人，受细菌染病死亡 123 人，炸毁民房 5 069 幢，给梁平人民造成极其巨大的损害。

特别令人发指的是，日寇还在梁平惨无人道地投掷了细菌弹，可是日本政府事后却拒不认账。近年来，梁平发现的多个炸弹，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日寇的罪行。

据新华网重庆频道 2001 年 7 月 25 日报道，重庆市博物馆历史部主任李金荣透露，从梁平县一个建筑工地发现的一枚未爆炸弹不同寻常的内部结构看，有可能是一枚日军投掷的细菌弹。梁平县文管所所长杨正平介绍，这枚炸弹是一名钻探工于 7 月 14 日在梁平县城东池街一建筑工地上发现的。那天，当这名钻探工将钻机钻到离地面 10 米深时，突然发现地下有坚硬的异物，随后一股似煤烟的浓烈气味冲天而出。钻探工当即将钻机提了上来，结果发现钻机遇到的异物原来是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得知消息后，杨正平等人很快赶到现场对炸弹进行了初步鉴定：此枚炸弹长 60 厘米，直径 21 厘米，圆周长 68 厘米，重 40 公斤，没有文字编号。杨正平等人认为，从其外形推断，这应是日本人曾经对梁平轰炸时一枚未爆炸弹，而从炸弹的内部结构和炸弹内部的残留物推断，很可能是一枚细菌弹。据记者看到，炸弹弹头被钻机钻空，中间有一个大洞，洞的里面有几个小室。洞内和小室中均遗留着类似盐巴或化肥的油腻状的白色颗粒物，刺鼻的煤油味四处散发，闻

后使人作呕。

杨正平称，为了弄清这枚炸弹的真实面貌，他在发现当日便揭开炸弹后座，将炸弹里面的白色粉末掏出一部分，准备请有关部门对白色粉末进行化验，但由于梁平县缺乏化验设施，他又将白色粉末用一个塑料袋封存好，通过邮局寄到了重庆市博物馆，希望博物馆能够联系有关部门进行化验。收到杨正平的来信后，重庆市博物馆历史部主任李金荣即与重庆市部分单位联系，希望有关部门能对白色粉末进行化验，但未找到合适的部门。李金荣说，日军对重庆使用细菌弹的证据越来越多，包括日本学者对本国的军事档案进行研究后，也提出了日军确实对重庆地区使用过细菌弹的看法。重庆地区的史料也有所记载，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实物证明，对这种说法还无法做出结论。如果这枚炸弹就是日军当年使用的细菌弹，将充分证明日军当年的暴行，同时为大轰炸时期的幸存者及死难家属向日本索赔提供有力的证据。

2001 年 8 月 2 日，日本“731 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一行 8 人，冒着烈日前往梁平，走访了大轰炸幸存者，踏寻了当年修建的防空洞以及今年 7 月 14 日挖出日军炸弹的现场及挖掘者。余承瑞、田光国两位老人痛苦地回忆了当年的可怕经历，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本国内一小撮右翼分子的无耻谰言。

82 岁的余承瑞老人，抗战时期是位骨科医生，他的家早在 1939 年就被日机全部炸平，父亲在避难中病恨交加而死。他回忆道：

“1943 年 8 月，日机投下了细菌弹，白雪一样的东西从天上飘下来，像棉花一样松泡，老百姓根本不知是啥，还用手去接。经县卫生所检测后即时鸣锣通知，日机投的是细菌弹，不准再吃生水，家里碗筷要消毒。当年无病症发生。到第二年春夏，从东门大炮台至西门灵土地一带，挨家挨户的人都发病，个个发烧恶心，头昏气紧，身现红斑流鼻血，重症者即死去。”

余存瑞当年也被传染，看着一个个邻居惨死。但他参加了政府的救治行动，卫生部门组织他们熬煎中药逐户送药医治，才减少了一些死亡。

81 岁老人田光国沉痛地回忆了 60 年前的经历：

“当年，我家好多邻居都惨死在日机轰炸之下，我家房屋也全被炸平。”

“日军太狡猾了，最初只轰炸军事设施，在人们毫无戒备后，才开始轰炸县城。几次大轰炸后，北正街一带房屋全炸塌了。地上布满弹坑，树枝和电线上挂着肢体……”

律师团表示，将把收集到的证言带回国告诉日本人民，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自 1997 年开始，“731 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代理细菌战中浙江、湖南 180 名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并对每人按 1 000 万日元赔偿损害。到 2001 年 8 月，关于细菌战的审判已开庭 24 次，预定当年 9 月和 11 月再开庭两次，预计 2002 年春做出一审判决。2000 年 11 月和 2001 年 3 月的 6 次庭审上，11 名证人和 7 名原告出庭。律师团的一濑敬一郎先生说:“如此大量的证人和原告在法庭证词上是史无前例的划时代的事情。原告主张的日军进行了细菌战这个事实，可以说依据证据完全被证明了。”

“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幸存者所提供的关于日本军轰炸梁平地区以及投掷细菌弹的言证、物证，这对我们代理日军侵华受害者起诉日本国政府非常有价值。”

2002 年“8·15”前夕，梁平县城闹市区旧城改造的工地上，再次挖出 60 年前日本侵华空军投掷的一枚哑弹。这是近两年来梁平县城发现的第三枚日军炸弹。（其余两枚分别于 2001 年 7 月 14 日和 12 月 11 日，在县城另外两处工地挖出。）

2002 年 8 月 5 日下午，白沙河堤岸上自来水公司家属院工地，

钻探工谢大勇打桩下钻，在距地面约七八米处触及坚硬异物，钻头冒出耀眼的火花，还飘出一股刺鼻怪味。他下坑一看，发现是一颗尖头平尾、锈迹斑斑的铁坨坨，回想去年有关挖出日军炸弹的报道，猛然醒悟这又是一枚日军炸弹。随后，县文管所和公安局的人员赶到现场，在排除爆炸可能的情况下，才小心翼翼地将炸弹吊上地面。经粗测，弹体长约 90 厘米，直径 30 厘米，重量约 70 公斤，两个汉子才把它抬上警车运至安全地方妥善保管。但第二天上午下钻时，又遭“卡壳”，发现坑底还躺着一段铁家伙。施工队只得用起辘轳，让有关人员下坑一桶一桶掏走泥沙。至 7 日上午，铁器全部现身，原来是炸弹的残余尾翼，因年久锈蚀已分家。

据当年大轰炸的受害者余承瑞老人介绍，1939 年 3 月 29 日，18 架日军轰炸机分成 6 组，从县城东门方向贴着房屋上空飞过，对毫无戒备赶场的人们狂轰滥炸。煤炭市、猪市坝、鸡鸭市买卖煤炭、畜禽的贫苦乡下人割草般倒下，残肢断臂，开膛刮肚，肠子横流，电线上、树枝上挂着血淋淋的五脏六腑，血糊糊的断手断腿飞上屋顶。仅此一次，就炸死 259 人，炸毁民房 1 495 间。余老认为，这次发现的这枚炸弹可能就是那次轰炸时，钻进水底淤泥里未爆的“哑弹”。解放后，垒砌河岸兴修房屋，这罪恶的“铁证”被掩盖了下来。

万　县

1939 年 1 月 14 日，6 架日机飞临万县上空在城区投弹，居民躲避不及，死伤无数。当时，有许多妇女在天仙桥河边洗衣服，儿童随母亲在河滩玩耍，日机在城区投弹后发现了他们，立即向这些妇女儿童扫射，在密集的弹雨中，成百的妇女儿童惨死在河里，幸存者中也有许多人受伤致残。二马路鲁班庙一

所小学内，校长周昌兰正指导学生排练话剧，一颗炸弹投下，周校长和十多名学生全被炸死。周昌兰的下肢全被炸断，飞到一丈以外的石坎下。学生们被炸后，有的头颅粉碎，有的四肢不全，有的肝脑涂地，处理后事的防护队成员和死者家属，竟无法辨认尸体。

1939 年 2 月 4 日，日机第二次轰炸万县。这天下午，18 架日机两次飞临万县，在盐码头、南门河坝、米花街、真原堂、二马路等 40 多处投弹 131 枚。万县河坝临江闹市地段被炸得最惨，一条河街几无完处。躲避在法国教堂真原堂的郑国光医生一家 6 口，被炸死 4 人，只剩其妻和其妹。其妻终日哭泣，不久即神经失常而死。土桥子的沈百权一家 7 口全被炸死，其邻居方饼子一家 5 口，4 人被炸死，只留下 3 岁女儿，亦被炸致残。陈育堂一家 7 口，被炸死 5 人，陈本人被日机俯冲扫射时的子弹穿胸死去；儿媳腹部被弹片划破，血流不止而死；陈的儿子肢体被炸断，痛苦呻吟，惨死于废墟上；幸存的 5 岁孙儿陈光科，额部被弹片划破。据统计，当天日机共炸死居民 278 人，炸伤 157 人，毁房屋 246 间。

此后，到 1943 年 8 月止，日机共空袭万县 17 次，造成死亡约为 1 450 人，伤 3 000 余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达　县

1940 年 8 月 21 日上午，9 架日机成“品”字编队空袭达县县城，在城东的半部投炸弹、燃烧弹 40 余枚，城墙被炸塌 10 米，民房被炸 30 多家，在帝王宫附近炸死国军连长 1 人、排长 1 人、司务长 1 人、壮丁 20 余人，居民也有 20 多人被炸死，其中严吉思一家 7 口、一李姓人家母子 7 人全部被炸死。此次轰炸共计死亡 44 人，伤 64 人。

渠　县

1940 年 8 月 21 日，日机分 3 批共 36 架轰炸渠县，投掷炸弹、燃烧弹共 40 余枚，东门糜伦一家 7 口、河边一艘船上 20 余人、北门裴松山一家 10 口人，全部遇难身亡。大批群众在逃往后溪沟的路途上，被日机驾驶员发现，立即飞来投弹，并对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俯冲扫射达 20 多分钟，后溪沟顿时尸横遍野。据统计，渠县城民众共死亡 400 余人，伤 200 余人，死伤人数占当时这个人口的不多的小县城的 7.5%。日机轰炸后又遇大风，渠城顿成一片火海，共有 400 余幢房屋被烧毁，万石仓储藏的军粮，也被付之一炬。

1942 年 7 月 15 日，日机 9 架再次空袭渠县，投弹 54 枚，炸毁房屋 18 幢，炸死民众 13 人，伤 5 人；其中开冷饮店的张教儒一家 7 口躲在简易防空洞内，全部罹难，无一人幸存。

大　竹

1942 年 7 月 15 日，日机 9 架从西至东向大竹县清水乡新庵子袭来，此时大批群众正在里这里唱秧苗戏（木偶戏的一种），一枚炸弹正落在观众之中，当即炸死谢富邦老人，另一名妇女尹春惠的左手被炸断。野鸭池黄家沟的 6 间瓦房成为一片废墟，大片竹林和农作物毁于一旦，直接经济损失逾万元。

南　川

1939 年 10 月 13 日，南川县城正逢集，上午 10 时许，18 架日机突然前来空袭，凌空后即向城内熙熙攘攘的人群疯狂扫射，接着轮番轰炸，整个城区顿成一片火海。一颗炸弹炸毁了南街城

墙，石头像雨点般落在南门河岸的商店、铺面上，数百人顿时死的死、伤的伤。城内肖家院子的掩体也被炸弹直接命中，躲在里面的男女老少全被炸死；西城龚家塘蒋家的一楼一底房屋被夷为平地，一家人全部遇难。敌机轰炸后，留下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午后，整个南川县城几乎全部成了一片瓦砾，当时的县政府也不得不迁到南城外硫磺村杨家祠堂办公。这次轰炸中，日机投弹 142 枚，其中燃烧弹 5 枚，炸死居民 180 人，炸伤 130 余人。

1939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2 点，21 架日机又空袭南川，它们先盘旋在县城小北门上空，继而对新建的县政府轮番轰炸，共投弹 84 枚，炸死 8 人，炸伤 19 人。

1940 年 7 月 9 日下午 1 时，日机 9 架在南川西城区、石囿、中山公园一带投弹 41 枚，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女子中学中弹起火，炸（烧）死 9 人，炸伤 33 人，毁房 365 间。

开　县

1940 年 6 月 25 日，2 架日机在开县大慈山上空投炸弹 2 枚，老荒沟的张美犹在自家院内中弹，共炸死 7 人，炸伤 11 人。

1941 年 8 月 11 日上午 8 时许，9 架日机轰炸开县温泉镇，投炸弹 46 枚、燃烧弹 16 枚，炸死 28 人，炸伤 43 人，毁房 49 间。

一周之后，日机 16 架从宝塔窝方向飞来开县，一到城边缘的老关嘴，立即投下一枚炸弹。之后沿寻盛六、衙背后、睡佛池一线狂轰滥炸，仅啄啄丘一带就有 40 多人被炸死，田里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一个被炸死在廖兴顺秧田里拾谷穗的小女孩，只剩下一个脑袋和两只脚，躯干被炸得不知去向。凤凰头一带李其昌的妻子已怀孕七八个月，正在啄啄丘拾谷子，被一弹片拦腰削去，腹内的胎儿被炸成两截。替开县电灯公司挑煤的南山坡 4 个农民

青年，也被日机上的机枪扫射，死在啄啄丘。日机的一枚炸弹扔在老头嘴码头一只木船上，船被压沉，船上乘凉的十多人全部掉入河中被淹死。皮家院子陈润生家中落下一枚炸弹，全家 7 口，被炸死妻子、儿子等共 6 人，陈润生成了孤儿；东街雷聘九父子俩双双遇难，成了绝户。这次轰炸开县，日机共投炸弹 76 枚、燃烧弹 90 枚，炸死 170 人，炸伤 400 余人，毁房 192 间。

1944 年 12 月 19 日晚，一架日机途经开县上空，将所载炸弹和手榴弹沿灵通、铁桥、南雅等乡一带投掷，炸死 5 人，炸伤 3 人。

忠　县

1941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 时，一架日机窜入忠县，低空盘旋一圈后，即投炸弹 4 枚，一枚落于江中，一枚重磅炸弹落于马路口街心闹市，正在赶集的人们避之不及，惨遭横祸。此次轰炸共炸死平民 19 人，重伤 41 名，毁铺面 41 间。落在县城东门国术馆前的炸弹，炸死平民和学生 3 名，炸死医院里的伤兵 11 名。

1941 年 6 月 28 日 11 时，25 架日机再次轰炸忠县城关，炸弹击中合作金库、吴氏宗祠、川主庙等十余处，炸毁民房 10 余间，炸死 8 人，炸伤 17 人。合作金库会计陈永翱夫妇及儿女 2 人、外甥女 1 人，一家 5 口全部罹难；库警陈思荣、县政府派驻金库的自卫队士兵王育之亦被炸死，死时肚破膛裂，惨不忍睹。

1941 年 7 月 27 日 14 时，9 架日机轰炸忠县城，四枚炸弹击中黄龙门外坟山，炸死在此躲避空袭的平民李喻氏、喻王氏、罗石氏、莫杨氏等人和 14 岁的男孩高毛。22 岁的李喻氏死后，腹中的胎儿还在蠕动。这次轰炸共死亡 5 人，重伤 14 人、轻伤 6 人。杨光富、杨光玉、杨光清三兄妹被炸成重伤致残。

1941 年 8 月 19 日，日机又一次空袭忠县，因资料散失，具

体损失不详。23 日上午 11 时和下午 11 时，日机 17 架分两批，再度空袭忠县，投炸弹 92 枚、燃烧弹 30 枚，弹中丁字街、正街、老街、会仙桥、北门场等十余处，炸毁房屋 42 间，烧毁 8 间，炸死平民周达祥、吴正宽、叶天明等 8 人，其中有 75 岁的老太婆王何氏和 14 岁的少女张道。重伤者有沈光才、周兰芳等 14 人，轻伤 7 人。

从 19 日至 23 日，日机连续 5 昼夜不断前来忠县骚扰、投弹，致使全城无法解除警报。老百姓在极度的惊慌中渡江躲避空袭时，又遇江水猛涨，船少人多，拥挤坠江而被溺死者不计其数。两次有记载的大轰炸，忠县古城内著名的唐代古庙宇龙兴寺、四贤阁、太保祠等名胜古迹，均遭到毁坏，损失无法估计。

云　阳

1940 年 8 月 17 日到 1941 年 8 月 30 日止，日机对云阳县进行了 6 次空袭，总共炸死 270 余人，炸伤 150 余人；其中最惨烈的一次，是 1941 年 8 月 2 日的大轰炸。

当天上午 10 时左右，从云阳县云安镇牛头山方向突然飞来 9 架日机，机翼上的日本太阳旗标志清晰可见。日机对云安镇轮番轰炸，镇内 20 多处房屋、十多座盐灶被炸，大火熊熊燃烧，成百上千的群众纷纷拥向镇北郊有防空洞的马卡口躲避。日机发现后，随即调转头来，对着人群疯狂轰炸和扫射，叶家桥至马卡口一带，立即被黑烟笼罩，街道上尸体堆积如山，血流遍地。据事后统计，仅这条街上，就有 100 多人死亡。马宁湾菜贩罗矮子的肝肠肚肺被炸飞，挂在桑树上；路经陶家祠堂躲避的 9 岁小孩宋家兵，被炸后埋于瓦砾之中，废墟中仅露出一双小脚。一些群众在慌乱中躲进一处厕所，恰被一枚炸弹击个正中，当场死亡 12 人，丈余见方的粪池里，装满了身肉模糊、缺腿少胳膊的尸体。云安镇是当

时川东最大的盐业重镇，这次日机空袭，前后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投弹 100 余枚，炸死 200 多人，重伤 40 多人，轻伤 100 余人；炸毁房屋 30 余处、盐灶 10 间、盐库一座，盐厂被迫停产半月之久，损失法币约数百万元。

奉　节

1939 年 6 月 18 日下午，日机对奉节县城的大小西坪、西门、十字街、罗家巷、羊市街、大东门外进行了首次轰炸，投弹 129 枚，炸死 812 人，炸伤 899 人，震倒房屋 798 间。城西码头街的李和顺，正在自家开的土陶铺内为儿子举行婚礼，宾客盈门，一百多名贺客刚入席坐定，便听见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众人纷纷朝尾傍沟坎下逃去。不料一枚炸弹从天而降，正落到人群中，顿时血肉横飞、尸首遍地；李和顺一家除一个儿子外，全被炸死，宾客也多数被炸死炸伤。永茂兴糖果铺一家十来口人，除李永珍和邻居等人幸免于难外，父母兄妹 9 人全被炸死。

1939 年 9 月 30 日晚上 9 时，日机对奉节县城的协台坝、小东门等处再次轰炸，共投掷燃烧弹 333 枚，烧死 112 人。当时城内逃难者躲在北门外后坡坟园里，此处杂草丛生，又正值秋天草枯叶黄，燃烧弹一落下，顿时烧成一片火海，百余难民除少数人幸免，其余全被烧死。据幸存者邹成英、匡太昆两位老人回忆，遇难者董德孝怀中抱一婴儿，母子俩活活被烧死后，躯体还不断在燃烧；一对老年夫妇上身被烧焦，双目紧闭，下肢还在继续冒着火苗。

1939 年 10 月 24 日午后，日机空袭奉节城内的黄州街、长顺街、中正街等处，投弹 155 枚，其中燃烧弹 61 枚、炸弹 94 枚，炸死 38 人，炸伤 7 人。

在 1941 年 8 月 11 日正午 12 时的空袭中，日机又炸死奉节城

内居民 16 人，炸伤 19 人，毁屋 64 间。

巫　山

从 1939 年到 1941 年，日机对巫山县进行了 11 次空袭，炸死 243 人，伤 340 多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是 1939 年 7 月 12 日，日机 18 架空袭巫山，炸死居民 106 人，炸伤 168 人。在十字街口，两名值勤的警察被炸死，只找到了一条腿和两截被炸烂了的枪管；居民田发贵之妻被炸后，尸体不知去向；在天对宫后面，躲避在此处的 5 个老太婆全被日机投下的燃烧弹引发的大火烧死；在禹王宫后面，卖水贫民何邦云一家 4 口全被炸死，成了绝户。

另一次大轰炸是在 1941 年 1 月 12 日上午进行的，当天日机 9 架向巫山县城东南角投弹 42 枚，炸死 47 人，炸伤 24 人，炸毁房屋 15 间。从前线撤下来暂驻转角楼第十七后方医院的伤兵 30 余人被炸死，20 人伤上加伤。县政府因一时无法筹集到如此多的棺木，只得用白布裹尸，将 30 名遇难伤兵合葬于一个大坑内。

巫　溪

1941 年 8 月 8 日晨，一架日机从东飞至巫溪大宁厂上空，盘旋数圈后离去。下午 1 时，7 架日机以前三后四成“品”字队形从溪口方向飞来，向盐区的衡界涧、张界涧、太山庙等地投弹轰炸，日机投完炸弹转回原路向东飞去。这次轰炸，共投下炸弹 35 枚（其中一枚未爆炸），炸毁盐灶房 2 处，居民住房 21 间，木船 1 艘；炸死平民 4 人，重伤 9 人，轻伤 50 人。居民刘汝秀被炸死时，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婴儿。此次轰炸使多数盐灶房和客店停业近一年时间，经济损失 10 多万元。

涪　陵

从 1939 年至 1941 年，日机对川东重镇涪陵共进行了 7 次轰炸，一般都是在轰炸重庆后路过涪陵，顺带对涪陵轰炸一番。在这 7 次轰炸中，共炸死无辜居民 350 余人，轻重伤约 400 人。最严重的一次是 1940 年 7 月 31 日，那天中午，日机 18 架自东面湖北方向窜入涪陵上空，对涪陵乌江口西岸的繁华闹市区轮番投弹。小东门卢陵会馆当时关了很多壮丁，看守者没来得及带出去躲藏，结果炸弹正落到会馆里，炸得墙倒瓦飞，很多壮丁当场死亡。后来挑选 20 多个没被炸死的壮丁将死者用盐包子（即包装食盐的竹篾制品）裹尸，先抬去蔡家坡官埋葬；后来死人太多了，只好将一包一包不成形的尸体晚上抬去倒入长江中，就这样，也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才清理完毕全城的尸体。这次轰炸日机共投弹 87 枚，造成 200 余人死亡，伤 120 多人，毁损房屋 1 000 余幢。

秀　山

1939 年 10 月 10 日上午，秀山县军民约 300 余人聚集在县城南门外中山纪念堂前，纪念辛亥革命 28 周年。9 时 10 分，由湖南侵入四川的 6 架日机飞临秀山上空进行空袭。日机分成两组，由 2 架战斗机护航，盘旋一阵后，即开始攻击，先用机枪向县城扫射，随即投掷燃烧弹 30 余枚、炸弹 75 枚。全城顿时浓烟滚滚，大火冲天。20 分钟后，日机向东飞去；解除警报后居民回城救火，这时全城已成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到下午 6 时，才相继熄灭。这次轰炸，由于城里居民疏散及时，伤亡较少，共计被炸死居民 3 人、值勤宪兵 1 人，炸毁、烧毁房屋 2 000 余间，其中学校 3 所。

丰　都

1941 年 7 月 14 日，日机多架次轰炸丰都商业场、省银行丰都办事处、小西门等闹市区，投弹之处火焰四起，房屋梁断墙倒。居民许幺姐一家 5 人被炸死，殷思木家被炸死 3 人，居民殷朝华之母怀有身孕亦被炸死。这次空袭共炸死丰都居民 20 人，炸伤 60 多人，炸毁房屋 200 余幢，造成上千家居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县政府也被迫迁往城郊麻柳嘴，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使整个丰都县城处于瘫痪状态。

1941 年 8 月 8 日、10 日、23 日，日机又连续三次轰炸丰都，共投下炸弹、燃烧弹 66 枚。日机飞临县城上空，投弹后引起大火，被炸的楼房、商店全成了废墟。公园路、中城路被炸断，一卖菜农民的手被炸飞到八圣宫楼上。居民湛盛茂家新修的三层楼房，被炸弹烧毁，其母痛不欲生，扑向火堆自尽。丰都县防护团总干事刘耕都被炸死。这三次轰炸共炸死 39 人，造成重伤 59 人，轻伤 47 人。

川南地区

泸　州

1939 年 1 月 11 日，日本飞机 3 架首次空袭泸州城，在东门轮船码头投弹两枚，炸中公司囤船一条，该船立即沉没。日机随即又在大北街投弹一枚，炸毁戏院房屋，并使数人受伤；另一枚炸弹落在小市镇五峰顶侧下排风山，伤 1 人。

1939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 时，日机 36 架袭击泸州，投弹 200 余枚，其中有少量燃烧弹。日机在轰炸的同时还以机枪扫射地面，

北城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毁民房 760 余栋，事后经登记注册的尸体就有 1 160 具，轻重伤 1 445 人，还有未登记、自行处理的伤亡人员二三百人，不少人全家无一幸存，无辜市民家破人亡，啼号不已。这次轰炸造成物资财产损失极大，大小河街的烟、盐、糖店铺，会津门一带的药材、山货铺，纽子街的花、纱、布店，三牌坊的百货店等都化为灰烬，总共损失价值银元 2 000 万元以上。

1940 年 8 月 12 日，日机 13 架轰炸隆昌县后转袭泸州城，投弹 20 多枚，毁房 60 幢，伤亡 256 人；其中仅凝光门一处就伤亡 125 人，中城公园一带被炸死、炸伤者百余人。是日当空袭来临，市民逃避不及，有百余人挤塞在凝光门洞内，日机在城门洞两端洞口各投一弹，两弹同时爆炸，巨响如雷贯耳，当场炸死、震死 56 人，另有 30 余人因洞口垮塌泥土封门窒息而死；幸存者均受伤。

1943 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下午，日机数十架于空袭宜宾返航途经泸州城上空时，在城内闹市区投下一颗巨型重磅炸弹，落在新马路太和铁工厂内，炸毁 3 个院子的房屋和 13 间店铺，炸飞该厂碎毛铁三百多吨，幸无人员伤亡。

1943 年 7 月初，日机多架再次袭击泸州，从厂场湾（今中山公园）处开始沿三星街、二太街开始轰炸，一直炸过长江南岸二郎滩上面的桥沟头，这一段长江里的鱼类也未能幸名，被炸死后浮出水面，白花花的一片；三星街南侧沿老城墙脚下的防空洞被炸塌，伤亡数十人。

1943 年某天，日机夜袭泸州城时，在水井沟街投弹数枚，炸毁原川南师范学堂房屋数间，伤亡多人，校内血肉横飞，死者头发、碎肉溅在墙壁上，其状极惨。

泸　县

1939 年 1 月 10 日，3 架日机首次空袭泸县，造成城边和近郊

农村多名无辜群众伤亡，多间房屋烧毁、倒塌。10 月 2 日，日机 9 架再次夜袭泸县，共投炸弹 16 枚、燃烧弹 2 枚，炸死 2 人，炸毁房屋 8 间。

1940 年 8 月 2 日，36 架日机分两批轰炸泸县，投炸弹 62 枚，燃烧弹 21 枚，因是逢场天，乡民多拥入县城内交易，来不及躲避，造成死亡 307 人、轻重伤 362 人、炸毁民房 362 间的重大惨案。约半月之后的 8 月 16 日，日机 54 架再次大规模空袭泸县，第一批日机 27 架在本县沙湾投下炸弹 107 枚离去，第二批 27 架日机接踵而至疯狂轰炸、扫射，因预先发出警报、疏散及时，损害比前几次大大减少，共有 10 人死亡，轻重伤 16 人，毁坏房屋 706 间。

1941 年 7 月 28 日，18 架日本飞机在泸县市区三道桥附近投下炸弹 99 枚，并用机枪对地面人群扫射，造成 12 人死亡，46 人受伤，房屋被毁 44 间。

隆　昌

1940 年 8 月 2 日午后，日机 45 架飞至隆昌县城，分三批对城区轮番轰炸，并用机枪扫射地面跑动的居民。隆昌全城火光冲天，南外河街全毁，东北新街、公包巷、官井巷、姚家巷、菜园子被炸毁大半，县政府、财委会、文庙坝、县男中、民教馆亦遭轰炸。隆昌地处重庆、成都之间，由于日机来回轰炸成渝两地，城内居民对日机凌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然而日机突然对本县实施袭击，居民则惊慌失措、到处乱跑，死于弹片、扫射和被房屋倒塌压死者，比比皆是。据 1940 年县政府、县空袭救济会联合办事处关于防空情况报告表记载：此次空袭，日机投重型炸弹 19 枚、破甲弹 94 枚、燃烧弹 6 枚，还有若干手榴弹，共炸死居民 166 人，炸伤 195 人，炸毁房屋 637 间。

合　江

1940 年 8 月 16 日上午 11 时许，日军飞机 20 余架由东向西掠过合江县城，飞往泸州方向。下午 1 时许，日机返回，至金华山上空，散成“一”字形，分组向县城俯冲，投下炸弹、燃烧弹的同时并以机枪扫射。城内顿时黑烟弥漫，火光冲天，房屋倒塌，砖石乱飞。日机旋即飞向城东笔架山，自东向县城俯冲，再次疯狂轰炸、扫射，致使合江县半个城区顿成一片火海；被炸最惨的北门城外，大街小巷血肉横飞，尸骨纵横，瓦砾成山、哭声震天。这次轰炸，造成合江县城受灾约 2 000 户，全城约有三分之二的房屋被炸毁、烧毁。根据 1945 年四川省政府所编的《四川被炸各县人口伤亡分布情形》记载，合江县被列入死伤各在 500 人以上的 49 个县市内。

乐　山

1939 年 8 月 19 日上午 11 时 50 分，日军侦察机一架侵入乐山城上空，侦察后逸去。12 时，36 架日本九六式轰炸机飞来，飞临城区上空时，由“品”形改为“一”字形，低空对乐山城进行了狂轰滥炸。在一平方多公里的闹市区，投下炸弹和燃烧弹 100 余枚，并用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居民疯狂扫射。顿时，弹片横飞，烈火熊熊燃烧，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炸弹的爆炸声，房梁的垮塌声和人们呼救的哀号声，混成一片。有的人当场被炸断四肢，不能动弹；有的肚子被炸破，肠子流了一地；有的被压在砖石下，呼喊救命。有一个姓田的孕妇，被弹片击中，肠开肚裂，胎儿弹出老远，身肉模糊。被烧死者甚众，有的人手脚烧断，只剩下一段身躯；有的人头颅烧焦，只剩下残骸。围困在大火中的居民，有人在慌乱中跳入水缸，而外面大火燃烧使其不能逃出，缸里水也烧开，人被活活蒸煮而死。在这次轰炸中，全城有 48 户人家全

家死光，成了绝户；东大街王家祠堂罗姓人家 6 口，躲入私人防空室内，因泥土垮塌不能逃出，被全部闷死，事后从里面抬出的尸体，衣服和胸部都已抓烂。较场坝街荀子言全家 5 口人全部被炸死，财产化为灰烬。冉季隆一家 7 口，无一幸免。有少数住户虽有幸存者，但也受伤，状况仍然十分悲惨。如开染房的邓志清，一家 7 口被炸死 6 人，邓的妻子幸存，手臂被炸断，失去生活能力。据当时上报的统计结果，被炸死 838 人（而另据当地民间机构的统计，有 5040 人被炸死，出入很大），炸伤 380 人，毁房 3 000 多幢，全城经济损失达法币 2 亿元以上，被炸毁的大小街道 27 条，占全城 3/4 的面积。

1941 年 8 月 23 日 12 时 5 分，日军轰炸机 7 架由南面方向再次侵入乐山城，进行第二次轰炸。其空袭的目标为 1939 年第一次轰炸后残存的县街、府街、叮咚街及铁牛门、玉堂街一带，共投弹 34 枚，炸死 11 人，炸伤 30 人。

日机轰炸乐山后，还引出一段有趣而发人深思的后话。

日机轰炸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无数家园顷刻间变为一片火海。有个在日机轰炸中家破人亡的老太太，呼天抢地号哭了三天三夜，逢人便数落日寇暴行，双手不断挥向天空，硬说她要把在天上丢炸弹的日本鬼子抓下来“抽筋剥皮”，以解心头之恨。当然，这不过是当时老百姓同仇敌忾，心情悲愤的反映而已。事实上，乐山当时虽有不少驻军，但却无任何防空火力。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位老太太“活捉飞贼”的愿望，却在乐山被炸 6 年之后，被另一个乐山人实现了。此人就是现住台湾的乐山籍老兵谈宗昌先生。据返乡探亲的谈先生回忆，他少年时目睹了乐山大轰炸这一惨痛事件。出于对日寇暴行的激愤，谈先生于 1944 年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赴印度、缅甸对日作战，次年回国后又参加了湘西对日大会战。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谈先生随所属的驻印新六军二十二师从日本人手里接收

南京中山陵、光华门等地区，首先接收的是位于光华门外的日军空军医院。这所医院虽然还相当整洁，但却空荡荡的，上百张病床只看到一名未及撤逃的负伤空军上尉。一见“国军”进入，这个日本人立即恭敬地举起军刀表示投降。谈先生仔细一看，这个半坐在病床上的日军俘虏原来是个只有一条腿的伤兵，其残肢上还裹满绷带。经审讯，得知此人名叫清永次郎，正是 1939 年 8 月 19 日驾机轰炸乐山的刽子手之一。据清永次郎交待，当年轰炸乐山的 36 架飞机属于日军最有名的轰炸机大队木更津航空队，专门培养“斩尽杀绝”的空中杀手。大队司令官是马正义，已于 1944 年 10 月充当“神风特攻队”的“肉弹”与一美国军舰相撞身亡。清永次郎还说，当时的四川只有重庆有防空能力，一次轰炸重庆即被打下 6 架飞机。而乐山则根本没有防空火力，轰炸后在低空拍摄影片非常安全，以致轰炸乐山的实况记录片成为日本空军行凶杀人的一部“样板片”，每年天皇裕仁生日和“七七”事变日，都要在敌占区公开放映，借以炫耀侵略者的“战功”和威吓敌占区的中国老百姓。

当清永次郎得知谈先生是乐山人时，承认他对乐山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一再惶恐地鞠躬谢罪，请求宽恕。

宜　宾

1939 年 10 月 2 日（农历 8 月 20 日）晚 11 时半，宜宾市发出预行警报；过 10 分钟，发出空袭警报；子夜 12 时发出紧急警报。5 分钟后，敌机即临宜宾市空。是夜敌机共 3 批，第 1 批 12 架、第 2 批 6 架、第 3 批 9 架，共 27 架，长时间盘旋后，在菜坝机场投弹 100 余枚；在市区投弹 1 枚，系小型炸弹，弹落小北门内崇报寺门前，炸死一老一小，炸伤 1 个妇女（机场损失不详）。

1939 年 12 月 19 日（农历冬月初 9 日）晨，敌机入川，午前

10 时 10 分，宜宾市发出预行警报；过 10 分钟，发出空袭警报；再过 10 分钟，发出紧急警报。至 10 时 40 分，敌机 25 架已到宜宾市空，盘旋 4 圈后，于正午 12 时飞走。相隔约 10 余分钟，又有 9 架敌机飞来，在菜坝机场投弹 30 余枚，除造成机场设施损失外，幸无人员伤亡。

1940 年 4 月 22 日（农历 3 月 15 日）午后 6 时 30 分，宜宾市发出预行警报，经 10 分钟发出空袭警报，再过 10 分钟发出紧急警报。至 7 时，敌侦察机一架及轰炸机九架已临市空，敌轰炸机成品字队形，盘旋数周后，即由敌侦察机在菜坝机场上空投布照明弹，先后 2 次，计约 30 余枚（每个照明弹上装有保险伞，徐徐降落，光亮一如白昼）。敌轰炸机随即向菜坝机场飞去，先后投掷炸弹 3 次，共 500 余枚（内有巨型炸弹 2 枚），炸死卫兵 2 人，炸伤 1 人，烧焚机场附近民房数间。自抗战以来，敌机使用照明弹，并不常见，就全国而言，此为第 3 次；其在川境，则为第 1 次。

1940 年 5 月 19 日（农历 4 月 13 日）午后 6 时 30 分，宜宾市发出预行警报，又数分钟，发出空袭警报，再过数分钟，发出紧急警报。又数分钟后，敌机 20 余架已临市空，盘旋至第 3 次时，即开始投弹。计北门真武山中弹 2 枚，陕西馆中弹 2 枚，洞子口河边中弹 3 枚（一枚落水中），此外又在宗场所属铜锣湾投弹 2 枚，麻糖坝投弹 1 枚，菜坝附近投弹数 10 枚。共炸死 12 人（铜锣湾一处即死 6 人），炸伤 24 人（铜锣湾一处炸伤 2 人）。延至午后 9 时 30 分，敌机方逸去。

1941 年 5 月 20 日（农历 4 月 25 日），敌机数十架分 3 批由鄂入川，宜宾市午前 9 时 50 分发出预行警报，11 时 50 分发出空袭警报，12 时 15 分发出紧急警报。至午后 1 时 10 分，敌机 27 架（品字队形）飞临市空，先在空中盘旋 1 周，旋即在菜坝机场投弹 300 余枚，炸毁邮航机 1 架，炸死 1 人，炸伤数人。敌机投弹后东遁，午后 1 时 31 分解除警报。

1941 年 8 月 11 日（农历 6 月 19 日）凌晨，敌机由鄂分批入川。午前 4 时 24 分，宜宾市发出预行警报，5 时 10 分发出空袭警报，8 时 45 分发出紧急警报，9 时 20 分敌机侵入城市上空向市区投弹。当天来袭敌机共 27 架，第 1 次 9 架，投弹 100 多枚（有 10 余枚未爆炸）；第 2 次 18 架。此次市区中弹街道共计有 39 条，城南有南街、外南街、栈房街、土桥街、城墙巷、牵大籐街、南门街、寿昌麓街、观音阁街、粮房街、合江门街、涌泉街、韮菜园街、文重街、水洞口街、大水井街、南福街、一洞天街、会府街、斗姥宫街、女学街等 21 条；城西有中西街、西城角街、水池街、伞把街、大巷口街、小巷口街、大扁担街、三倒拐街、文昌宫街等 9 条；城东有东街、小鼓楼街、老米市街、小北街、毛狮街、明伦堂街、大林家巷等 9 条；城北只有下北街。造成的损害：炸死 100 余人，炸伤 100 余人，烧毁房屋 20 余间，炸毁房屋 150 余间。是日警报时间长达 11 时 38 分之久，为历时最长的一次。

自　贡

1939 年 10 月 10 日，日机首次对自贡盐场实施空袭。当时正值机关、团体、学校及部分工厂放假，各地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庆祝“双十节”。上午 10 时许，日军分两批出动飞机 27 架次，向缪沟井、雨台村、袜子石等 10 余处轰炸扫射，投弹约 230 枚，其中燃烧弹约 20 枚，炸死炸伤市民 112 人，房屋损毁 175 间，财产损失数十万元。久大盐厂遭到两次轰炸，厂房被摧毁两处，损失惨重。当日投弹地区包括自流井、高硐等处。

1940 年 7 月 5 日中午，日机出动 80 架次疯狂空袭自贡自流井居民稠密区，投弹 98 枚，炸死 89 人，重伤 23 人，轻伤 118 人，炸毁和震倒房屋 90 余间，炸毁地下室 2 处，财产损失约 10 万余元。

1940 年 8 月 12 日中午，90 架日机再次轰炸自贡，向自流井、

郭家沟、二道桥、伍家坝地区投弹 267 枚，当日死亡 139 人，重伤 39 人，轻伤 219 人，炸毁房屋 282 间。此次轰炸将临近公园的一条街毁去一半，这条街因此改名为“半边街”，至今仍沿用此街名。

1940 年 8 月 17 日上午 11 时许，日机 9 架从富顺县城南面沿沱江而上，向自贡城内俯冲投弹 28 枚，同时用机枪扫射地面居民，造成 40 余人当场死亡，炸伤数百人。重伤者先送县卫生所医治，后转市教会医院；因弹片有毒，仅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的就有 50 多人。死难者中最惨的有：玉带桥街（今大巷子街）江家祠堂张吉三一家 7 口全部遇难；三倒拐街 34 号卿永丰家，卿二娘被炸成三段，身首异处；正街周益森家 10 岁小孩在西湖被炸成数块；三倒拐街 33 号梁叔益两岁小孩也被炸死。

1941 年日机 4 次轰炸自贡，即“7·28”、“7·29”、“8·17”、“8·19”4 次血案造成自贡居民死亡 307 人，伤 205 人，损失极为惨重。上级政府拨付抚恤救济费 9 万元，按规定进行抚恤。

1941 年 7 月 28 日，日机向自流井市区投弹 375 枚。

1941 年 8 月 17 日午前 11 时半，日机 27 架轰炸郭家沟、光大街土地坡、黄葛坡、夏洞寺等地，投弹约 150 余枚，烧毁房屋约 100 余家，死亡 20 余人，重伤 34 人，轻伤 56 人。

1941 年 8 月 19 日， 27 架敌机分 3 批轮番轰炸自贡，投弹 200 余枚。自贡此前被炸之街铺后被烧 100 余家，贡井市街被炸毁，10 余家民房被焚，死 20 余人，伤五六十人。

据被炸伤亡人员名册记载，在自贡市 1941 年 8 月 17 日、19 日两天的空袭中，仅防护团员即轻伤 48 名、重伤 6 名、死亡 1 名，共计 55 名。

富　顺

1940 年 8 月 17 日上午 9 时，日机 27 架空袭富顺县城，投弹

100 余枚，被炸地区有东门万寿寺、正街东门皂角巷街道、大巷子、南华宫、三倒拐街等多处。炸毁房屋 700 余间，炸死无辜居民 140 人，伤 145 人。少湖一带被炸死炸伤者最多，市民张绵煜一家 6 口全部被炸死；西湖边一周姓青年被炸身亡后，肢体飞上了房顶；西门林家湾林作成家 14 口人，连同雇工、客人一共 16 人，全被炸死，无一生还。

西　昌

中国卫星城西昌市，抗战时期隶属西康省，地处偏远的大小凉山。西昌小庙机场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最后逃离大陆、飞往台湾的飞机起飞的地方。

1941 年 8 月 31 日上午，日军一架侦察机先飞到西昌城上空侦察后，即引来 36 架 93 式轰炸机对西昌小庙机场进行轰炸。这批日机从东河上空出现，三架一组，三组一排，飞行高度不足千米，从北山上空掠过，直扑小庙机场，投下 130 多枚炸弹后，经邛海、大箐梁子垭口消失。被轰炸后的机场，跑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弹坑密布，有的大如罗锅，有的小如脚盆，弹片四处可见。除机场房屋、设施损失外，还炸死机场上放牲口的农民 2 人，炸伤 4 人，炸死耕牛一头，炸垮小庙街尾的 2 间民房。

川中地区

内　江

1941 年 7 月 28 日上午 11 时许，日机 18 架轰炸自贡后返航，途经内江时又投弹轰炸该县。离城四五华里的脚盆田连中两弹，

一弹落于刘家湾成渝公路侧，另一弹落在脚盆田井侧，炸毁李慎修家草房一间，炸伤 3 人，炸死城北镇十九保住户邱三兴等 4 人。日机旋即进入城区上空，炸弹不断投下爆炸，房屋倒塌，硝烟四起，血肉横飞。据当时内江县政府填报的“内江县第一次被炸人民伤亡财产损失调查表”记载，此次日机轰炸共投弹 15 枚，爆炸 13 枚，炸死 15 人，轻、重伤 37 人，毁房 48 间。

1941 年 8 月 22 日上午 12 时许，9 架日机排成“一”字形，从东北方向飞进内江县城上空，向人口密集的商业、住宅区低飞投弹、扫射，顿时该地区有名的山货业、夏布业、棉麻业、烟草业、盐业、油业、酒业等储转中心，化为灰烬。日机在内江县城投弹 44 枚，燃烧弹 7 枚。据内江县防护团 1941 年 10 月填报的“空袭损害表”记载：这次空袭被炸地区有城东镇的上河街、下河街、王爷庙街、小东街；城西镇的东坝街、大东街、县政府、财委会、防护团、国民兵团、警察局、监所、动委会、兵役协会、商会、邮政局等，共死亡 72 人，伤 123 人，烧毁房屋 736 间。

简　阳

1939 年 6 月 11 日，9 架日机轰炸成都后返航，经过简阳莲花乡曾家湾，其中一架日机发现宁静的山湾中仅有的一座四合大院，也不放过，立即投下一枚燃烧弹。曾家大院的瓦房、草房数十间随即起火燃烧，院内住户曾文俊本是专门从成都回家躲空袭的，不料灾难偏偏找到他头上，曾文俊当即被大火活活烧死，他的妻子、厨娘亦同时被烧死。带着一对儿女回娘家的曾世清大腿被炸断，血流不止，无人救助，活活痛死；她的 3 岁女儿也被大火吞没，儿子被埋在瓦砾堆中；曾文俊未满周岁的侄孙被炸飞来的瓦片、砖头打得脑浆外流，悲惨死去。这次日机“即兴”的轰炸，

造成曾家 6 口人死亡，重伤 3 人。

遂　宁

1939 年 9 月 29 日，日机首次轰炸遂宁，在城区投炸弹 110 枚，炸死 3 人。10 月 1 日，日机第二次前来轰炸，在机场一带投弹 90 余枚，次日再次空袭该市，投弹 200 多枚，炸伤 2 人，炸毁房屋 1 幢。

1940 年 4 月 23 日，日机 18 架又来袭，在城区投弹约 100 枚，炸死 3 人，伤 2 人。6 月 6 日是旧历端午节，南强乡农民不知已经发出警报，仍然进城赶场，行至东闻机场附近时，日机 63 架突然飞临上空，投弹 880 枚，并用机枪反复扫射地面人群，当场炸死 137 人，炸死 27 人，炸毁房屋 30 幢。

1941 年 3 月 20 日，日机 3 架轰炸遂宁机场后，又向城内投燃烧弹 18 枚，大北街下段至十字口尽成废墟，共烧毁商店 10 余家，炸毁房屋 7 幢，财产损失巨大，遂宁城里著名的“全泰堂”等商号，就是这次遭敌轰炸后破产的。

三　台

1940 年 7 月 10 日 11 时，日机 27 架由中江方向转飞三台，在西郊凤凰山东岳庙（今县林业局所在地）上空，由西向东斜飞投弹轰炸，至涪江东岸东山寺止，轰炸半小时，被炸地带长约 3 公里，宽 1 公里，这个范围基本上属于闹市区，被毁房屋 580 幢。据有名有姓登记在册的伤亡统计，共炸死王叶氏、林景文等居民 99 人和 7 个不知姓名的外地人，县长家属 7 人、县政府职工 3 人也罹难。除死亡者外，另重伤 74 人，轻伤 53 人。

1941 年 7 月 27 日，日机 9 架再次轰炸三台，伤亡民众 20 多人。

盐　亭

1940 年 7 月 21 日下午，日机 27 架空袭盐亭，在城西去溪岸边的城厢小学、陕西会馆一带投下 9 枚炸弹，爆炸 3 枚，其余 6 枚陷入溪边泥土中没有爆炸。这次袭击共炸死 4 人，炸伤 3 人。

川西地区

新　都

1940 年 5 月 18 和 19 日，日机在轰炸成都的过程中，顺便空袭川西平原上的新都，造成惨重损失。

新都县斑竹园乡鸦雀口村位于成都市北面，距成都市 10 余华里，当时属成都县管辖。时值农忙季节，农民们挑灯夜战，有的在田间收麦子、栽稻秧，有的正在休息，忽听到飞机声，抬头看见一批日本轰炸机被成都市防空探照灯的巨大光束照得白亮耀眼，高射炮弹也一发发地射向空中。这时，日机在慌乱中投下 6 枚炸弹，其中，三枚落到杨家院子龙门前，二枚落在俞家院子的龙门前，另一枚落在俞家院子的篱笆边。据当年的乡村文书记载，村民杨老二、俞三娘、邱木匠、文婆婆、杨四娘的几岁女儿、万××、陈××等当场被炸身亡。杨老二身体被炸飞，只剩下一条腿；杨四娘的女儿被炸得粉碎，连一点点能够辨认的部分都未留下。村民俞三爷、俞开信、俞开元、杨光明、杨光德、刘必成、代明玉、杨四娘、胖女子等被炸伤，代明玉在院子外，见到飞机，闪身倒在小沟里，放在沟坎上的手被弹片打穿手心；孕妇杨四娘的肚子被炸破，胎儿露出腹外，血肉模糊，当晚她在痛苦的挣扎

中死去。次日，人们发现，院坝里遍地是炸烂的肉块，皂角树上、院外沟边的青岗树上，乃至 150 米开外碾子旁的杨柳树上都悬挂着破皮碎肉，整个场面极为悲惨。

崇　庆（今崇州）

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第一总站，于 1939 年初选定在四川省崇庆县王场猴子坝一带建空军机场，第二年六月即调中江县民工 5 000 人修建王场机场。1940 年 10 月 26 日午后 13 时，工程总队长集合民工讲话时，突然接到总队部送来的预行警报——黄旗信号，不一会儿，总队部又飞速派人送来空袭警报——红旗信号。总队长正要发布立即疏散命令，不料 8 架日机经双流飞来，瞬间即飞临机场上空。敌机飞得很低，连机上涂着的太阳旗标志都看得非常清楚，机上的驾驶员也能清晰可辨。一刹那间，日机轮流俯冲而下，离地面仅十余米的高度，雨点般的机枪子弹朝着密集的 5 000 余名民工狂扫乱射。这时，总队长急忙钻进他背后能容一二人的大铁钟内躲避，民工们则各自狂奔逃命，惊恐万状。随着机枪子弹横飞、炸弹猛烈爆炸，顿时血流满地，死伤遍野。有的民工被打烂头部，脑浆迸裂；有的弹穿胸部，伏地倒卧血泊中；有的四脚被打断，仰天躺倒，哀号不已。当时统计，被日机扫射伤亡的民工及村民达 80 余名。

温　江

1939 年 11 月上午 9 时 4 分，日机 27 架对川西平原的温江县黄田坝飞机场及附近李家碾一带狂轰滥炸，投弹 210 枚，炸坏机场跑道，炸毁苏坡联保居民李陈氏草房 5 间、瓦房 3 间，炸死 5 人，炸伤 3 人。

双　流

1941 年 8 月 31 日，日机夜袭双流县城，因夜色漆黑，飞机失去目标，遂盲目投炸弹 1 枚、燃烧弹 5 枚。燃烧弹坠落在县城郊西门大河左右，炸弹落在城西北汤家湾坟地爆炸，汤文锡家祖坟被炸，弹坑深达 3 米多。双流机场附近民房被炸 10 余户，伤亡 10 人。与双流红石乡一河之隔的崇庆县复兴乡熊家林盘，一架日本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坠地爆炸，子弹武器四散横飞，熊家林盘遂成一片火海，延烧熊家四合大院。熊佩成家里婆孙二人正蒸馍馍准备午饭，躲避不及，婆婆被大火烧死，孙子头面烧伤；另有二人死亡，全院牲畜无一幸免。

川北地区

南　充

1940 年 5 月 18 日，日机对川北重镇南充进行首次轰炸，投下 250 公斤级的重磅炸弹 1 枚，炸死长乐镇联保之十四保崆峒坳青年农民唐开定、李小娃等 4 人。但随后的灾难就十分巨大了：

1940 年 9 月 3 日，南充城再次遭到轰炸。当天是赶场日，各个市场人头涌动，十分热闹。上午 11 时，城防部队连续发出三次警报，少许市民逃到郊外避难，多数人仍滞留城中。中午 12 时许，36 架日机突然飞临南充上空，先绕城飞行三圈，再低空盘旋，分成四组向市区撒传单，然后折回向城区俯冲扫射，并投下大量炸弹和燃烧弹。顷刻间全城爆炸声如山崩地裂，硝烟弥漫，南充城内顿时面目全非。受害最严重的是正南街、黉墙街、四桂坊、学院街一带，房屋几乎全部倒塌，死伤者甚众。外武显庙米市找不

出一具完整的尸体，人血人肉和雪白的大米混在一起，一片狼藉，附近居民林氏一家 26 口无 1 人幸存。兴业巷王明德全家只剩下他 1 人，至今仍是孤身度日，每提及此事，老人悲痛欲绝。果山公园内一大黄桷树下隐蔽 100 多人，日机发现后即轮番用机枪扫射，人们四处逃散，多数被击中，尸横遍野。公园内和邻近的大东街、二府街的树上挂着被炸断的人头、四肢，其状惨不忍睹；仅大南门外的城壕边，就横列着 200 多具焦黑的尸体，分不出男女老少。当天下午，当局组织了清理，只清了几条大街和几个集市，就清出了 1 300 多具尸体并进行了登记，更多的尸体则被埋在火堆、废墟里，有的连痕迹都未留下。

1941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许，日机 27 架空袭南充，在 300 米低空投弹、扫射约 10 分钟，共投弹 28 枚，炸死 18 人，炸伤 16 人，毁房 7 幢。

广　安

1940 年 7～9 月，日本飞机 4 次轰炸广安。

7 月 23 日，日机 27 架空袭广安，在护安乡沙背山投下炸弹、燃烧弹数十枚，农民黄受之家房屋全部被炸毁，一家 5 口人只 1 人幸免。乡绅蒋六先生的房子被炸烧光，农民堆在地里的许多包谷梗被烧毁。日机随后向县城攻击，在南园和王爷庙一带投下 10 余枚炸弹，炸沉木船 6 艘，一船工被当场炸死。

8 月 2 日中午，日机 26 架第二次轰炸广安，先后在护安乡、板湾、石垭口等地投弹数十枚，然后飞临广安县城，降低高度轰炸、扫射，导致 50 余人当场死伤。

8 月 3 日，日机继续攻击广安县城，投弹 107 枚，炸死、射死城市居民和农民 37 人，炸伤 46 人。

9 月 3 日的轰炸，给广安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害。当天上午

10 左右，日机 36 架分 4 批先行袭扰南充，然后折返广安实施轰炸、扫射。据当时的县政府统计，日机共投弹 219 枚，炸死 101 人，炸伤 169 人，毁坏房屋 410 幢。民生火柴厂大烟囱旁一棵两人合抱的大苦楝树被炸为数段，躲在树下避难的 10 余人全部被当场炸死。居民蒲跃阳之母被压在石礅下，蒲去救母亲，其妹去拉兄弟，又一颗炸弹落下，母子 3 人全部死亡。这次轰炸中，日机投下的一颗重达 60 公斤的炸弹当时未爆炸，埋在土中，直到 1984 年广安县养路段建房时才被发现，当地驻军应地区公安处邀请前去排除，发现弹长 1.1 米，周长 67 厘米，弹体上还刻有“昭和 14 年”字样。据估计，此弹的杀伤范围达 2 000 平方米。

广　元

1941 年 6 月 22 日上午，日机 27 架从西南方向分两批空袭广元，在鱼家湾、东山、上西坝及县城内空投炸弹 100 余枚，并低空扫射，全城顿时一片火海，当场死亡 48 人，伤 103 人，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据当年的目击者罗桂莲回忆，当天日机轰炸时，她的丈夫冉必清正在河坝割草，被日机炸弹炸掉右臂，当即死亡，留下他们孤儿寡母 3 人，生活无着，只得帮人推磨艰难度日。

1941 年 6 月 29 日，日机 12 架一天之内连续两次轰炸广元，炸死 8 人，炸伤 39 人。有的全家被炸死，有的一家仅存 1 人。如顾荣恩一家 6 口，就有 5 人身亡，仅留下他年仅 10 岁的幼子顾鸿书。

1941 年 8 月 29 日，日机 9 架再次空袭广元，炸死 38 人，重伤 47 人，轻伤 35 人。原河西龙潭乡第九保保长刘天益报告称：“民国 30 年农历七月初七，9 架日机飞经贯家坪时，发现田坝里有收获包谷的妇女及牧童数人，即空投炸弹 1 枚，炸死 2 个男孩和一头大黄牛……”另据当时记载，一架正在飞行的中国邮政飞

机也在这次空袭中被日机追上击中，坠落于广元塔山湾河坝，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阆　中

1940 年 7 月 27 日，日机 27 架飞临阆中县城上空，几经盘旋搜索后，便向下半城俯冲投弹、扫射，炸死市民王仕荣等 16 人。南门外河边的米船被炸沉 2 艘，164 包大米全部落入河中；川盐运销处的盐船一艘被炸沉、一艘被炸伤，船工全部死亡。

1941 年 8 月 16 日上午 11 时 30 分，日机第二次轰炸阆中。日机 27 架以“三”形编队从城西北方向窜来，然后成“一”字形呼啸着俯冲投弹、扫射，全城顿成一片火海。事后有关当局派人数弹坑，发现共有 150 个弹坑（其中有 8 枚炸弹未爆），燃烧弹约 20 枚。全市 20 多条街道被炸，共炸死沈大培、马兰贞等有名有姓登记在册的民众 158 人，炸伤 210 人，炸毁房屋 785 间。

1941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 时 15 分，日机 36 架分两批从陕西入川飞临阆中城区，盘旋几圈后即开始投弹。投下炸弹 200 多枚，燃烧弹 20 枚，然后向城东方向飞去。后又有 9 架日机折返，沿锦屏山、阆南桥、马家沟一带投弹 60 多颗，并用机枪扫射地面。日机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在城西北一带，被炸之处，房屋、城墙、田园成为一片废墟。据炸后不完全统计，日机这次轰炸共留下炸弹坑 300 多个（投在河中的未计），炸死陈德盛、黄金山等现场登记在册的无辜居民 72 人，炸伤 190 多人，毁坏房屋 302 间。

松　潘

地处川西北大草原边缘的松潘县，是汉藏人民杂居地区，交

通不便、经济落后，人口也十分稀少，县城居民不过数千人。但日寇对这个农牧业为主的偏远小县城也没有放过，于 1941 年 6 月 23 日竟派出 27 架大编队的轰炸机，对小小的松潘县进行了狂轰滥炸，造成极大的伤亡。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日寇事先侦知该县储有一批汽油。当年，该县县长黄白殊向四川防空司令部呈报的轰炸受损报告，现仍完好地保存在省档案馆，有关情况节录如下（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

“本县于六月二十三日被敌机空袭轰炸……自抗战以来，本县地处边陲，距前线较远，对于防空准备，虽经迭饬筹设，而人民心理终以敌机一时不易达到，积习太深，因之难推动。本年六月奉令由县属小河营运输大批汽油存储于距县城四十里路之漳腊，维时深恐暴日觊觎，难免不有一试可能，遂即加紧防空宣传，组设防空机构。殊余六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时许，即发现敌侦察机一架，由西北向县城及漳腊机场上空旋绕一匝而去……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半，敌机二十七架由南向城飞来，肆意狂炸，低飞扫射，计城内投弹七十余枚，另有五枚未爆；城外投弹五十余枚，另有三枚未爆。并投烧夷弹十多枚。计人民死亡一百九十八人，重伤二百零四人，轻伤二百九十三人，燃烧房屋二十八幢，炸毁房屋一百八十七幢。县城人户本稀，故损失亦云巨矣……”

日机轰炸了四川多少县市

抗战时期，日机自 1938 年 2 月 28 日轰炸重庆广阳坝机场开始，到 1944 年 12 月 29 日轰炸梁平止，到底轰炸了四川(包括西康)省多少个县市？

抗战胜利后，据当时的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关于日机袭川的“汇报统计”称，除有案可查的38县市外，“遭受轰炸尚未呈报损失的县计有新繁、荣县、荣昌、眉山、屏山、江安、中江等”，其原因不详。

另据四川省档案馆一份资料《抗日战争时期日机对四川的空袭》称，“根据当时防空主管部门的统计和我们调查核实的情况，当时被炸的市县达到67个”。

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1页署名“仇似海”的文章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遂行其侵略目的，自1938年至1944年（除1942年）不断派遣飞机，在四川滥肆轰炸。计被轰炸的地方，有重庆市、成都市、万县、奉节、自贡市、合川、泸县、涪陵、梁山（梁平）、乐山、温江、成都、华阳、新津、崇庆、新都、双流、内江、简阳、永川、巴县、綦江、彭水、铜梁、北碚、峨眉、宜宾、隆昌、富顺、合江、纳溪、丰都、南川、秀山、开县、忠县、巫山、巫溪、云阳、城口、大竹、渠县、广安、长寿、南充、南部、武胜、遂宁、三台、蓬溪、盐亭、绵阳、金堂、梓潼、苍溪、广元、阆中、达县、松潘、仁寿、璧山、新繁、荣昌、荣县、眉山、夹江、屏山、江安、中江、江北、安岳、大足、德阳、江津、邻水等75个县市。”

综合各种记载，我们认为，当时四川省一共有75个县市被炸是可信的。“仇似海”应该是一个集体署名，而75个县市是写作时调研、查证的结果。如果包括当时隶属西康省的西昌，则被炸的县市一共至少是76个！

参考资料

① 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人民出版社，1983。

② 高永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1937年7月成都《救亡会刊》。

“国耻的五月将变成复仇的五月！”

埃德加·斯诺以伦敦《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身份，在1939年5月大轰炸后进入重庆。他在考察了轰炸现状、市民心态后得出结论：

“日本空袭重庆，攻击目标全从军事基地转向一般市民，这种‘无区别轰炸’适得其反，越来越激发中国大众的抗战意志，而自己却徒劳无益。”

实际上就连日本人自己，在连续进行了多次狂轰滥炸后，也感到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长远藤三郎少将在一年之后提出了“重庆轰炸无用论”，他向上司逞递的报告中在叙述了“虽经大轰炸但重庆的一切仍在照常运转”的情况后，沮丧地说：

“从轰炸的结果来看，难以使其屈服……”

费正清博士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记述重庆大轰炸这段历史时也写道：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西安，都遭到了空袭，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1939年至1941年轰炸了268次，城市大部分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重庆民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

事实完全如此，恐怖轰炸的根本目的就是想让国民政府投降，

进而迫使全中国人民放下武器，甘当日本人的奴隶。然而，日寇的血腥暴行丝毫没有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反而激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抵抗到底的决心。1939 年 5 月 5 日，在惨烈的“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后，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向民众发表演说（见 1939 年 5 月 6 日《新华日报》）：

“这次重庆轰炸，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惨绝人寰的惨案。昨晚为救市民我彻夜指挥，虽惨不忍睹，可民众毫无怨言，誓死抗战到底的精神，增强了我必胜的信心和勇气。中华民族的正气，自古以来都是在遭受异民族侵略时迸发出来的，任何残忍的暴行都不能使我们屈服。国耻的五月要成为雪耻的五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也对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表谈话指出：

“日本即使占领了中国全国，它也没有足够的军队维持它，这是个简单的算术。华北有 300 个以上的城市，日本就是在各个城市防扎一个中队，它也不能够保持住所有的城市。如果说它保持住了，这对我们来说也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一个中队、一个中队地依次消灭它！”

中国文化名人林语堂博士这期间刚刚抵达美国。他在得知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惨案的消息后，悲愤地对美国友人、后来担任第一届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大卫·里尼索尔说：

“我唯一的主张，就是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日本决不可能打胜（这场战争）。即使日本人按一比四杀中国人，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曾被外国记者视为“愚民”的重庆老百姓，在遭受惨重打击之后，又是怎样一种心态呢？重庆当时的《群众周刊》记者陆诒写下的现场报道，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夜里，升起许多火柱，映照出扬子江两岸的轮廓，人们发疯

似的从烈火中抢救财产，呼叫着孩子向江边走去。眼泪已经干了，人们咬牙切齿，诅咒敌人残暴。记者随难民群来到临江门，走下坡坎，一个已经近半疯的老太婆一把拉住我喊道：“日本强盗杀了我家的人，我要拿起刀去参加游击队，非去替一家人报仇不可！’……”

的确，残酷的屠杀只能激起四川人民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1939 年，全川参加“国军”上前线的人数高达 30 多万，比上一年增加了几乎一倍，占全国征兵总数的 17%，居全国之冠；1940 年全省贡献的壮丁更达 46 万之巨。百万川军出川，在湘、豫、鄂、鲁战场摆开阵势正面迎击日军，虽然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有效地遏制住了日寇进逼大后方的势头，挫其万丈凶焰。许多川籍士兵在战场失利之时，身绑手榴弹扑入敌阵与日兵同归于尽，演出悲壮一幕。不少川军高级将领也视死如归，第 29 军 4 师师长王铭章战死台儿庄；曾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的李家钰将军率部赴豫阻敌，在弹尽粮绝、日军逼近之时，宁死不当俘虏，以最后一粒手枪子弹自毙于敌前，以示与之不共戴天的仇恨，令现场敌酋也不得不悚然起敬。

复仇女神从成都起飞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1941 年 4 月乘飞机北上飞抵成都，访问了由德国人开办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学院，还去参观了 10 万工人在筑的一个飞机场。当看到成千上万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民工，人拉肩扛，用石滚子、竹箩筐修建着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飞机场时，海明威对中国的恶劣印象有了很大

的改变，他预言中国的抗战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开罗宣言》，战局实现转折

早在日美开战前，渡海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构想，就在美国援华人士中开始萌发了。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和大隧道惨案发生后不久，后来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就向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首脑阿诺德提出过建立陆军航空队，用燃烧弹攻击日本城市的计划。然而，当时的阿诺德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没有采纳陈纳德的建议。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也遭到日本军队疯狂攻击后，美国军方的态度终于有了根本的改变。1942 年 10 月，陈纳德声称，他以 105 架战斗机、30 架中型轰炸机和 12 架重型轰炸机，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 6 个月之内，顶多在一年之内。”

战局真正的转折，是 1943 年 11 月，蒋介石辗转印度赴开罗，代表中国政府与罗斯福、邱吉尔举行会谈后开始的。开罗会议确定的主要内容，就是决定三国共同开展对日作战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将其从中国所有领土上驱逐出去，并使辽东半岛和台湾归还中国。中、美、英三国的这个重大决定，以《开罗宣言》的形式极其郑重地向世界作了宣布，意味着日本的末日终于到了。

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由于英、美在中国并无地面作战部队，故“三国协同作战”的核心，其实就是以中国内地、主要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四川为基地，首先对日本在华军事力量，继而对其本土实施空中

打击。事实上，早在 1943 年年初，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制定并开始了紧锣密鼓地布置。2 月 6 日，阿诺德对重庆进行了四天的访问，就有关在重庆建成对日本进行空中攻击基地一事，当面与蒋介石进行了协商。月底他回到美国，在纽约出席欢迎宋美龄访美的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建立一个直接轰炸日本心脏部位的航空基地之工作，一切准备就绪。”

由于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目标太大，地形也不太有利，这个基地最终建在了成都。决定做出后，当务之急是迅速建设供最新式的美军“同温层”B-29 重型轰炸机起飞的宽阔机场。根据协议，美国方面要求中国到 1944 年底，必须在成都周围建成四个这样的机场，并扩建另外三个有同样功能的机场。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在征兵、征粮、完税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要完成这个艰巨任务，更需要四川人民承担更大的牺牲。全省有关的 29 个县长被立即召到成都，连开几天会议，由省主席张群（也是四川人）宣布了具体的任务：

一、在成都近郊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建设四个轰炸机基地；另外，在成都、温江、德阳等五个地方，配备战斗机的出击基地。

二、由四川省劳工承担这项工程任务，从 29 个县招募 32 万劳工；各县设劳工委员会，处理征集、调配施工用品，征收土地、补偿等问题；不论什么理由，决不允许延误工程开工。

饱受轰炸之苦的四川人，虽有重重困难，但一听说要建设轰炸日本强盗的军用机场，无不欢欣鼓舞，空前团结起来了。这四个机场的建设，堪称当时世界上少有的超大型工程，尤其是新津的战略空军机场，可谓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世界第一大机场，连美国本土上，都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军用机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完全靠人力，建造过雄伟的万里长城，如今，他们用同样的工具，同样的人力，齐心合力运石筑路，为现代化的超级轰炸

机建造机场，再造一座现代化的“万里长城”。虽然工具一样，但已和公元前的长城工程不同了。这是 20 世纪的工程，也是战时规模最大的土木工程，不是用数十年，而是仅仅 5 个月的时间就必须完成，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美国工程师的要求是：巨型轰炸机使用的机场跑道长 2 600 米，宽 60 米，钢筋水泥浇注的地基厚 1 米；战斗机使用的机场跑道长 2 200 米、宽 40 米，跑道厚 40 厘米，5 个月内必须建成轰炸机和战斗机用的共计 9 条跑道。作为附加设施，一个机场还须配备 3 个航空燃料仓库、6 个弹药库、2 个无线电通讯所，能容纳 35 架 B-29 的机库、2 个发动机配备所、指挥所以及兵营宿舍等。这些辅助设施，对轰炸机远程轰炸日本作战，都是不可缺少的。为了修筑一条连接跑道的滑行道，必须堆 10 万立方米的沙土，特别是对跑道的要求更严，要铺上几层混凝土和注入粘性强的黄土层，必须经得起冲压；砂石的需要量，仅彭山县一处，就需要取尽自新津到眉山的岷江两岸长 50 千米的鹅卵石。为此，已有 2 千多年历史的、秦代的大规模水利工程，赋予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称呼的都江堰，为了支持采集砂石，这一年竟然打破常规，推迟放水 10 天（长期以来，每年都是 4 月 1 日放水）。

工程准时开工了。大量的砂石，除绝大部分是用架子车、独轮车运送之外，其余都是靠压进肩膀的扁担队列，从河床运往工地。工地附近的男女农民都参加了运送砂石的工作。开始时，一天可往返 10 次，随着采集砂石的现场距离拉长，往返次数就逐渐减少。最后，民工早上出发，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返回工地，真像一条蚂蚁的队列。人们肩头皮开肉绽，流淌鲜血，也在所不辞。由于连年的战祸，民不聊生，当时的民工，并不全都是身强力壮的人，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身体极其虚弱，还得拼命完成每天的工作量。由于对日冠的仇恨积压甚久，复仇的欲望远远超过了自己所受的痛苦，数十万民工一个心眼只想着早日完成

机场建设，好让自己的轰炸机尽快起飞，渡海去日本，向恶魔复仇。

工程披星戴月地进行着，灯火通明、通宵达旦，民工不停地苦干。平整机场，没有压路机，只能使用人力；沉重的大石滚，需要好几百人拉，算起来一条跑道需要 9 万个工，人们靠号子和歌声来驱赶疲劳。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什么目的，民众的悲惨境遇始终没有丝毫改变。农民被抽作劳工，被使唤，除了供给必须的饭食，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报酬。他们受伤、生病死在工地，被拖出去草草埋了就了事。仅简阳县的劳工，有记录的就有数百人因生病、受伤而死在工地。

这样巨大的工程，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强制的方法进行，劳工的怒气与不满竟然没有爆发出来，既是一个奇迹，也是很正常的事，一想到日本鬼子的罪恶，其他什么样的虐待，都不值一提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其是说高度的爱国精神，还不如说是深刻的抗日情结。“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他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日本飞机对重庆、成都和四川各地惨无人道的轰炸，更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数十万民工，几乎家家都有人是这场罪恶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退路了，只有豁出去了。比起日本鬼子的血腥暴行来，劳工们的遭受的痛苦都是可以忍受的。赤贫的中国无力建造现代化的巨型轰炸机去向万恶的日本鬼子复仇，但她无数的儿女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用最原始的工具，建造供这些飞机顺利起飞的现代化机场。一想到他们亲手修建的跑道上要起飞满载复仇炸弹、燃烧弹的巨型飞机越海轰炸日本侵略者，他们什么怨言都没有了。

凭着四川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这个“特种工程”所包括的新津、双流、彭山、邛崃、彭镇（现在的双流县彭家场）、广汉、成都近郊凤凰山等七个军用机场，在 1944 年 5 月中旬靠数十万劳工的双手，不折不扣地按期修（扩）建完成了。

从成都到日本——攻击开始

1944 年，新津机场，夏日的阳光已经十分灼热。

当时的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官员，四川省主席张群，以及各县县长等，在紧张的期盼中，翘首以待。远方传来了隆隆的机声。不久，闪耀着银色光芒，威风凛凛，仪态庞然的“超级空中保垒”B-29 重型轰炸机，第一次着陆在中国大地上。

早在美国盟军到来之前，为了搞好接待工作，国民党中央军委会颁布了各种通令，设立了“战地服务团”，还特别制发了一批供美国飞行员穿的皮夹克，在背面印有“来华助战人员，军民人等一律保护”的字样，以利他们在碰上各种困难时，由国人及时给予帮助。为了不使未带家眷的盟军人员工作之余不至于寂寞，当局甚至还特别安排有关人士，在各机场周围开设了酒吧、简易舞场共 800 多家……为对付共同的敌人，中方可谓绞尽脑汁，从生活服务到军事行动，全面配合美军援华工作，竭尽了地主之能事。

据当时任该团防谍组组长的周震东先生回忆，成都附近的七大机场修、扩建刚刚完成，美国空军的运输机、战斗机、歼击机和“B-29”重型轰炸机等各种飞机共约 270 架，以及各种军用物资就源源不断地抵达，陆续来蓉的美国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多达 7 000 人以上。

当时的新津机场主要负责接收国外直接飞来四川的各种飞机，作战的 B-29 也主要从这里起飞，美国空军援华航空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邛崃、彭山、广汉、双流机场，一般是供美机进行空战后返航或临时性地区调动之用。初次到成都的这批 B-29 轰炸机，是从印度加尔各答近郊新建的美空军基地出发的，途中飞越印度东北部，掠过喜玛拉雅山区的“驼峰”，经中国昆明到达四川。经过短暂的调整后，1944 年 6 月 16 日，英姿勃勃的“超级空中堡垒”首次从新津机场出发，实施对日本本土的大轰炸。经美国

空军教官训练的中国空军人员，也被编入机组，或当投弹手、或做领航员，参加了对日本的空袭。

位于日本东部北九州的八幡钢铁厂，成为美机从中国内陆起飞攻击的第一个目标。这是自 1942 年 4 月 18 日美军 B-24 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东京以来，日本本土遭到的第二次空中打击。随机的美国战地记者当天晚上就向中国人民报告了第一次轰炸获得的重大战果，令饱受轰炸之苦的重庆、成都及四川其他各地的军民欢欣鼓舞。

八幡钢铁厂是日本的钢铁中心，占日本钢铁生产的五分之一，炼钢炉数量占日本的四分之三强。它位于日本东京东北方向 2 600 千米的偏僻地区，谁也没想到美机轰炸机群竟会在 6 月 16 这天突然光临。这是因为，停泊在太平洋上的美国航空母舰舰载轻型轰炸机不可能飞这么远，而日本人又完全不知道在中国内陆竟奇迹般的突然出现了新津、彭山这样的远程轰炸机基地，因此一点防备都没有。第一批 B-29 飞临八幡市上空投弹时，日军连迎击美国轰炸机的战斗机都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开火。直到美联社记者罗伯特乘坐的第三批轰炸机飞临，并开始猛烈攻击时，日机才伧促应战。罗伯特报道说："日本人的探照灯、高射炮、战斗机都没能阻止美国有计划的轰炸。"这是因为"超级空中堡垒"在当时确实是第一流的超级轰炸机，它不仅续航能力强、载弹量大，而且装备有极精确的瞄准仪器，能在八千至一万米的高空对目标进行"超高度精确"的轰炸，一炸一个准，根本不用冒着危险低飞实施攻击。只能在五六千米中低空活动的日本战斗机，可以说对它完全无可奈何，至于地面的高射炮，就更无济于事了。

"一切都在疯狂燃烧！"

紧接着，从四川基地出发的美国空军第 20 轰炸机集团的强大

的轰炸机群，又对日伪铁蹄下的辽宁鞍山“满州钢铁中心”和日本西九州海军所属的大村航空厂进行了反复轰炸。这座“大村航空厂”，正是 1937 年日本海军航空队第一次对中国实施渡海轰炸时的出发地点，如今它在来自四川的 B-29 连续四次毁灭性轰炸下，变成了一片废墟。美军第 20 轰炸机集团司令官卡齐斯·鲁梅少将，还随机亲临轰炸鞍山的现场，了解战况，研究敌情。他发现日机迎战水平很低，漏洞百出，于是回成都基地后立即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大胆采用在欧洲轰炸德国法西斯时极有效的 12 机编队的作战手法，给敌人更有效的打击。他还发明了“凝固汽油弹焦土战术”,对罪行累累的日本海军航空队汉口基地实施密集的“地毯式”轰炸。在他的指挥下，从成都附近四个机场起飞的美机大编队轮番飞临汉口，大批高效凝固汽油弹落在这个日机屡次起飞对重庆、成都狂轰滥炸的 W 基地上，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W 基地完全毁灭、丧失了作战能力。

最早提出这个作战方案的，正是“五三”、“五四”大轰炸那天，拿着望远镜勇敢地矗立在重庆街头，观察日机暴行的那位“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这位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厚感情、后来还娶了一位中国妇女为妻的美国将军，始终没忘当年重庆街头无辜民众被日机炸弹炸得血肉横飞的场面。几年来他不断向华盛顿当局上书，要求给予他足够的炸弹和燃料，那样他就可能跟鲁梅将军联手，“将日本四个主要城市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夷为平地”，就像他们当年企图毁灭重庆一样。陈纳德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轰炸日本四个重要城市的任务，留给了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舰载机队去完成，于是他跟鲁梅将军在成渝两地协同配合，开始策划并实施对日军在华各航空兵基地的猛烈攻击。

1944 年 12 月 18 日，从成都出发的 84 架 B-29，协同陈纳德领导的驻昆明美军第 14 航空队的数十架轰炸机，再次大规模空袭了汉口。B-29 载弹重量高达 10 吨，十倍于当年空袭重庆、成

都的日本“重型攻击机”；它装载的M69燃烧弹以胶状化汽油燃烧剂（即凝固汽油）为主要成分，威力远在日本空军使用的镁、铝合金燃烧弹之上。中国方面通过电台广播和地下工作者，事先就向汉口地区的老百姓发出通告要他们撤离，待市民扶老携幼远避乡下、山区后，“空中堡垒”即遮天蔽日般飞临汉口，它们从高空把 500 吨燃烧弹投向长江两岸密集的日军军事设施、仓库、码头和市区内的日本租界，日本守军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死伤无数。

然而，日本侵略者天性残忍、卑劣，从来不讲什么“规则”，面对中美两国联合实施的强大军事打击，他们无法招架，只能再次使出卑鄙下流的伎俩，对手无寸铁的人动手，将在湘桂战场中被俘的 3 名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就地枪决。这种公然违背国际法虐杀战俘的罪恶行径，招来美军更加猛烈的打击。接连几天，数十架从成都地区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在大批战斗机护航下飞临汉口，不仅使用燃烧弹，还强行俯冲用机关炮对地面日军猛烈扫射，长江两岸五公里以内地区一片火海，日本租界也完全变成一片废墟，生还者寥寥无几。

“一切都在疯狂燃烧！”当时随机亲临现场观战的鲁梅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现在，日本侵略者终于尝到了炸弹、燃烧弹从天而降，到处开花，地面尸横遍野、建筑物熊熊燃烧的那种滋味了。而这还只是开始，紧跟着战火就烧到了日本本土，它的首都迅速变成了另一个“重庆”。

这是抗日战争 7 年以来，从饱受日军蹂躏、被日军轰炸最烈的四川土地上， 第一次起飞了远征日本本土的轰炸机，它在心理上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已经远远超过了具体的一厂、一城的被毁；当时日本的有识之士从这一天开始就认识到，日本永远不可能打赢这场罪恶的战争了。

真正的“大后方”

抗战8年，四川不仅是全国其他各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避难的大后方，而且更是源源不断的兵员供应地、军粮大粮仓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巨大税收来源地。300万川军出川抗日、约28万四川军人、数十位川军高级将领壮烈战死沙场这一壮举，足以在世界战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尤其是在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全国人民苦苦支撑的抗战中期，四川人民挺身而出，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担负起全国抗战“总后勤”的重任，每一个被“抽丁”的四川家庭、每一个四川纳税人为抗战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军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如果没有大后方四川这个坚强的堡垒，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兵源、税源、大粮仓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日本军事力量深入到长江以南地带，欧美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袖手旁观，中国孤立无援，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进入最危急的时刻。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在当时绝不是耸人听闻的宣传。1938年的中国，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外，国民党中央政府能直接指挥抗战的，就只剩下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中国西部少数几个完整的省区了，其中人口居全国之最、面积居全国第四、物产丰富的四川省，无论在军事战略和后勤保障上，都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兵源、税源和富足的军粮粮仓。这个文化、

历史底蕴丰厚，人杰地灵的内陆大省，不仅是国民党战时首都的所在地，也是 1949 年蒋介石撤离中国内地时的最后一个立足之地。由于种种原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在各种“正史”中很少被提及。我们也只是在思索日本飞机为何不仅对战时首都重庆和川西重镇成都，而且还对几乎四川全省各地，甚至一些极其偏远、毫无战略价值的山区小县城进行狂轰滥炸时，才触及这个问题。由于资料有限，对八年抗战中四川人民作出的贡献，只能作一个大致的概述。

征兵情况

“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军队的兵员征集均系招募，即实行的是“佣兵制”，当兵是一种可解决温饱问题的职业，“扛枪吃粮”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兵役制的特点参军不是必须为谁尽义务而是自由的职业选择，这也是与当时地方割据、连年的军阀混战的国情相适应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 1937 年改“佣兵制”为征兵制，即规定适龄青年均有义务参军，随时服从国家征召，并以“兵役法”形式加以固定，具有强制性。四川省当年即成立主管兵役的“军管区”，下设 20 个师管区，配属在各战区作战的各个军队，由各地方政府层层负责，大量征集壮丁入伍，补充前线兵员。据不完全统计，战争初期的四年之内，四川各地征兵人数如下：

1937 年 8 月至 12 月：征兵 13 万 4 千余人；

1938 年全年：征兵 17 万 4 千余人；

1939 年全年：征兵 30 万零 6 千余人；

1940 年全年：征兵 46 万 4 千余人；

1941 年 1 月至 8 月：征兵 19 万 2 千余人。

以上四年，全川征兵赴前线者共计 130 万人。

1941 年以后，日寇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步步紧逼，而且针对中国军队兵员主要来自农村的情况，有计划地屠杀农村青壮年。据记载，日军每次到农村“扫荡”，都要残杀大批男性青壮年。河北、山西、山东及江南地区，许多村庄的男性村民不是被杀光，就是被日军掳去当劳工。即使“国军”不败退，在各战区也极难征到兵员。在这种危局下，补充兵员的重任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人口大省四川的头上。1941 年至抗战胜利结束，四年之内国民政府又在四川省共征兵 200 万人以上。

抗战 8 年中，四川贡献的新征的壮丁兵员总数，至少在 330 万之上。这还只是实行“征兵制”之后新征的壮丁，不包括此前川军建制部队出川抗战的 6 个集团军的人数、中央直属各军由前线调来四川进行整补的兵员，以及 1943 年为参加“滇缅保卫战”组建“中国远征军”时征募的 5 万名具有中专、大学学历的四川知识青年。当年就有“无川不成军”之说，这确实绝非虚构和夸张!

应征出工

“四川四川，四面是山”，这句谚语形象地概括了四川的地形。打开中国的版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川北屏秦岭，南临横断山，西倚唐古拉山，东靠大巴山脉，自古以来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也正是这种特殊地理的环境，才使四川成为历来外敌难以轻易入侵的大后方。但同时因山隘险阻、交通极为不便，各种物资进出皆难，又使这个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泱泱大省的国民经济长期落后。在战争期间，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因此，开辟四川交通以便水、陆、空运输及时支援军需，成为国民政府迁

蜀之后的当务之急。

从 1937 年沿海工业大批迁入四川开始，国民政府即把疏通四川各路交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蒋介石甚至亲自批“手条”将准备用做构筑重庆防空洞的费用移作川陕公路的扩建，以利兵员和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往前线。当时以四川为基地而抢修川滇、川陕、川黔、川湘四条大公路，并铺设贯通南北前线和滇缅前线的四川境内交通路，同时整治川江航道。这些巨大的工程需要的大批民工，基本上都来自四川各区县。据统计，这批交通工程前后总共征集四川民工 250 万人以上。战争后期，四川又在境内各地新建中美联合空军基地 33 处，征召的四川民工也达 90 万人，仅这两项合计，为赢得抗战的胜利，四川就贡献民工 340 万人以上。

纳　粮

8 年抗战期间，四川不仅是前线部队所需军粮的主要供给地，而且也是部分遭受战争灾害最重的沦陷区人民的“粮仓”。四川田赋自 1941 年由缴纳现金改为征收米粮实物起，有的地方在 1938 年就将军粮预征到 1978 年，真正是“寅吃卯粮”。至 1945 年抗战胜利止，四川全省征缴、捐献的粮食计稻麦 8 200 余万石，占全国征解的粮谷总量的 38.5%，其中的 1944 年，从四川征集的粮食竟占全国总数的 50%。

当时，国民政府除向四川各县征解粮谷外，长江南岸各省战地军民所需食盐，亦全赖川南自贡等地所产的井盐输出供应。长江北岸各省战地军民所需食盐，即靠川北一带所产的井盐输出供应。

四川自古产蔗糖，产量历来居全国之首，历史上最高年产量

在 16 万吨以上。自国民政府实行战时食糖专卖征收后，不仅增大了税源，而且保障了对各省战地军民所需食糖的供给。

税　收

为了充实抗战财力，保障财政开支，自 1938 年起，四川的财政收入中，一切国税全部解入中央国库。1938 年解入中央国库的税目为：

盐税为 2 400 万元以上；

田赋为 2 000 万元以上；

禁烟收入 2 000 万元以上；

烟酒税为 1 000 万元以上；

以上各项合计为 8 000 万元以上。

1939 年、1940 年各项税收解入国库者均与上述数字基本相同。自 1941 年田赋改为征收实物粮谷后，随之增加了各种税捐。在四川境内大量摊募的各种公债、美金公债、美金库券，劝募的各种储蓄、各种捐献等，只要是用于抗战，四川人民无不踊跃认购认捐，使中央国库历年收入皆有增无减，大大增强了国家抗日作战的财力。

发展生产

“七七”事变后，由各地迁来四川的工厂和本省的厂矿，军需民用大小数百家，其中仅由沪迁川的民营工厂就有 184 家，武汉迁川的工厂有 64 家。所有这些内迁和本地原有的厂矿，主要分布在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及涪江与渠江流域的交通沿线和原

料产区。以川东的重庆、江北、合川、江津、綦江、永川、长寿、涪陵、丰都、云阳、万县，川南的乐山、宜宾、江安、纳溪、合江、泸州、泸县，川中的成都、简阳、资阳、资中、内江、自贡，川西的灌县（今都江堰市）、彭县、绵阳、三台、遂宁，以及川北的广元、南充、渠县等市县为基地，带动千家万户的半机械工场和手工作坊，土洋并举（特别是纺织业），工商兼营，构成了大后方战时工业生产的基地。四川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民生轮船公司，在抗战初期为了抢运难民、学校师生员工、军工物资和迁川工厂，先后被敌机轰炸、机枪扫射死亡的员工就有 100 多人，受伤 60 余人，被敌机炸沉、炸伤轮驳 20 多艘，仅为军工民用工厂抢运的物资即达数十万吨。由于四川江河纵横，除轮船外，还有成千上万条木船担负运输任务，对于发展大后方生产极为有利。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有了上述水运之利和陆路车马长短转运之便，军需民用主要所需的煤、铁、电力、机械和化工原料、建筑材料（水泥、油漆等）、纺织品、盐、糖、粮谷、油料加工品、地方名特产品、农具、医药卫生用品等，都优先得到发展。虽然日寇空军持续对四川进行狂轰滥炸，但分散在各地的军工、民用厂矿，或开山凿洞，就洞建厂，或依山傍水，隐蔽建厂。虽在硝烟弥漫之中，仍能坚持生产，支援前方，形成了一支近、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大军，为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发展文教事业

抗战开始，津、京、沪、汉及沿海和西北沦陷区各省的许多文化教育机构纷纷内迁四川省，共计有大专院校 50 余所、中等专业学校 46 所（包括职业学校）。其中有国立、公立、私立及教会

学校，科目有文、理、法、工、农、商、医、师范、艺术和戏剧、音乐、体育等专业；还有国家与民间的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各种学术文化艺术团体，以及陆、海、空军各级军事院校。这些学校主要安置在成都、重庆、北碚、合川、铜梁、江北、长寿、涪陵、丰都、万县、江津、綦江、璧山、泸州、江安、南溪、宜宾、乐山、西昌、内江、自贡、金堂、绵阳、三台等市县，学校师生所到之处，均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和极大的帮助。四川省教育厅和地方政府亦以接待和安置迁川学校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责成专人办理，为抗战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急需的人才。1943 年中国组建“远征军”出战云南、印缅战场，配合盟军抗击日寇，在成都等地招募的数万名具有中、高级文凭的知识青年，基本上就是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精英阶层”，大部分不愿留在沦陷区作亡国奴，随着难民和败退的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一时间，海内名流、专家学者荟萃蜀中，无论科研、工程还是学术、文艺方面，蜚声海内外的“大师”级著名人物均可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四川，冒着敌人的炮火，忍受着贫穷的困扰，讲文修武，砥砺学业；继续发展科研，弘扬中华文明，培养各种英才，使原本落后于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四川文教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仅以中等学校而言，四川省即由原来的 277 所增加到 445 所，所培养的学生不仅直接投入当时的各项抗战事业，也为战后的重建工作准备了后续力量。

参考资料

① 熊绰云，当时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事件，他曾在回忆录中详细论述了有关情况，十分富于传奇色彩。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② 陈纳德：《战士的风格》，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③ 方军《我所认识的鬼子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④ 金振声《四川人民对八年抗战的贡献述略》，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

大　事　记

1901

清朝政府迫于日方的巨大压力同日本签订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条约书》，规定“在重庆府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次年，日本租界正式对日本商人开放，大阪汽船和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及大阪洋行、大利洋行、友邻火柴株式会社等十余个日本企业蜂拥而入。紧跟着，日本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从此王家沱一带“成了一个拥有全权的侵略大本营，一个‘国中之国’”。

1931.10.8

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航空兵 11 架飞机，为配合地面部队，用吊袋投下装有瞬发信管的 75 颗炸弹，首次对锦州城的“军事目标”张学良的军政厅和 28 师所在地进行了轰炸。

1935.8.24

发生震惊中外的“大川饭店”事件（日本人称为“蓉案”）。日本到成都企图筹备设立领事馆的四个日本间谍，住在“大川饭店”，后来被群情激愤的成都百姓追赶，打死 2 人。

1937.7.7

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

1937.8.1

“七七”事变三周之后，在重庆人民一片怒吼声中，日本驻重庆领事馆 29 人在召谷廉二率领下，登上了日本商船“宜阳丸”，由日本炮舰“比良”号掩护撤离了重庆。之后，日商、日特在重庆地区的所有工厂、商业机构或关闭或瘫痪，日寇阴谋破坏四川

抗战运动的活动彻底破产。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就开始着手制定武力进攻四川的“政略轰炸”作战方案。

1937.8

国民政府按早已制定的将沿海工业企业内迁四川的庞大计划开始着手实施。内迁的主体包括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枪炮制造厂，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等。

1937.8.15

日本 26 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从日本本土的长崎县大村基地出发，渡海对南京进行轰炸。

1937.12.13

日军侵占南京。其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长谷寿夫指挥下，进行了长达 6 周的血腥大屠杀。

1938.1.30

日侦察机侵入四川。

1938.2.18

日机从山西运城机场出发，轰炸重庆广阳坝机场，拉开了长达 6 年多的川渝大轰炸的序幕。

1938.5

国民党大本营迁到重庆。随后，中国政府撤退到重庆，拒绝了日方的“和平谈判”建议，继续全民抗战。

1938.8.14

日本木更津航空队 14 架敌机跨海轰炸杭州笕桥机场，妄图以突袭摧毁驻杭中国空军力量。中国空军驻杭州主力部队之一的第四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带领下率机追上。在短短 30 分钟激战中，一次就打落 6 架敌机。为了纪念这次空战大捷，这一天被国民党政府定为“中国空军节”。

1938.10.25～27

汉口、武昌、汉阳相继失守。自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

到 1938 年 10 月 27 日武汉失守，据当时的中国救济总会统计，中国城市被炸 316 次，炸死 22 968 人，炸伤 37 222 人，财产损失数以亿计。

1938.11.8

日军 18 架轰炸机由武汉基地沿长江西飞入川，首次轰炸成都。

1938.12.2

日本天皇亲自下令开始实施战略轰炸，由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侵华日本陆、海军传达了“大陆令第 241 号”天皇敕令，正式将“政略轰炸”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形成作战规范文字。

1939.5.2

日本天皇再次下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自今日起实施空中作战”的指示；“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接令后的第二天，即命陆、海军联合航空队，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大规模战略轰炸。震惊世界的重庆“五三”、“五四”大惨案就此发生。

1939.5.3

下午 1 点 17 分，日机 4 批共 46 架舰载轰炸机和中型攻击机，沿长江北岸俯冲，侵入市区，以密集队形空袭重庆。敌机投掷燃烧弹和爆炸弹 150 余枚，市区内 27 条主要街道有 19 条被炸，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大火弥漫，浓烟滚滚，燃烧不止，1 000 余幢房屋化为废墟，居民死伤近 1 000 人。

1939.5.4

27 架中型攻击机满载巨型炸弹再次轰炸重庆。攻击时间为 4 日黄昏，轰炸目标为“以重庆防空司令部，委员长行营，县政府中心，贯穿中央公园南北线以西的全部市街”。这片地区，相当于重庆一半城市街区，是称为“下半城”的靠嘉陵江边的商业区和住宅区。

1939.6.11

这是成都市遭受日本飞机空袭轰炸最惨烈的一次。日军驻武汉 W 基地的联合航空空袭部队 27 架轰炸机空袭成都。这次突然袭击，以市中心商业繁华区和居民密集的盐市口一带为主要目标。日机疯狂投弹扫射、轮番空袭长达一小时左右，在盐市口一带投掷燃烧弹、炸弹共 111 枚，盐市口、东大街、东御街、提督街、顺城街一带繁华地区共 49 条街道被焚毁，西东大街等 16 条街巷被烧成一片焦土。空袭中炸死市民 226 人，炸伤 432 人；中弹、烧毁、震倒的房屋共有 4 709 间，被毁的建筑除民宅、商店外，还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范、华县中学三个文化机构。

1939.9

德国突然袭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了战幕。在此之前，中国作为打响这场全球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的国家，已经孤军作战达 3 年以上。

1939.11.4

成都大空战。中国空军当日在成都上空击落日本“轰炸之王”奥田大佐的座机，同时日机在败退返航的沿途，又遭到重庆、梁山（现为梁平县）基地起飞的中国战斗机拦截，被击毁 18 架。

1940.05.13

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协定，由陆、海军组成联合“航战队”轰炸中国内地，并将此行动命名为“101 号作战”。“101 号作战”方案正式形成了陆海军协同作战的体制，将作战时间预定为自 5 月中旬起约 3 个月的时间内。方案将“要地攻击”的作战思想定型化了。101 号作战计划制定的主要攻击目标，仍然是重庆及成都。

1940.05.18

“101 号作战”对四川内地的轰炸开始。持续到 9 月 4 日，在 112 天的时间里，空袭共达 72 次。

1940.6.11

根据东京多次召开“御前会议”的新战略部署，日本天皇直接下达了“陆军须解决宜昌”的命令。华中日本陆军大批西进，于 6 月 11 日攻占了与四川东部紧邻的鄂西重镇宜昌，在此建立空军基地，以达到先行建立桥头堡——缩短攻击重庆的轰炸航程、加大空袭重庆次数的计划。

1940.10.27

“10·27”血案发生，该血案为日军飞机轰炸、焚烧、扫射成都最为酷烈的三次血案之一。

1941.6.5

日机轰炸造成重庆“大隧道惨案”。短短数小时之内死伤近万人，景况之惨、为害之烈，震惊全世界。“大隧道惨案”从而与“黄河决堤”、“长沙大火”一道被列为抗战期间中国的几大惨案。

1941.7.27

“7·27”血案发生，该血案为日军飞机轰炸、焚烧、扫射成都最为酷烈的三次血案之一。

1941.8.17

美国政府通牒日本政府：“美国政府现在认为有直言相告日本政府的必要：如果日本政府今后仍继续推行其对于邻国作军事支配或军事威胁的政策和计划，则美国政府将被迫立即采取必要步骤，来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以确保美国的安全。”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把中国所受到的攻击与美国安全联系起来，实际上等于是宣战书，美日开战只是时间问题了。

1941.12.8

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4.18

美军 B-24 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东京，这

是美军对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的报复，也是美军对日本本土的首次轰炸。

1943.6.8

日机在梁平投掷细菌弹。

1943.11

蒋介石辗转印度赴开罗，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与罗斯福、邱吉尔举行“开罗会议”，决定三国共同开展对日作战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将其从中国所有领土上驱逐出去，并使辽东半岛和台湾归还中国。中、美、英三国的这个重大决定，以《开罗宣言》的形式极其郑重地向世界作了宣布，战局出现了真正的转折，日本的末日终于到了。

1944.5

新津、双流、彭山、邛崃、彭镇（现在的双流县彭家场）、广汉、成都北郊凤凰山等 7 个现代化军用机场，凭着四川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依靠数十万劳工的双手，不折不扣地按期修（扩）建完成。

1944.6.16

“超级空中堡垒”B-29 大型轰炸机首次从新津机场出发，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第一次渡海轰炸。经美国空军教官训练的中国空军人员，也被编入机组参加了空袭。位于日本东京东北方向 2 600 公里偏僻地区的八幡钢铁厂（日本的钢铁中心，炼钢炉数量占日本的四分之三强）是轰炸的首要目标。

1944.10.25

“超级空中堡垒”B-29 大型轰炸机从新津机场出发，对日本长崎县的大村基地进行轰炸。这个大村基地，就是 1937 年 8 月 15 日，日军轰炸机渡海轰炸南京的出发基地。

1944.12.29

日机轰炸梁平，这是抗战时期日机对四川的最后一次轰炸，

也是对四川大后方地区“政（战）略轰炸”的结束。

1945.8.6

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原子弹。这枚相当于 2 万吨梯恩梯黄色炸药的超级炸弹在广岛市区上空约 600 米的高度爆炸，全城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当场死亡约 8 万人。在极大能量的光辐射、冲击波袭击下，很多活生生的人甚至被蒸发、被汽化了。原子弹爆炸之后几年中，由于受放射性尘埃的污染和中毒，总伤亡人数超过 20 万。

1945.8.8

当天夜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代表苏联政府宣布：从 8 月 9 日起，苏联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1945.8.9

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造成 10 余万人死亡。

1945.8.15

日本东京电台播放裕仁天皇“停战诏书”录音，宣布日本正式投降。当日，铃木内阁总辞职。

1945.8.28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同机由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

1945.9.3

国民政府决定 9 月 3 日为抗日战争结束日。

后　记

自 1938 年 2 月 18 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广阳坝机场，到 1944 年 12 月 29 日最后一次空袭梁平，长达 7 年时间对四川残酷的“政（战）略轰炸”终于结束。根据“四川省防空司令部”1944 年的一份统计数据，在“大轰炸”的 7 年中，日机共出动 7 380 架次，在四川境内各地区投下炸弹 25 922 枚、燃烧弹 904 枚。又据当时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的官方正式统计称：“本省自（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七年间，除三十一年（即 1942 年）未遭受敌机轰炸外，其余六年中遭受敌机轰炸的负伤人数共有二万六千余人，死亡人数二万二千五百余人……总损失十二亿五千六百六十五万元，依一九四五年（原文如此，引者注）成都物价指数折算是一千三百五十四亿五千九百一十二万元。”

必须指出，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经常为某些统计数据相互矛盾、难以判断的问题所困扰，例如关于日机在四川长达 7 年的大轰炸中造成的死亡人数，上面提到的四川防空司令部提供的死亡人数是 16 658，而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向中央政府呈报的死亡总人数则是 22 500 余人。同时另外一些重要数据，如日机架次、投弹数、房屋毁损数、轻重伤人数等，往往也因差异较大，或过于模糊或过于精确，都使人对其真实性有所疑问。此外，某些具体事实在各种原始档案、当事者的回忆、调查访问记中的表述，以及外国历史学家的著述和解放后发表、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上的有关记载也存在类似问题，常常一家一种说法。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

就当时的客观情况而言，中国的社会学诸如国情统计、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本来就不发达，既不被当局重视更无切实可行的科学手段，加上战乱困扰，只能是事到临头才采取一些比较直观、原始的方法加以弥补，有较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对日机每次轰炸的投弹数量的记录，就是用事后派员去现场一个一个数弹坑的办法统计出来的；但因不少炸弹尚未落地就在空中爆炸了，或者落在江、河、湖泊中未留下弹坑，这些数据看上去十分精确，实际上并未反映出事实真相。因此，在事隔 60 多年后的今天，要想对日寇长达 7 年的川渝“大轰炸”中所有事件都做出非常精确的描述是不大可能的。

从主观情况来看，问题就更复杂，如死亡人数统计，由于事关重大，国民党市、县一级政府为了不致“民心慌乱”，往往尽量缩小此类数据，重庆“大隧道惨案”即为典型一例。另外，1939 年日机轰炸乐山造成的“8·19”惨案也是如此，当地现场清尸人员和知情者称清理出来的尸体有 5 040 具，而乐山县政府上报的死亡人数则仅为 838 人。

此外，当时四川省防空部门未制定出科学的灾难统计标准，更未提供任何有效的工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当事人员往往素质较低、缺乏专业训练，致使上报材料的形式、规格不统一。如我们在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自贡市档案馆和四川人民防空指挥部档案室等处看到的当年各地上报空袭损失报告的原始文件就五花八门。有县长亲自用毛笔书写的，有秘书用粗陋的劣质纸张油印的，有按上司发下的表格简略填写的，甚至还有不少电话记录式的“代电”，或干脆就是一纸电报稿；有的受害地区根本就没有任何报告，如前面提到的新繁、眉山等县。内容方面，如受伤情况，有的不分轻重伤，有的只报重伤。房屋损失的报告

连单位也不统一，有的用“栋”，有的用“间”，有的把几间房屋算成一栋，有的一栋就是一间，等等。这些报告的行文方式也是文言、白话、半文半白交替使用，常常词不达意、令人费解。保存这些历史档案的专业人士也告诉我们，事隔几十年之后，现在要彻底弄清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基本不可能的。

解决这些难题，只能尽可能多地占有原始资料，如某一重大事件，一般要查询数十、上百份不同的档案和史料，然后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尽可能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貌。实在难以判断虚实的，我们只能将当时的记载均列出来，并提出我们的倾向性意见，供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时参考。由于岁月的流逝，加之当年的受害者和当事人大多数已经逝世，有的原始资料很难找到。为了保存历史，我们收集、参阅并引用了不少第二手资料，重点参阅了日本历史学家、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的有关著述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媒体刊载的有关内容。记录历史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说明。

然而历史毕竟不是仅由一些枯燥的数据和案头上的文牍构成的，无论炸死一万六还是二万六，对施难者和受害者来说，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当年日寇对四川进行了长达 7 年多灭绝人性的大轰炸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更是任何谎言、诡辩都无法抹去的。这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在 20 世纪的一大国难，也应该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一切善良、爱好和平并坚持正义的人们的灾难和耻辱。

本课题的研究与写作，得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四川大学图书馆、成都市档案馆、自贡市档案馆、四川人民防空指挥部档案室、大邑抗战文物展览馆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成都市望江派出所

宋所长及全体干警、建设路派出所李教导员及全体干警在本书的资料收集过程中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在百忙之中审读并为本书作序。四川省文联刘继安、四川师范大学李诚、唐小平分别参加了前期部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写作工作，在这里一并致谢。

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

课 题 组

2005 年 6 月